

美援帶來赤化中國的禍水

——抗戰、戡亂與大陸撤退往事

曾虛白

摘自《曾虛白自傳》各有關同名章節

作者**曾虛白**（1895—？），江蘇常熟人，清末民初著名文學家曾朴的長子。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歷任：金陵女子大學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中國文化大學教授兼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主任等教職；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第五部國際宣傳處處長、中央宣傳處處長、行政院新聞局副局長、中廣公司副總經理、中央通訊社社長等公職。有著述多種傳世。

日本戰略的擴張造成美國加強援華的決心，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美總統羅斯福批准軍事援助中國以後十二天，發表了他著名的「爐邊談話」，表示「美國要做民主主義的兵工廠」。所謂「民主主義」當然包括中華民國在內。可是跟著在三十年三月十九日英美參謀會談商定兩國作戰總戰略決定，如英美兩國須同時對德國與日本作戰，軍力應首先集中對付德國，對日本則取消耗阻遏戰，直到擊敗德國為止。在這種先德後日，也可以說重歐輕亞的總戰略下，美國的外援雖包括中華民國在內，和歐洲國家特別是英國比較之下，中國所能得的幫助就顯得微乎其微了。

可是羅斯福卻還曾鄭重其事的作了幾次切實援華的表示，並在租借法案尚在國會辯論之時，就派遣白宮行政助理居理博士（Dr. Lauchlin Currie）來華，考察中國軍事及經濟情況。居理在三十年二月七日到了重慶，晉謁 蔣委員長長談十次之多，對有關軍事、政治、經濟各個角度詳細交換意見之後，複向中國政府其他主管官員與美國僑民徵求資訊，停留了二十天才返回美國。他回到美國剛巧是租借法案簽署生效的那一天，他就向羅斯福作了一次詳盡中國需援的報告，並說明 蔣委員長得援之後各種加強戰鬥力的具體計畫。同時，居理建議，美國應派一位專家去做蔣委員長的顧問。

四月十三日，日本與蘇俄簽訂了中立條約，促使日本軍閥公開擴張其南進侵略計畫，也就促進美國加速推動其對中國之援助。於是從四月起我國提出的各種美援物資源源而來。但可感歎的是，總計美國租借法案在民國三十年二月中撥給中國的物資總值二千五百八十二萬一千美元，只占美國撥給各國的物資總額百分之一點七！

這一點點得之不易的茕茕美援，今日事後檢討，竟帶來了大陸淪陷在共匪手裏的禍水！因為，居理到重慶是負著雙重任務的，美國政府的援華竟帶著嚴重的條件。居理攜帶了羅斯福總統致蔣委員長的一封親筆密函，信中說道：

「在萬裏外的我們看起來，中共似乎是我們國內所稱的社會主義者。我們贊同他們對農民、對婦女與對日本的態度。據我看起來：這所謂共產黨與國民政府間相同之點殆多於相異者。我們希望雙方能夠消泯歧見，更密切地合作，以有利於對日本作戰的共同目標。」

居理在重慶時，曾表示希望有機會跟周恩來談談，蔣委員長並不反對，他就找美國駐華大使約周在大使館中長談。後來他又去訪晤了蘇俄駐華大使潘友新（A. S. Panyushkin）。對羅斯福國共合作的建議，蔣公要居理帶他口頭的答覆，大意說：各國共產黨的工作不是為自己國家的利益而是為第三國際的利益，並執行其命令。中共決不例外。因此，中國政策不與第三國際目的衝突時，中共尚可與我中央政府合作，倘中國政策與第三國際目的不能一致時，中共必盡力破壞之。現在，第三國際反對中國與英美合作，不願見中國與英美站在同一戰線上。這可以中共因滇緬路封啟而轉變其對我中央政府態度來作例說明之。在滇緬路封閉時，我中央政府與英美未取得諒解以前，中共乖乖地服從政府的領導，等到滇緬路重開，中央政府與英美站到了一條戰線上，中共立刻採取叛變中央的態度。因此，蔣公希望居理轉告羅斯福總統，只要中共肯遵從政府命令，嚴守國家紀律，中央政府決不會歧視他們，倘他們藉抗日的掩護來擴張第三國際的勢力，為了國家安全起見，中央政府自必加以制止。

居理回去，是不是這樣說，無資訊可證，但他回美國卻向羅斯福總統轉達蔣公建議，美國援華，希望白宮能派一位總統完全信任的人到中國來擔任政治顧問。不久，羅斯福推薦給蔣公的政治顧問是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

蔣公發現拉鐵摩爾在接受任命之前根本跟羅斯福無一面之緣，怎能符合他白宮完全信任的要求，始終感到駭異。實際，事後證明是居理在中間弄了玄虛，使羅斯福好意援助中華民國的動機，竟惡化而成陷害中華民國大陸赤化的殺手。

在中日戰爭結束後的七年，民國四十一年七月二日美國國會開會的議程中，有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提出的太平洋學會調查報告，詳細說明共產黨力量在這個學會內部和周圍活動的情形，以及這些力量如何影響美國輿論以及美國的國策。這報告竟在抗戰結束七年後追溯居理當時推薦拉鐵摩爾的陰謀說，居理此次推薦直接取得總統同意，沒有跟國務卿磋商，當時國務院顧問賀伯克（Stanley Hornbeck）表示反對，居理竟悍然表示總統核定了是既成事實不容爭辯。這報告又揭露，實際拉鐵摩爾在未得任命前十一天（即是月十八日）已與蘇俄駐美大使烏滿斯基（Konstantin Umansky）聚餐詳商此後工作聯繫與合作辦法。到了七月，拉鐵摩爾跟中共高級幹部冀朝鼎同機飛到重慶就他的新職。

這個報告跟著說明居理是太平洋學會的高級顧問。拉鐵摩爾也是太平洋學會的會員，主編「太平洋評論」，為該會的喉舌。居理位居美國白宮行政助理的要職，太平洋學會當然要利用他去影響美國政策，更因為在重慶會晤了周恩來更將利用他做溝通中共的橋樑。

這個報告徹底揭開了太平洋學會的底牌說，在民國十六年這個學會的第一任秘書長就想建立與第三國際的關係。後來由賀蘭德（W. L. Holland）繼任秘書長就進一步跟在中國推進共產黨活動的俄共高幹鮑羅廷取得了聯繫。到了民國二十三年末，太平洋學會領導負責人和民國十九年第三國際來華策動組織中國共產黨、那時已為第三國際遠東部負責人的吳廷康取得正式聯繫。從此，美國共產黨和莫斯科都正式承認太平洋學會是第三國際發展陰謀的一個前哨機構。這個學會在太平洋沿岸各國都有分會，各國的許多知識份子都是會員。共黨分子和共黨間諜組織就利用它來掩護各種陰

謀活動。更重要的，太平洋學會是全美國沒有任何匹敵的遠東及亞洲問題的研究權威，美國所有研究遠東及亞洲問題的教授和學生們對於亞洲局勢的觀點都受了它的出版品的影響，

太平洋學會的出版品最有號召力的當推拉鐵摩爾主編的「太平洋評論」。一直到民國十九年拉鐵摩爾準備到中國發展他更上層樓的陰謀活動為止，「太平洋評論」已成為共黨勢力在美國最堅固的據點，而太平洋學會也就成為共黨用來引導美國遠東政策趨向共黨目標的工具。蘇聯也利用這個學會的聲望來增進蘇聯在美國的利益。

太平洋學會的一個主要工作是影響美國輿論，它的實際領導人不斷努力與美國政府中的外交決策人員建立積極的合作與機密的關係。民國三十年迄民國三十四年間美國對華政策顯欲協助國民政府增強其抗日戰爭的實力，太平洋學會的陰謀卻要扶助中共使它死裏逃生，破壞中國國民黨領導抗戰實力，完全摧毀了美國的援華政策。民國三十年居理來華帶給蔣委員長的一封羅斯福總統密函，表示了羅斯福受太平洋學會蒙蔽之深，已危及中美兩國此後合作的基本觀念。這就是蘇聯利用太平洋學會滲透白宮的顯著成效。

以上揭開太平洋學會活動內幕情況都是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報告的實錄，史料確實，無一言虛構。然而美國也有少數明眼人洞燭這可怕的危局，例如美駐蘇大使蒲立德（William Bullitt）在民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給美國務院的電報中就說：蘇俄希望美國跟日本打起來，蘇俄自己儘量避免參戰，可是等美國打敗日本的時候，蘇俄一定會乘機攫取東北，赤化了中國。這位美國外交家真是目光如炬，他的預言都成了事實，這也同時反映了羅斯福當年受太平洋學會盡情利用的顛預了！

我們今日回頭檢討，居裏帶給蔣公那封羅斯福總統的密函，已以事實證明，早在民三十年太平洋學會已在美國政府從總統羅斯福起塑造了一套牢不可破的偏

見，種下了大陸赤化、我政府播遷來台的禍根。今天我們可以斷言，太平洋學會受第三國際（那時還是俄共利用的統戰工具）的策動，要乘日美戰爭的機會，幫助中共來奪取中國政權的。他們決定的政策，一方面醜化中國國民黨的領導久失人心，一方面美化共匪的進步，博得民眾的擁護。美國要把中國培養成一個與它並肩抗日作戰的有力夥伴，一定要壓迫中國國民黨把政權讓給中國共產黨。壓迫之道無他，只須運用美援之予否，就可使中國國民黨俯首就範。太平洋學會決定了這套陰謀之後就發動攻勢，一方面滲透美國決策層，主要說服總統次及國務院，一方面設法滲透美國派赴中國的外交與軍事使節機構，使美國對華政策的運用，朝裏與現場都在他們掌握之中。事實證明，羅斯福致 蔣公秘函既暴露了太平洋學會滲透美國決策層的成功，而拉鐵摩爾的派遣更暴露了太平洋學會滲透美國駐華使節的成功。此後，中美關係不愉快之發展多可以找到太平洋學會陰謀的痕跡。史迪威與 蔣公之磨擦，雖有史迪威桀驁性格促成的因素，但實際檢討，在史迪威左右助其策劃成其智囊團的兩位政治顧問實為他與 蔣公不能合作的主因。這兩人，一為美軍駐華考察團團員謝偉志（John Serrice）【其中文名字彼時又寫作“謝偉士”、“謝偉思”等。】，一為美國駐華大使館秘書大衛思（Joseph E. Davis）。兩人都是太平洋學會會員。史迪威被 蔣公拒聘免職返美，謝偉志跟著回美國，竟調入國務院，變成了無人能比的權威「中國通」。此後馬歇爾來華以調人身分促成共匪赤化大陸的所謂「聯合政府」的美國國策，都是國務院中這位「中國通」智囊團的貢獻。

我們事後聰明來做檢討，究竟美援救了我們還是害了我們，值得我們深思。上述概要簡報已把美援給太平洋學會把持促成大陸赤化的經過史跡如實揭發，美援貽害中國有了鐵證。我們再進一步檢討，假定我們堅持反共政策，不受太平洋學會挾美援來要脅我們的威脅，我們確信，蔣公「以空間換取時間」戰略的成功，仍可以不需美援，而作困敵於我泥淖中的貢獻，在世界戰勝利計功時，占優越地位。因為，日本軍閥偷襲珍珠港，冒險與強敵美國展開太平洋爭奪戰，勢必傾其海、陸、空全力作最

後之一擲，那末，抽出中國戰場部隊，減弱中國戰場的作戰實力是日軍閥必然要改變的對華戰略。因此，我們可以斷言，日美戰的展現，已種下了我們無須美援，獨力可以制日進而勝日的根。假定我們當日能看到這一點，那末不會有雅爾達強把我東北權益換取俄共參戰的美國賣友醜行；不會有俄共對日宣戰三日後日本投降，俄軍竟以戰勝國身分接收東北，藉機壯大共匪軍力；不會有強把叛逆作平等政黨、美國作調人的「聯合政府」談判；不會有四平街匪軍大敗潰逃，馬歇爾強迫 蔣公下令停戰的無理干涉；最後當然不會有美國停止援助促成匪勢猖獗篡踞大陸的意外突變。這一些當然只有事後聰明才可以看得到的，當時主政的人，面對環境的壓迫，自必就事論事，解決實際問題，無法作這樣深遠的預斷。但，前事不忘是後事之師，我們鑒往可得知來的智慧，做這樣的檢討也還有它的價值。

在轟炸威脅下工作不懈

我退守重慶之後，日軍雖進佔宜昌，仍無法動搖我堅強的抵抗。於是，他們轉變戰略乘我空軍在重建階段，他們掌握了我們後方的全部制空權，決定傾其空軍全力，不斷地轟炸重慶，藉此來摧毀我軍民團結抗戰的決心。

所幸重慶是個霧城，每年只有五月迄九月夏秋之間五個月天氣晴朗，暴露受敵機的施虐，其餘半年在濃霧掩護下得求喘息。然自民二十八年始迄三十年底止，三個夏秋所受轟炸的威脅，真可說，不論貧富貴賤，每一個在重慶的中國人，都受到地獄生活的煎熬。最慘的一次是二十八年五月三日與四日連續兩天的轟炸，市區房屋毀了一千二百余棟，市民死了四千四百餘人，傷了三千一百餘人。在二十八年一年中，日機空襲二千六百餘次，派出飛機一萬四千餘次，投彈六萬余枚，中國人被炸死的二萬八千餘人，炸傷的三萬一千餘人，房屋被毀的十三萬八千餘棟。民二十九年夏秋之間，日機繼續它不斷的狂炸，每隔三五天必有一次狂炸外，中間又加上了每天派一架或兩架來我空間盤旋引發我發警報後，飄然引去，隔了一兩小時又來一兩架，照樣盤

旋引去，如此周而復始，使我們在下面進出防空洞疲勞奔走。敵方稱為「疲勞轟炸」的確使我們營養不濟的中國人，受著如入地獄的煎熬。民三十年的夏秋，日機的轟炸更凶，竟至沒有六小時以上的間斷，市民斷炊失眠，忍受著超地獄的苦痛。

蔣委員長目睹人民遭此劫難仍堅持抗戰決心，一無怨言，在他日記中感慨地寫道：「此次渝市轟炸，實為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目睹的慘劇。昨夜為救護難民事，通宵籌畫督行。觀我民眾遭此慘痛仍無一句怨恨抗戰之言，予思之，更難自安。對此無知純潔的同胞，其行動雖多難約束，然而其精神之可愛使我銘感無涯。遭此慘酷不能忍受之艱難，惟見我民眾如此，更增我樂觀與勇氣矣。」

蔣委員長說的這些老百姓，或者我們當時在巴中國宣處同人的工作精神是當之而無愧的模範。我們那時的防空洞裏有照明設備，有電訊連系，有廣播裝置，敵方空襲毀不掉我們工作成效。更使我們足以自豪的是，我們在美國西岸範士拉(Veniyula)找到了一位喜歡玩業餘無線電的牙醫師史帝名(Charles Stuart)竟願貢獻他全部設備做我們的電訊收報站。於是我們就在防空壕內把武漢帶來的漢口廣播電臺電訊器材裝置我們自己的電訊發報台。從此我們對美宣傳資料以及外國記者的新聞電報都可由我們國宣處自己的電訊系統直送史帝華，由他轉送給在美國的收受者，不經交通部的電報局，雖減少了政府一筆電訊的公家收入，卻創下了全世界推動國際宣傳加速加量空前絕後的效果。抗戰勝利之後，我召史帝華到南京，引他見元首，蒙頒勝利勳章與獎金美金十萬元以謝其助我抗戰之努力，實也是他應得的報酬！

敵方的轟炸，雖然不能折損我們精神上的堅決，但其疲勞轟炸卻真予我們的肉體幾達難以支撐的困擾。因為四、五小時內聞警入洞，解警出洞，周而復始，不分晝夜的這樣奔波，使我們每一個人，都食不能按時，寢無法安枕，拖上幾個月，都變成東倒西歪的病夫。記得三十年六月日機轟炸重慶發生大隧道窒息慘案那一天，敵機去後，我步行巡視慘案現場之後，到英國大使館去參加一個酒會，不料已到客散辭謝

之時。我匆匆喝了一杯雞尾酒就擠入長蛇陣，跟英大使主人握手說再見時，突然頭暈眼花，昏倒在大使的腳邊。大使館人員立刻把我抬臥到沙發上，解開衣褲給我用酒精渾身按摩，我才慢慢地醒了過來。英大使很周到體貼，立刻用他自己坐的汽車送我回處，並知我營養不足，車上還帶了一打進口高品級的罐頭牛奶送給我。在平時這份禮該算是譏我貧窮的人生小諷刺，可是在那時卻真是感我為國犧牲國際間的銘心體貼！

至這短短一年中國際宣傳業務推動的主要方策，當然仍需密切配合國際間特別是美國對我政策的轉變而發展我影響其朝野，促令堅定參加我抵抗侵略陣營的決心。

這時候美國，政府與民間還是脫節的。政府方面，打擊侵略者正如上述，已具了堅定的決心，然而孤立派的勢力卻仍盤踞民間，自成一種牽制政府前進的阻力。我們若能伸張正義、陳述利害，以我的抗戰經驗說服這些美方畏戰自保的孤立思想者，固屬我們應挺身負擔的責任；可是，和戰之決，是美國內政問題，外人多言，徒增疑忌，益授孤立派以口實。因此在此時期的對美宣傳運用，仍需掩護。

所幸我們的主張，是出於誠而本於真，一切宣傳的出發點，雖是為我們自己打算，同時也是為了美國和其他反侵略國家打算，所以即在美國也有許多同情我們而熱心願為我們奔走的人士。這種美國人士的結合最先是「不參加日本侵略委員會」為中心。到了這個時期，這一集團就改組為更積極的「援助民主國以自衛委員會」，其中心目標，就要敦促美國斷然自任遠東反侵略的戰士。這樣有力的美國民間組織若能逐漸擴大，自然會影響到美國輿論和一般民眾心理，根本動搖了孤立派反參戰的阻力。因此支助這個「自衛委員會」變成了我們在這階段最主要的工作。

我們支助美國「自衛委員會」的工作內容撮要概述有下面四專案：(一)文字：約請在華美僑執筆，撰寫通訊，即將此項資料輯成「美國聯合援華叢書」二十三種大

量供給該會運用。(二)聯絡：該會曾派美國傳播界領導人物亨利·魯斯夫婦(Mr. & Mrs. Hrney Luce)來華，從事聯絡。魯斯是美國太晤士新聞週刊、生活雜誌、幸福雜誌的主辦人，於民國三十年五月八日抵渝，二十一日返美，歷時半月，曾由顯光兄【“顯光兄”即董顯光。】親自陪同赴成都、西安、潼關等地考察，所得印象異常良好。返美後竭力宣揚我國抗戰精神；並向美國朝野呼籲增強援華。幸福雜誌九月號特辟專欄，題曰：「中國——我們的盟友」，計一百頁，共載長文五篇，照片五十餘幀。九月間，該會復派電影故事寫作家衛德慕來華，搜集宣傳資料及電影故事張本，亦經國宣處儘量予以協助。(三)廣播：發動渝、蓉、築、昆各地美僑，並敦請各界名流舉行廣播演講，共計七十一一次，演講稿製成錄音帶及選輯專冊，廣泛運用。(四)攝影：專為響應攝製此次運動的宣傳電影紀錄片共三部，成套新聞照片共十一套。在此一時期中，我們的廣播與攝影有了突出的表現。廣播方面「中國之聲」不獨引起了國際人士的注意且受敵方咒罵，稱謂「炸不盡、死不完的青蛙！」我們的新聞片，也接一連二的輯入美國的寰球新聞片中。總結說，我們的宣傳工作，開始得到同盟國家的重視，願意和我們攜手合作起來了。

不幸，我們對外的成功卻受了對內困擾的影響而大大打了折扣。換言之，上述太平洋學會在美國朝內與中國現場兩地配合的活動，使共匪一兩年內培養的左傾國際記者跟著活躍起來。

爭取國際記者做宣傳代理人是周恩來郭沫若在武漢時期已經開始暗中進行的。國際記者實際有職業的正式記者與憑稿計酬的流浪記者之分。前者是全部時間精力集中為專一新聞機構服務，有固定的薪給；後者是專鑽正式記者的隙縫，擇其不能顧及的煽惑性與突出性的新聞撰送某報，如獲採用，憑稿計酬。為了活動方便起見，他也可用某某報記者名義自居。共匪要爭取的國際記者，無法利用正式記者，因為他們憑實事說實話，不會跟著共幫魔棍的指揮走。可以跟著共匪魔棍指揮跳舞的記者只

有一群流浪記者。過去，共匪在國共合作抗日的號召下，不敢擺出與中國國民黨鬥爭的姿態，因此周郭兩匪只能展開他們派遣能外語的間諜混入國際記者群作偷偷摸摸的地下活動。可是，太平洋學會改變了美國政策，羅斯福密函已充分表現了美國政府將努力促成共匪奪取政權的陰謀，繼之以派遣拉鐵摩爾來華做他的代表為蔣委員長顧問，那一群流浪記者必然就會活躍起來。因為，太平洋學會塑成美國對華的偏見：中國共產黨是建立農民福祉的社會主義黨，是一個誠摯建國、時代前驅，受民支持的進步黨；中國國民黨是獨裁的、貪污的、喪失人民擁護、時代落伍的破落黨。國際記者之正式職業群，尚能在中國現場目睹實況，把握真相，不受這些虛構流言的影響；可是這些虛構流言卻充滿了煽惑性與突出性，正配合了那一群流浪記者的需求。因為中國共產黨一向是封閉而神秘不可測的一個謎，現在經太平洋學會的努力，這一隻謎盒有打開來給人看的機會。於是，雖然他們到現場去實察的機會少，只要有人肯負責講，都是他們要爭取的新聞資料。因此，民國三十年，拉鐵摩爾來華之後，這些流浪記者一面倒地變成了共匪的代言人，也就變成了國宣處重要鬥爭的物件。

這些流浪記者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三個女記者。巧得很這三個記者的姓氏均系英文字母S起頭；一位是蘇艾士（Hona Ralf Suess）。一位是史特朗（Anna Louis Strong），一位是史曼特萊（Agnes Smedley），它們若非真正共產黨員，也是十足的共黨同路人。此中以史曼特萊最突出，它崇拜共匪軍頭朱德真到了五體投地的程度。在民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開始三十日結束，在山西平型關打上了一次前後九天「太原大會戰」中間的一次小戰鬥，也是共匪在八年抗戰中唯一的一次參加戰爭的戰役。共匪宣傳竟說，這是匪軍獨力抗日打下的一次「平型關大捷」。把它描寫得像後來的台兒莊大捷的一樣規模，也把當時同時作戰的七個其他師一概抹殺。實際參加此次戰役的，共有八個師，共匪林彪的一一五師只是八個師中的一師。其他七師，為郭宗汾的七十一師，陳長捷的七十二師，劉奉濱的七十三師，金憲章的新編第二師，武廷麟的六十四師、高桂滋的八十四師。此中以七十三師之固守平型關功勞最大，七十一師的

一位團長殉職。林彪的一一五師並無任何特殊的戰績。可是史曼特萊為此戰役特寫一本書名「大河」的，把朱德捧成一位「戰神」。她說：「整個華北成了一個大戰場，有五個月之久，（從一九四〇年八月到十二月，）朱德毀掉了日本二幹九百三十三個要塞，斃傷日軍兩萬零六百四十五人，俘虜了二百八十一人，斃傷了偽軍五萬一千人，俘虜了偽軍一萬八幹四百零七人。」事實上主持這一次戰役的是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與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朱德不獨沒有參戰，根本與這次平型關戰役拉不上一點兒關係，可是史曼特萊卻把他描寫成中國抗戰最大戰役中的最神奇的作戰指揮官。這位元女記者的確比其他記者神通擴大，曾經進出了延安好幾次。每次從匪區歸來，一定要在我們的記者招待所裏，暢談高論為共匪宣傳。她竟厚顏不諱言它是朱德的情婦，自言死後一定要與朱德同穴埋葬。結果，史曼特萊於民四十九年先死，朱德遲至民六十五年才死的，兩人是否同穴埋葬無可靠的資料可尋了！

史曼特萊代表的這一群流浪記者是美援帶來扼喪我國本的禍水，也是我們國際宣傳處在這時期遭遇到的大敵。最可恨的，他們寫作的報導既沒有時間性，不需用電訊快遞，故可不受我電檢的過濾，他們更受得美國駐華軍事機關的合作，經常給他或她們以帶稿飛美的便利。這又是美援傷害我們的另一可憾的實例！

至這一時期的我們工作群，國內部分繼續來渝初期的組織與人事，沒有多大的變動，只在英文寫作方面增加了趙敏求與郎魯遜兩人，攝影方面增加了顧炳梁一人。廣播科長，則由彭樂善接替了王慎名。在這一時期特別加強的是海外的部署。顯光兄看到日本軍閥的野心將擴展到太平洋全面，上海不將為我宣傳據點，我宣傳據點必配合戰局向太平洋全面擴展開來。因早於民二十八年，顯光兄化裝成一鄉下農夫由香港乘一艘英國商船潛入上海，決將上海辦事處主持人董壽朋調到香港，協助溫源寧擴大香港辦事處的工作量。上海辦事處則由其在美派克學院的同學美國記者潘尼斯登（John B. Prniston）主持，佐以朱世清女士，視戰局的轉變，隨時作撤銷的準備。後

朱女士曾經白渡橋大廈日本特務機關傳訊，扣押五天，經她巧辯釋疑，竟得釋放。顯光兄在滬作地下活動，險遭劫難，其忠勇事蹟，詳其自傳中，不再復述。

加強香港辦事處是面對當時局勢當務之急，溫源甯的才華發揮他應付這變局最有效的功能。因為香港在這時期犯上英國恐日病採取中立政策的影響，瀰漫著妥協空氣。因此在宣傳上對中日二國不作左右袒，其檢查新聞以嚴守中立為原則。僑民所辦中文報絕對不能用「敵」、「傀儡」等字樣。即其本國所辦的路透社電訊，在英國各報得刊登的報導，在香港中文報上仍須經過檢查的過濾。我們國際宣傳處的基本工作是抗日，因此在此環境中欲求發展必然是阻礙重重了。可是溫源甯博士跟英國人打交道有他牛津紳士作風的特殊技能。在這緊要關頭他把我們的香港辦事處與香港政府結上了特殊關係。一直到民三十年十二月因香港陷敵我辦事處不得不撤銷為止，香港辦事處經常負擔了國際宣傳處宣傳資料向國際間吐納總關口的重要任務。

除了加強香港辦事處的工作功能之外，我們在珍珠港事變之前，又增設了由駱傳華主持的仰光辦事處，由謝善才主持的印尼辦事處與由葉公超主持的新加坡辦事處。駱傳華是青年會辦事著有成效的一位幹員，謝善才是土生土長的印尼記者，只有葉公超是得來不易的一位宣傳奇才。我常說，他是滿腹經綸博通中外學問的一位學者，具有令人生肅然起敬的宣傳優越條件，固足欽佩，可是，他的優點尚不止此，最難能可貴的是，他能說不堪入耳的外國髒話，跟外國流氓地痞打交道，因此，他的外國朋友遍及三教九流，這不是無人可及的宣傳上駟之才嗎？抗戰時期，他本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教書，突然他的伯父葉譽虎的家藏名貴骨董給日偽要人強佔了去，急電促他到上海設法奪回這傳家之寶。公超到上海努力的結果，不獨沒有奪回這寶物，反遭敵偽陷害，囚禁了三四個月。被釋後，溜到香港，經溫源甯推薦給顯光兄，立即請他擔任我們國宣處的新加坡辦事處主任。公超到新加坡不獨跟英國當局結了密切的關係，並且在華僑社會中樹立了領導地位。珍珠港事變後，日軍橫掃太平洋，不久威脅

到新加坡。公超那時組織了一個新加坡華僑反侵略委員會，一方面幫助中國政府代表，以及可能為日本利用的中國工商界人士與老病婦孺避難到安全地帶去，一方面組織了五個華僑遊擊隊命名 Dal Force，準備作最後抵抗。他又組織並指揮工人協助新加坡政府建築防禦工事。馬來亞戰事延長七十三天，公超天天有日記記錄經過。他是在新加坡失守前三天才離開新加坡，轉由加爾各答乘飛機來到重慶。

公超在新加坡進行這些活動都是跟新加坡政府中的經濟部與英國政府駐新的宣傳部密切合作。他在推進工作中掌握到很多資料，深切瞭解日本人滲透馬來亞的方法，日本人作戰技術與英國在馬來亞工作的態度與技能。我們看了他收集的這些資料，深切瞭解公超的辦事能力與工作精神，並且是應付英國人的一個最成熟的幹才。那時候，世局大變，我們的宣傳政策也跟著轉由中國人公開出面，主持宣傳。因即決定邀公超去倫敦主持對英、以後擴大為對整個歐洲的宣傳任務。

助桀為虐的記者群

日本軍閥把歐戰擴大為世界戰，橫掃太平洋，使久霸遠東的那些歐洲帝國望風而逃，從民三十年十二月八日襲擊珍珠港起到三十一年三月七日打到緬甸，只共三個月差一天，日軍幾乎佔領了整個太平洋。在緬甸英國只留下兩個師，並無久守之意，幸有我蔣委員長選派中國最精銳的第五、第六兩軍全部出動，傾我全力入緬作頑強的抵抗，日軍銳氣才受頓挫，停止其在太平洋上一鼓作氣的沖勁。因此，我們可以說，在美國海空軍未恢復其戰鬥實力發動在中太平洋躍島進攻新戰略以前，在太平洋戰區真正跟日本作戰的國家還只有我中華民國。我們是在國內抵抗日閥的大陸攻勢，在緬甸抵抗日閥的海洋攻勢，美英雖有太平洋聯防的參謀長會議作整個太平洋戰略的決策者，實際空有其表只作紙上談兵而已！

不幸，中國在太平洋戰區中對盟國作了這樣獨肩艱鉅的偉大貢獻，不獨未得盟邦應有的肯定與適當表示，反因羅斯福的顛預、邱吉爾的自私、馬歇爾的無知、史迪威的桀驁，使史達林的陰謀得逞，毛澤東不費吹灰之力坐享豐盈的果實。

我們是在這個時期面對這樣的國際不利形勢辦國際宣傳業務的。更不幸的，惟恐天下不亂的外國記者，在這個時期，未來中國前先受埋伏在美國政府國務院中希斯（Alger Hiss）等太平洋學會左傾黨羽的煽惑，來到中國之後又受身為美國駐華新聞處處長拉鐵摩爾（此時已轉任此要職），以及潛伏在美駐華使節中兼任駐華美軍佐理的謝偉志與潛伏在美國駐華軍部中的大衛思，前後左右的包圍，一個個的腦子裏都裝進了瞭解中國政治形態的塑型：「執政的國民黨是貪污無能的，被壓迫的中國共產黨，並非共產黨而是進步的農業改良主義者，得全國人民的擁護。美國要有一個有力的抗日夥伴，扶助中共爭取政權是唯一辦法。」因此，在美國政府政治壓迫之下，中國政府又遭遇到這些助桀為虐的西方記者趨勢附炎、興風作浪的歪曲事實造謠生事。更加上，中國是唯一與日本真正作戰的國家，更在西方國家望風奔逃的頹勢中打了一次長沙大捷，重慶變成了產生熱門新聞的唯一重鎮，於是，西方記者在香港不能再作他們採訪據點之後，多不避爬過駝峰（飛過喜馬拉亞山之戲稱）之勞，集中到重慶來了。

這時期的外國記者或者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是職業性的通訊社或報紙正式派駐的記者，例如美國美聯社的慕沙霸（Spencer Moosa）。英國路透社的趙敏恒（中國人），法國法新社的馬可仕 Jacques Marcus，美國合眾社的王公達（中國人），蘇俄塔斯社的葉夏明（Vladimir Yakshamin），以及美國紐約時報的賓莫安（Tilman Durbin）與洛杉磯時報的艾力根（Bob Elegant）；第二類，是各通訊社或報紙的職業記者為某一事件或某一時期來華作短期專訪的記者，例如瑞士蘇利克日報的鮑士哈特（Walter Booshardt），美國芝加哥時報的畢啟（Keyes Reech）同報的史蒂爾（A. T. Steele），英國路透社的包亨利（Henry Bough），美國新聞週刊的馬丁（Peppy Martin），美聯

社的司徒華（JanesStewart）。第三類是非職業性的流浪記者，來華之後，因報導共匪新聞而成名的記者，舉例言之，我在十三章裏所提的三個都以S為名的女記者史特朗（Anna Lovis Strong）、史曼特萊符（Agnes Smedley）、蘇艾士（Hona Sues）之外，我特別要提的是由顯光兄最先提拔，國際宣傳處的叛徒美國青年白修德（Theodore White）。他哈佛剛畢業就給顯光兄網羅到國宣處實習編采。他就以國際宣傳處職員的身分出入中國政府軍政機關和前線部隊，攪得很熟，轉變而成他自己的採訪網，同時再如上共匪在重慶活動的地下宣傳人物，他更得了左右逢源的便利，於是他就跳出國際宣傳處，做他自己獨立生活的記者了。後來亨利·魯斯來華，不曉得怎樣給他巴結上了，竟得了時代雜誌的正式記者的任命。當然，他這樣藉國宣處的身分攪他自己的獨立生活，有背忠恕之道。跟美國人講忠恕真是對牛彈琴，未免要求太高。可是，後來，他乘機溜到延安去，回到美國，寫了一本「中國的雷聲」（Thunder Out Of China），把共匪捧上了天，他身履其地而作此叛變國宣處原則的違心之論，雖是美國人也不能不斥他為叛徒了。他後來跟我見面，也曾自承此書寫得過火一點，或者事後也有悔疚之心，然此書給我政府的打擊是無法彌補的了。

第二個乘勢轉變的人是代表美國最有影響力一份大報紐約時報的艾金森（Brooks Atkinson）。代表紐約時報的記者，抗戰一開抬就由竇奠安獨任其勞。他是一位深切瞭解我國情對我抗戰深具同情心的記者。不料，在這抗戰局勢作大轉變的關頭，突然鑽出一個艾金森，取竇奠安的地位而代之，把紐約時報對我政府的態度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變成了完全袒共的報紙。

艾金森原來是紐約時報的一個專寫文藝活動新聞不見經傳的小記者。正因此，他感到混在紐約時報總社人才濟濟的同事中間求出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他在求發展的苦思中，一個念頭轉到向總編輯請求得到派來重慶做特派員的職位。不料，到重慶發現代表紐約時報的記者已有竇奠安打下了十來年的關係，沒有他

插手的機會。他苦悶了幾個月之後，忽然遇見中國劇戲團以國語上演莎士比亞的「羅蜜兒與朱麗雅」，他乘機寫了一千多字的報導與評介，竟得紐約時報當作頭條新聞，在第一版用大字登載。於是，艾金森在中國代表紐約時報的地位開始與竇莫安平分了秋色。那時候，美國政府受左傾勢力的控制，記者的風氣也跟著一面倒，艾金森要壓倒竇莫安，取其地位而代之當然要走左傾的路線，於是他乘著中國政府開放外記者訪問延安的機會，爭取得在紐約時報發表專訪延安的特稿報導，又得了打擊竇莫安的第二次勝利。最後，到了一九四四年，史迪威事件的爆發，艾金森公然做了史迪威的同謀者。他竟跟著史迪威飛返美國，寫了一系列的報導詆毀蔣委員長，為史迪威辯護，混淆黑白，顛倒是非，予我政府以最不利的打擊，使在竇莫安報導中支持的態度公正、仗義執言的紐約時報一變而成萬惡之首中國叛徒毛匪澤東的代言人了。

上述白修德與艾金森是第三類來華助匪成名的流浪記者中之突出者，實際此類人數占全部來華記者人數之過半，他們的言行，每易形成不察者誤認為當時全體駐華外記者的姿態與形象。除白修德、艾金森與前述 S 開頭的三位女士外，應納入此類的記者尚有寫「紅旗籠罩下的中國」的美國作家史諾（Edgar Snow），英國「倫敦泰晤士報」的福爾曼（Harrison Forman）。美國「經濟週報」的史戴恩（Gunther Stein），美國「政治週刊」的艾浦史登（Israel Epstein），以及我不能再記憶他們所代表的通訊機構而應列入第三類的衛爾司（Nym Wales）、蓋因（Mark Gayn）、羅新吉（Lawrence K. RoSinger）、佩弗（Nathaniel Peffer）等。

在這時期，共匪偽裝抗日與政府合作的陰謀已全盤暴露，特別在前線，共軍不獨不抗日，反在國軍之後煽惑軍心，竊購械彈，遇到機會，甚至還會公開襲擊國軍以擴大其實力爭占地盤。三十年初其新編新四軍違抗政府北調的命令，與國軍第四十師公開開火，卒遭命令取銷番號，處決其軍長葉挺一案，是政府以公正態度，應付共軍叛亂的首次懲凶。但三十二年九月十三日中國國民黨召開之五屆十一中大會，在通

過決議譴責中共破壞抗戰、危害國家案之結尾，仍「冀其切遵前聽宣佈之四項諾言，反省實踐。」故政府始終以容忍的態度，期待共匪之合作。可是，周恩來、郭沫若等過去儼然以政府大員的姿態參加宣傳指導行列，到此時期已無法再粉墨登臺了。他們取而代之方法是向記者們作地下煽動的工作。使我們主持國際宣傳工作者深悔當年怎麼心血來潮造了一所外國記者招待所，當年這所融合外記者感情的中心，到這時期竟變成了便利共匪煽惑外記者一網打盡的場所。

煽惑工作最能生效的是利用性關係。記者多男性，那末，叫女孩子作煽惑的衝鋒隊有八九不離十的把握。周郭兩匪就掌握這套玄機來推進他們的宣傳攻勢，我們的外記者招待所從此常見花枝招展的情影了。此中最受我們注意的有兩位。一位是中國小姐，它是周恩來的秘書，名叫龔澎。因為她跟周的關係，她供應的資料，特別受到外記者的重視。她也以此自重，所以她出出進進都是規規矩矩，大方得很。可是，另外一位德國小姐，名安娜的可大大不同了。她是匪方要幹王炳南的太太。她年紀三十來歲，黃頭髮，藍眼睛，作風充分大膽，十分風騷。不論白天晚上，一到招待所，就同若干年輕的外國記者們，關起房門「密談」。招待所建築十分簡陋，有時候動作太猛烈，聲震戶外，門窗為之動搖，其他記者聽了都會發出「會心的微笑」，大家知道安娜又在為單身漢們做它的「施捨救濟」了。

這一群第三種流浪的記者藉其人數之多，霸佔了我們的招待所，竟把這些自由職業性的新聞記者，予以政治化的組織活動，成立了他們所謂的「駐華外國記者俱樂部」，公推艾金森為會長，白修德與葉夏明為副會長，讓資深而不愛管閒事的慕沙做秘書，幫他們辦辦雜務，管管錢。有了這個組織，他們開始正正式式以記者團體的身分向我政府展開實際是共匪在背後指導的統戰攻勢，首當其衝的是我們國際宣傳處。

他們第一次統戰攻勢是三十二年十月，向我政府提出組織外記者訪問延安團的要求。他們公然表示，中國共產黨給中國國民黨圍困在陝北，變成抗日戰爭一團謎。說它惡，惡成魔鬼；說它善，善成仙佛，究竟如何，讓他們記者自己去看看，瞭解一個真相。這一套是共匪在宣傳戰中慫恿外記者向我作統戰攻勢經常慣用的說法。我們一貫以共匪無心抗日，實地視察只助其施展蒙蔽偽裝之技巧，緩言迭予拒絕之。不料，此年宣傳部易長，外記者中專長鑽空隙的若干人，逕訪這位新部長。突提訪問延安的要求。這位心無戒備的長官，竟認這要求很合理，一口允諾了。於是，久遭關閉的這扇門竟因此一諾而打開了，我們國際宣傳處只能退而求事後的補救。我們知道，一個記者要訪問延安，最少要花一個或甚至兩個月的時間，各通訊社與重要報紙正式派駐重慶的記者，無法抽身參加訪問，於是這重要任務必然都會落在那些流浪記者的肩頭。經過他們紛紛活動的結果，這些流浪記者中，特別是艾浦史登、史戴茵與福曼三個人爭取到每人代表了好幾家世界最大通訊社與報紙記者的名義。

這個延安訪問團既開放給外國記者，當然也應該讓本國記者參加，由國際宣傳處主持組成之，並派我們的公共關係幹員魏景蒙兄陪同前往。不料，一進匪區，匪幫竟把中外記者隔離招待，顯然的作用是怕中國記者會歪曲他們專為外國記者製造的觀感，於是，整個匪區變成了招待外賓的一座大「戲臺」，一幕幕精心導演的節目，全部按照著主腦人物的意旨搬演出來。這些特製的節目，在這群以新聞為貨品的記者看來，都是聞所未聞有最高價值的稀奇新鮮好材料，於是一個個手忙腳亂地搶購搶銷，把污濁黑暗陰險狠毒的匪區，在全世界天真的讀者面前，描寫成了一個人間僅有的天堂了。

在他們搶購搶銷的過程中，史戴恩和福爾曼還有一段非常精采滑稽的插曲，暴露了這些市儈記者見不得人的醜態。他們兩人到延安去的目的，除掉了擔任英美各通訊社及各大報特約經常發電任務外，還想搜集資料趕寫一本書，一定可以暢銷。因

此，史戴恩獨抱鬼胎，一到延安就把匪幫供給的資料著手寫作，日夜加工，不到一個月已完成了二十多萬字的鉅著，命名「中共的挑戰」(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裏面繁複的數位以及統計表格應有盡有，真是洋洋大觀。鉅著完成之後，他立刻暗洽中國軍方先乘飛機回重慶，在重慶趕洽美機飛美國，以重價向美國書商洽售。美書商以要價高、字數多、未能立決。此時，福爾曼隨團訪問匪區返延安，發現史戴恩早已溜走了，著了慌，知道給他著了先鞭，那還得了。於是，一邊日夜趕稿，一邊設法找飛機。他在最高速度打字機敲打之下完成了五六萬字匪區的描寫，命名「中國赤區報告」(Report from Red China)，盡力鑽頭覓縫搶到了美軍機位趕到紐約找書商。他的書，字數少，要價低，幾次談判立刻成交，竟搶先史戴恩成了暢銷書。史戴恩忍痛削價，跟著問市，也成了暢銷。兩人都因出賣中華民國而成了富翁。訪問延安，因此變成了流浪記者名利雙收的一條捷徑。跟著要求前往的有事後寫成「中國的雷聲」(Theunder out of China)的白修德與為紐約時報寫成一系列「訪問延安專欄」的艾金森。我們看到這種開門揖盜政策危及國本，堅主停止，於是第三批申請續往者不再獲准，不幸，不准外記者續往延安的結果，予共匪利用外記者向我政府發動第二次統戰攻勢之口實。

駐華外國記者竟於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以「駐華外國記者俱樂部」民間法團的正式名義呈請蔣委員長放寬新聞電報檢查尺度。又於同年八月以同樣內容的要求，向宣傳部部長提出抗議，列舉事例，證明我們檢扣新聞電訊的不當。外國記者經國際宣傳處抗戰以來培養而成的融洽氣氛，經過這些流浪記者的從中作祟，不獨從此煙消雲散，竟至發展而成公然敵對的姿態。當然，解除他們不滿的責任最後還是落在我們國際宣傳處的肩膀上。我們以光明正大一切公開的姿態，說明我們配合國家處境所定的國策來做我們檢查外記者電訊的標準，並把我們檢查規則譯成英文供他們參考，確證我們每條新聞檢扣的確都有根據。同時我們提醒他們，新聞受檢是國際通例，何獨責中國！

外國記者跟我們這一連串不愉快的事件，只能算正劇登場的預演。正劇登場是民國三十三年史迪威事件的醞釀階段，這些外國記者竟一窩蜂地變成了史迪威的啦啦隊，詆毀我國元首，助長匪幫氣焰，作種種摧毀我國本的工作惟恐不能盡其極。最令人意外的，所謂「駐華外國記者俱樂部」的會長艾金森，竟跟著史迪威返美，為紐約時報寫一系列的專欄，公然斥責我 蔣公拒任史迪威的不當。紐約時報久為支持我政府美國數一數二肯說公道話的報紙，今作此轉變，其他美國記者自必跟著起哄，對史迪威事件的歪曲報導與失當評論竟成美國輿論界的一時風尚，其對我之傷害實至鉅至深。

最後我們要使深入的檢討，美國記者雖經共匪在背後撥弄，達成其統戰陰謀，實際他們態度的惡化還是受美國政府對華政策轉變的影響。太平洋學會的魔手操縱了華府國務院，滲透了駐華美國文武機構，美國記者能有幾人有高深智慧不受左傾煽惑的影響的呢！

伸張正義的艱苦奮鬥

珍珠港事變提高了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卻又帶來了這許多飲恨難伸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是我們這一群負責國際宣傳者亟需面對解決的問題。至如何解決，我們瞭解問題牽涉之廣，不光是直接面對的這一個助桀為虐的記者群，而應擴大範圍摸到事變的根，找到播弄美國政府決策太平洋學會為主的那一群左傾美國人。

這些左傾美國人控制了美國國策的形成，使我們的宣傳業務一開始就遭遇到迎頭的打擊。但，與侵略頑敵早已困鬥了四年多的中華民國，在太平洋戰爭全面展開的這個開頭，還肩負起單獨戰爭的重任，它有助於盟國共同抗敵貢獻之大，無論怎樣歪曲掩蔽，仍難逃一般老百姓雪亮眼睛的透視。因此，我們在政治環境十分惡劣的這

個階段中，以正義打擊邪惡，憑真理糾正欺騙，將事實駁斥謊言，仍能使我對美外交爭取到美國輿論界主持公正的支持。

實際，世界局勢的轉變，我們辦國際宣傳也跟著作了重要的調整，把過去掩蔽的組織改組而成公開活動的政府機構。業務重心當然還是在重慶巴縣中學的國際宣傳處，仍由顯光兄以宣傳部副部長名義指導由我主持來推動國際宣傳工作的發展。業務的重要性隨國際形勢的轉變而加增了，可是辦事的人，我們仍持求精不求多的原則。

國內部分全處連工友不過一百人。工作重心，集中在為宣傳原料供應中心的編撰科。這科先由沈劍虹任科長，後由趙敏求、萬君和先後繼任。其下工作者只有朱撫松、鄭南渭、陶啟湘、周翻萍、謝善才等不到十個人。可是，他們每一個人能獨當一面地打天下，每一個人都是文武全才、能征慣戰的宣傳健將。說他能文，坐下來一陣嗶嗶拍拍打字機寫出幾千字的英文稿，不下一流的英美記者；說他能武，經常配合政治要求與戰局丕變作國宣處遍佈全世界各辦事處宣傳原料的供應，奔波採訪。三位先後任科長，綜合全科編撰行政，作全盤處理績效彪炳，當然功不可沒。即每個工作者，除處理日常規定的科務外，也都各有特殊的貢獻。此中最顯著者二人。一為朱撫松，他是國宣處在每一年終結要出板一本國情綜台報告書的主編者。此書初名「戰時中國」（China

at War），後來老實正名為「中國年鑒」（China Handbook）。厚厚的幾十萬字，可作中國編年史稿看。顯光兄與我信任撫松才高騰任，稿成不加復核逕予付印。第二人是周翻萍，當史迪威橫行無忌的階段時，我們商得美駐華軍方的同意，派周翻萍跟著史迪威，名義上幫助他處理宣傳事務，實際隨時予以過濾及監視，翻萍經常有報告來處，確證其達成任務。不幸，入緬軍敗退印度，翻萍隨軍翻過野人山，受疫癘猛獸的威脅，幾乎送掉了性命，其冒險犯難之功，亦值得記錄。

國宣處國內部第二個重要單位是外事科。這科的主要工作，為外國記者服務。他們要什麼，這一科就得給得他們心滿意足。當然，記者要的，最重要的是新聞，因此給外記者找新聞路線，陪同他們做翻譯以及打開任何外國人到中國活動一切不便利的障礙，都是外事科的工作；而此中最重要的是，每星期規定要開的一次代表中國政府發言人開的外國記者招待會。這科的科長先為季澤晉，繼為張彼得。工作者計有沈錡、朱新民，徐鍾佩、郎魯遜等。實際，朱新民是俄文專家，郎魯遜是法文專家，有關蘇俄記者與法國記者的事，大家還找朱與郎，季澤晉管不了。另外還有檢查外國記者電報一事，論理應是外事科的重要工作。但因其太重要，初期是我處長攬權，搶過來我自己幹；後來，魏景蒙由香港辦事處調回重慶，因為他應付外記者能剛柔並用，是電檢聖手，我就把這副擔子交給他去挑。因此，無形之中，外事寇里的朱新民與郎魯遜因電檢而經常接觸魏景蒙，就是沈錡與徐鍾佩也因檢查英文外電而找景蒙解決困難，於是，擺得外事科長季澤晉反而好像空閒起來了。說他空閒，實際也不。因為每星期的記者會發言人軍事方面由徐培根將軍一貫負責，他的切實誠摯，我們深慶得人。季澤晉除為他作譯人外，無需多費精力。惟政治發言人，未能確定一個人，故必視國情之變化，隨時邀請熱門新聞的主管長官來發言，那就大費周章了。此外外記者臨時找問題、求解答，在季科長領導下的外事工作還多得很哩。

國宣處國內部其他單位計有：彭樂善領導的廣播科，由馬彬穌任英文，郎魯遜任法文，朱新民任俄文，以及對敵科全科合編的日文稿；李欽瑞領導的攝影科，有攝影員王介生、郭琴舫與顧炳梁；崔萬秋領導的對敵科，有林忠、楊芳潔、吳世漢、彭澤源、張棟材、高璘度、胡風等以及陳耀柱預導的總務科，連同編撰、外事，一共六科。此外，還有唐鄰柏主持的「資料室」與邵毓麟主持的「日本研究室」兩室。六科兩室之外，還有兩人值得一提的。一是秘書倪源卿。他負責給董副部長每週寫一篇報告式的長函，遍寄國宣處國外單位主管，俾得溝通對國情之瞭解。這一套信，真寫得深入而周延，封封都可作報紙專欄文章讀，我欽佩他政治觀察力之敏銳落實。另一

個人是王家楫，他是我一手提拔起來的，真美善投稿的常熟小同鄉，中文有根柢，英文都看得懂，是翻譯能手。我薦舉他為總統 蔣公譯了「荒漠甘泉」。最後，有關國宣處國內部，我們做成了一件空前也可能絕後的奇跡，不能不鄭重一提。那就是經我們的努力，我們在重慶巴縣中學成立了我中央政治學校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合辦的一所專門訓練國際宣傳人才的新聞學院。這是顯光兄深感國宣事務日見重要而真能勝任的人實在太少，因此決心要在重慶創立一所專門訓練國際宣傳人才的新聞學府，曾以此意面陳 蔣公，當經垂示，如可得適任教師，當可准如所請。經顯光兄乘隨蔣夫人赴美之便，在紐約徵得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愛克門的同意，跟國宣處共同合作創辦這個教育機構。經過他的同意，國宣處聘甘露德（Rodney Gilbert）、貝克（Richard Baker）、德賴萊（Anthony Dralle）、勞傑士（Floyed Rogers）四位教授，而由克勞斯博士（Dr. Harold Cross）為我準備創立的新聞學院教務長率領來華。同時，在國內，我們就準備在巴中的外國記者招待所作各教授食宿場所，國宣處辦公處專辟二室作課堂，並經呈准國民黨中央把這新聞教育機構規定為中央政治學校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合辦的新聞學院，派定顯光兄為院長，我為副院長。這學院辦了兩年，青年爭先恐後以得入這學院為榮。學員每班以二十人為限，必須大學畢業。中國方面，我們請甘乃光教「中國政府組織」，潘公展教「三民主義」，馬星野教「中國新聞史」，皆屬實踐必需課。可惜，如此難得的學府只辦了兩年就勝利還都而停辦了。經其訓練出來的人不到三十位，然皆有卓越之成就。今在臺灣有政大教授王洪鈞，英文郵報董事長余夢燕，其他我記憶可及的尚有前駐哥倫比亞大使館參事周森鏞，前駐牙買加大使凌崇熙，在聯合國秘書處服務多年的李惠苓與他的太太殷珊姑，以及沈昌瑞（沈昌煥先生的胞弟）同他的太太歐陽美生，又有名翻譯家高克毅的妹妹 Julia Kao 等，都是國際宣傳處新聞學院訓練出來的高材生。

實際這階段國宣處的調整重心還在它的國外網，因為，中國既參加了太平洋全面戰爭是全世界抗暴聯邦之一，宣傳成了大家公開相互溝通的重要國策，自不需再

像過去掩掩藏藏要假借外國人來推動我們的國際宣傳了。因此在這階段我們的海外宣傳網面目一新，它的面，遍及全世界重要據點，每一據點站出來的主持者都是能文善辯兼具組織能力的上選幹才。

當然，最重要的兩個據點是紐約與倫敦。在紐約，我們找到了上海麥倫書院院長、國際公法學者夏晉麟。他在美人丁丕來主持我英美宣傳時曾在倫敦兼任宣傳業務，頗露了幾手宣傳績效，因此，在這需國人自主轉變關頭，我們就決定請他出來主持美國宣傳重鎮紐約辦事處。他一開手就把他原辦的「泛太平洋新聞社」，改組成「中國新聞社」，向美國國務院登記為中國政府的新聞發佈機構，同時他立刻組織「中國新聞社」的「芝加哥分社」，由為在美中國救濟團體服務的一位元美國宣傳家伊溫斯（Henry Evans）主持。不久伊溫斯應召從軍，即向外交部商調副領事鄭寶南繼任主持之。夏晉麟又組織「三藩市分社」，初由前上海大陸報美籍記者羅斯孝（Malcolm Rossholt）主持，後羅斯孝亦從軍，由國內調派沈劍虹接任主持之。很快地夏晉麟在一兩年間成立了北美洲全面的宣傳網，除上述三處外，復在華盛頓以前上海申報主筆陳冷血的兒子陳亦為主任，加拿大的蒙特婁以有修養而英俊的夏威夷青年余銘為主任，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以經濟學教授林霖為主任。在他紐約的辦事處裏，夏晉麟特別倚重前上海大陸報記者高克毅，幫助他處理全盤行政任務之外，並把國內編輯「戰時中國」的工作接辦過來。另外還有一位林侔勝，是泛太平洋新聞社轉任下來的工作者，主編一份雜誌名「現代中國」（Contemporary China）。這兩份雜誌常給各國報紙與廣播評論家引用反映中國的輿論。同時，夏晉麟又聘請前東吳大學校長楊永清組織中國問題講演處，負責邀約並接受有關中國問題演講的種種服務。我們如綜合北美宣傳作全面檢討，可以說它大量資料的供應能促成各辦事處要什麼有什麼的要求，最大的功臣是前期已經說過的那個美國西岸範都拉由美籍牙醫生史帝華博士主持的電訊接收站。太平洋戰爭一開始，我們就撥款加強這個收報台，並予史帝華以每月規定的薪給與辦公費，使他這個私人收報台變成專為我國宣處每天二十四小時工作的正式地下

收報台。史帝華的熱誠與全部設備加強後與重慶國宣處巴中防空洞內發報台的緊密合作，使這一個電訊管道的供電訊真變成像自來水管供水一樣的日夜不停。不獨我們編撰廣播寫稿同人每天寫的每一個字都由這管道流到範都拉立刻以有線電轉送紐約交由夏晉麟處理，並轉送各宣傳據點，就是外國記者有些寫稿（電稿應由我正式電報局受發、拒收），也很多代為電遞轉送。這是我們在北美宣傳一大助力。

扼要檢討，我對美關係，雖經美國太平洋協會左傾勢力造成了對我國極不利的劣勢，但在聯絡美國重要傳播樞紐，爭取美國民意支持，我們還是勝利的。重慶的那一群流浪記者，雖在美國傳播界翻起一度波瀾，但太平洋戰事實上還只有我中華民國在打，這是事實，勝過任何雄辯。因此，紐約時報雖經艾金森的歪曲報導變了質，但仍保持著實莫安公平落實的記載。在這階段中最早訪華的美國名記者是國際通訊社的楊吉姆（James Young）。他本受日軍之邀，要他去訪日據大陸，遭他堅拒，反來重慶，適遇大轟炸，寫了二十篇現場報導，被全世界英文報紙普遍轉載，重振中國人在國際間之威望。第二批重要美國記者來華的是美國史格裏丕斯——霍華德報系（Scripps Howard Newspaper China）與合眾社主持人霍華德（Roy Howard）領導著的十人訪問團。經 蔣公親自招宴霍華德，交談甚久。霍氏本為日相松岡至友，今拒松岡邀而來華專訪，返美寫一系列澄清遠東局勢助我宣傳的報導，其擇善固執之態度令人欽佩。第三位美新聞界巨頭來訪者為北美報紙聯盟（North American Newspaper Alliance）主持人甘尼森（Baya Arch Gunnison），經 蔣公親自接見，其訪稿遍載美國四十七家報紙。另外更如上期所述「時代」、「生活」、「幸福」三雜誌在美最享盛名的發行人亨利·魯斯的影響仍保留其對我主持正義、真理之原則。由此足見在這階段美國傳播界接受我以誠相見的宣傳感染，在外交上多多少少糾正了美國政府對我態度的偏差。

葉公超在倫敦辦事處的作風卻跟夏晉麟在美國的大大不同。夏重組織而葉重說服；因此夏的成功，在能運用美國輿論群眾的力量，來糾正政府，而葉的成功，在

能說服英國社會菁英，造成督責政府的壓力。這也是個人稟性的不同造成作風歧異。葉公超才華超人，自信力強，故大事一肩挑，什麼事都不信別人能比他做得更好。因此，他總以為編新聞，印刊物，組織什麼廣播演講團體等等我們學各國的宣傳項目，都是做給人看的宣傳表面工作，既成一個政府宣傳機構，我們都應該做，但不會真有多少功效。宣傳重心要具真功效，應下工夫選定重點，運用獅子搏兔的全力來擒住這重點而善為運用，這才能以不露聲色的靜態中發生驚天動地的績效。他就以這個原則辦我歐洲中心的倫敦辦事處。處中辦事人員最初只有「小貓兩隻三隻」式的兩個英國雇員，後來也只向總處調了朱撫松一人去做助理。因為，把重慶總處送去的宣傳品照規定推動宣傳業務，這些人的確夠了。可是，這只是做給人家看的，他不信有任何績效。有績效的工作要他自己幹。幹，只幹不說，默默耕耘，卻建了很大功績。這份功績埋在國際宣傳處的最高機密檔案裏，這份檔案，我們沒有移交給下任。因此，他在倫敦的真貢獻，只有顯光兄與我和他自己三個人知道，現在事隔快要半世紀，他和顯光兄都墓木已拱，不妨讓我這天寶當年的老伶工在這裏重彈往事，揭開公超對國宣在英工作的重大功績吧。

公超兄以為在英國宣傳不同在美，因為英國是一個控制遠東的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念念不忘戰後恢復其威勢權力。故在英國，我們雖為盟邦，自己公開說話，不會像美國那樣發生效果，故他認為在英國，做一些既為盟邦不得不做的表面文章外，真想發生效果，還只能憑他三寸之舌，說服英國社會菁英，來替我們中國說話。他在英默察了一年餘，決定所選社會菁英應從四方面著手：第一方面，當然是新聞記者，第二方面是青年領袖，第三方面是書籍評論家，第四方面是廣播評論家。再經一年餘廣交默察的結果，他竟能在這四方面找到了理想的物件。第一方面新聞界，他找到「星期日觀察報」（Sunday Observer）與「曼徹斯特晚報」（Manchester Evening News）的記者格林（G. M. Green），第二方面青年領袖，他找到英國青年輔導會的教育主任杉姆森（Gerald Samson），第三方面書籍評論家，他找到了英國參議會（British Council）

的中國科長葛爾（E. M. Gull），第四方面廣播評論家，他找到了前任北京大學英文教授現為英國廣播公司（B. B. C.）華語主任的恩伯孫（William Empson）。公超達成這個任務時，適顯光兄赴英，作口頭報告。顯光兄囑其以實情密告我，在處存檔並照撥所需款項。茲將公超英文來件，摘要譯錄如下：

「去年回國述職時，我們商定在英實施的反共與責共的秘密計畫，經與有關物件接觸，均已得預期的良好反應。當然，推進時並不十分順利，屢遇險阻，皆經一一克服。所需經費，仍不超過董顯光博士本年度允撥之兩千英鎊。」

「董博士今在倫敦，曾當面報告此案並詳述效果。董公似甚滿意，囑立即以最機密方式向你報告存檔，並將所需經費編制預算以便根據撥款。望在年底前照撥。」

「茲將爭取英國宣傳物件案內容報告如下。」

「(一)格林為「星期日觀察報」與「曼徹斯特導報」記者，其評論中國問題態度公平獨立最得美國讀者之信任。他不斷強調英國如偏向中共，英國在華商業必大受打擊，日本敗退後中國將無寧日。對中國今日之安定，他一再強調是蔣委員長領導之功，他在「星期日觀察報」每期有專欄發表他的文章，故影響力很大。」

(二)杉姆森原為路透社駐華記者故對中國具有好感，曾寫有關中國的書三年內二本之多。英國青年輔導會常辦露營，招集英國青年達五萬人之眾。他經常在營中自己演講，並約請名人輪流作業，講題每常涉及中國。同時，他另外在其他各處演講且以英國新聞處職員身分出場講中國問題，我曾聽過他這種演講兩次，感到異常動人，特別對中共問題令人感發。他曾競選議員，即在競選演講中也會提到中國的蔣委員長。他是一位很難對付的人，經常還怪我們沒有給他足夠的資料。」

(三)書評作家葛爾，他是專喜歡評論有關中國書籍的評論家，頗受英國出版界的重視。初任英國參議會職，使因病退休，仍寫書評，特別反共。「泰晤士報文藝附刊」、「星期日觀察報」、「星期日時報」、「觀察報」、「時與潮」、「十九世紀」等等刊物都搶載他的文章。

(四)恩伯森為前北大教授，今主持英國廣播公司華語節目。自我來英設辦事處起每年雙十節與「七七」必有特別節目。最近四、五個月，經他的協助，使英國外交部給英國廣播公司有關遠東宣傳指示，把中國也列入其中。我曾邀請他以顧問身分參加我的辦事處。他以有背英國廣播公司規定婉謝，但保證如有餘暇必盡力助我。我提議，他們公司的國內部對中國常取不公平的姿態，希望有人能糾正它。他叫我找魏思德（Anthony West）。魏思德說，他只是一個編輯，恩伯森才是決策者。於是，我再長恩伯森。最後協調，得恩伯森與魏思德兩人的合作達成了我的目的。後來，恩伯森得英國廣播公司董事會通過一道對中國共產黨的臨時決策：對中共問題儘量採用最可靠的消息，並應注意國民政府是英國政府唯一承認之中國政府。在這決策下，魏思德的運用就左右逢源了。恩伯森大家只知道他是一位親華的詩人，也不會有人懷疑他另有作用。實際他跟魏思德合作無間。

「我感到能得到這四人合作是異常的幸運。問題的艱險，只在我正式邀請時，倘被一口拒絕，這消息一洩漏，後果的可怕，不可想像。我可以用不著說，我辦公室裏，沒有一個人知道我們工作中有這一份最機密的活動。更要時時警惕的，我所接觸的四方面，每方面都不會知道或猜疑我跟其他三方面的關心。因此，此後倘然要我繼續這套工作，你必須給我絕對的保護與合作。

「臨時我又想起，最好此款勿由銀行匯來。應如何送來，當另函奉告，最好繞道第三國家。假定在兩星期內不得我通知，我計畫在年終返國面領，總計至年終需

款一千九百七十英鎊。以後公文中，切勿提起本報告。倘對本案尚另有指示祈用專差遞送，切勿借用外交郵袋。」

公超對此專案之成功如此得意並慎重保密，即足代表其在英活動之全部作風：著重各個要點的說服，輕視廣大組織的運用。實際，這也是配合英國政治環境不同美國最適當之措施。至其報告結論中所提撥特款問題，他有詳細報表，說明用途，可以說，涓滴歸公，無一文無著落，惟這才真是國家機密，到今天，這份支付報表還不便公開。顯光兄和我是絕對信任公超的，我們確信他一人的機密活動可以比之在美洲幾十人組織活動的績效而過之。邱吉爾的狡猾，只怕戰後中國之強大，儘量在外交上壓抑我們，然仍不能不顧到自己國內輿論主持正義一致反共的督責，仍尊我為四強之一領導聯合國，仍取消帝國主義動機訂定屈辱我的不平等條約，仍邀我參加共同商定勝利條件之開羅會議，最後竟不得不接受蔣委員長由美國單獨主持日本投降之建議。這一些都是公超幕後活動不見經傳的功績，知之者只有顯光兄和我兩人。

國際宣傳處的組織是配合抗戰需要來作配備的，因此，歐洲重心只在英國，其他歐洲國家忙著自救抗德，都沒有閒情來顧到遠東，因此，我們除在巴黎設一個發發宣傳品的小辦事處外，其他歐洲各國都不設處。為了同樣理由，我們在亞洲，配合抗戰需要，只在香港設一個辦事處，為我宣傳出進的吞吐站。香港淪陷，主任溫源甯離職回去做他的立法委員，董壽彭也辭職他去。本階段初期，緬甸未失，我們在仰光設辦事處代香港執行吞吐任務，不久，仰光又陷敵手，這個吞吐站又不得不轉移到印度的加爾各答。緬印先後兩個辦事處皆由原為青年會總幹事的駱傳華繼任之。說吞吐，事務相當繁重，應分人與物兩大項分別處理。論人，凡受國宣處邀請或自動訪華的國際知名人士，要到重慶都由這吞吐站迎送招待。論物，凡國宣處這個供應中心所制宣傳品，例如新聞印稿、小冊子、書籍、照片、錄音錄影帶、電影片等皆由這吞吐口分別轉送給國宣處海外各辦事處。

國際宣傳處在重慶末期算是組織最完備人才最集中的階段，可是如上檢討，組織還是那麼簡單，人員還是數得清的那麼幾個，然其發揮出來的影響，確能在美英兩國樹立公正有力的輿論，使中國外交尚不致在羅斯福的顛預與邱吉爾的狡檣運用中，完全崩潰下來。我可以坦白檢討，國際宣傳處實有挽救危局的功勞。同時，我也需承認建立這功勞的人，誰也沒有份，只是顯光兄是一個領導有方獲此成效的人。可是，顯光兄並沒有什麼超人能力，他的領導之能發生這樣偉大效果只靠他得 蔣公的倚重與日俱增。國運轉入最後決勝敗這個重要關頭，蔣公警惕，外交樞紐親自掌握，凡有關國策轉變的國際要人來訪皆親自談判，而這些重要談判進行中，必由夫人從旁襄贊，顯光兄擔任翻譯。蔣公重視這些談判，每次談後必有中英文紀錄，因此顯光兄一邊翻譯一邊還得把雙方談話內容記錄下來。客去，他趕回處，立刻把兩方談話儘量如實寫成英文，交我趕譯中文，馳返官邸交 蔣公核可後，英文趕送對方，中文歸檔。所謂這階段來華的國際要人，例如，珍珠港事變前率領美國軍事訪問團來華的麥格魯德準將，羅斯福特代表白宮行政助理居理。珍珠港事變後，來華商太平洋戰區合作事宜的英國戴尼斯上將與威佛爾總司令，美國勃蘭德總司令。跟上來就是史迪威事件的糾紛與陳納德建軍的接洽，並與美國中印緬空軍總司令史德萊登因將軍與東南亞盟軍總司令蒙巴頓的商談。最後，赫爾利來華的解紛與魏德邁及索爾登將軍的任命，以及美國副總統繞道莫斯科來華之訪問。同時，元首出國親自參加外交工作，一次訪印度，一次出席開羅會議。皆由顯光兄隨往任翻譯。凡此外交活動，先後都是元首自己智珠在握，隨機應變，我們國際宣傳處因為顯光兄的參與密勿，也可以跟著外交上的轉變，絲絲入扣地作宣傳的配合。更因為這一點關係，國際宣傳處樹立了發表中國重要新聞最迅速最正確的權威，予我們宣傳運用以最強有力的臂助。

略得溫馨的貧瘠私生活

我前面已經肯定指出，太平洋戰爭中在美國太平洋躍島進攻的戰略未成熟前，還是由我中華民國，在緬甸打外線，在中國大陸打內線，一肩挑起來的。業已經過了將近四年苦戰的中國，竟還能夠繼續挑起這樣的重擔，這不是不可想像的奇跡嗎？

有人說，這奇跡是可以想像的，因為，中國參加了國際戰，自有友邦的合作可為支援。對，我們的確有友邦，這友邦是自認為負擔自由國家共同兵工廠重任的美國。那時期中，美國國會通過了所謂「租借法案」來實踐美國為國際兵工廠的承諾。因此，我們檢討這奇跡的奇不奇，只需檢討美國的「租借法案」究竟幫了我們多少忙？大戰結束後的統計表示，英國在美國「租借法案」中所得的物資最多，相當於二百七十億美元，蘇聯次之，得相當於九十億美元，而我們中國所租借到的物資僅相當於十三億美元。實際我們收到的還不及此數之半，因為有些物資運經西伯利亞被蘇聯扣留了，有些運經緬甸、印度被英國借用了，還有好些在日本投降時還留在印度的倉庫裏的，經馬歇爾下令就地焚毀了。就是這寥寥的六、七億美元的租借物資運到中國還多控制在史迪威的手裏，完全用在與他自己有關的「中國駐印軍」與在昆明的「遠征軍」。因此，中國其他抗日部隊可說未沾美援涓滴的光。可是，忠厚的中國政府，借款照償，分文不少，完全用「反租借」方式抵償。所謂「反租借案」；是美國在中國境內造飛機場，買糧食，發薪餉等等費用，多由中國政府負責給付來抵償「租借法案」借到的美援物資。

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在太平洋戰爭中名義上得到了美援，實際我們雖增加了一個緬甸戰場的負擔，並沒有得到任何美國經濟支援的實助。可是，珍珠港事變之後，頑敵日閥急求抽身中國泥淖，在我大陸迭發大規模之攻勢，迄其最後投降之日始終沒有停止過。最令人不可想像的是敵攻長沙，二十八年、三十年兩次失敗之後，在其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前，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動三個師團、三個獨立旅、二個

炮兵旅、一個工兵旅，一個飛行團、一個野戰輸送隊，一齊出發，分路第三次進攻長沙。經國軍堅強抵抗，苦戰了十一日，競殺敵盈萬，打了一個大勝仗。此後，三十一年之浙贛會戰，三十二年的鄂西會戰、常德會戰，三十三年之豫中會戰，這些大陸會戰之外又加上史迪威在緬印發動的兩次緬甸爭奪戰，我們在整個太平洋戰爭中這樣只有犧牲一無所得的出力貢獻能不說是奇跡嗎？這一連串奇跡中最奇的成功，是在三十三年底三十四年初日閩在大陸作最後掙扎，集中最後可能調動的兵力，遵我國宣處過去繞道廣西貴州入川的西南公路，從南面進攻重慶。他們竟能一路順風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占桂林，十一月十一日占柳州，十二月一日占貴陽，二日竟佔領了直逼重慶的獨山。卒經 蔣公以處變不驚的態度，一方面發動「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動員號召，一方面調動精銳部隊迎戰，並派何應欽等政府要員親赴前線撫慰軍民，竟能轉危為安，在三天內打退了敵人。這三年中一連串不斷的大陸抗日大會戰都靠我們自己的實力，並沒有沾一滴美援的光。試以美援空軍為例，羅斯福曾親允 蔣公撥飛機五百架助我組織新空軍。五百架的承諾的確實踐了，可是只組成美國十四航空隊，名義上歸同情中國的陳納德為司令指揮，而實權還操在史迪威的手裏。史迪威奉美國國務院以政府命令方式，規定這五百架飛機中的兩百架指定只盡保護他在印度練新兵所用機場的任務，不作支援中國部隊之用。剩下來的三百架，史迪威又指定以一百五十架專用在緬甸戰場，因此陳納德這個空軍司令可以掌握的只有一百五十架了。就是這一百五十架，開動要用汽油，汽油又控制在史迪威的手裏。陳納德想駕機助中國部隊作戰，向史迪威要汽油，好像叫化子要飯那樣艱難。在豫中會戰十分緊急的時候，蔣公電史迪威撥汽油並令停在成都機場的美機起飛助戰，史迪威竟敢置之不理。因此，只需以空軍為例，大陸部隊的抗日未沾美援一點光，偏可概全了！

不沾美援光，這三年苦戰竟能自力撐下去，這奇跡一點不假，簡直不可想像。但，不可想像是局外人釐測的外行話。我們自己檢討，這顯然是 蔣公以空間換時間戰略的成功。這戰略所估計力量供應的來源只簡簡單單兩個根：一是「廣土」，二是

「眾民」。我們要克服頑強的暴敵，唯一必勝的辦法是使它陷在廣大無垠的中國領土內受不屈不撓十億中國人的包圍，無以自拔。但「廣土」是自然的貢獻，我們何幸得此不勞而獲的天助；「眾民」卻需要人為，必須把在戰爭促成的貧瘠環境中顛沛流離像一盤散沙似的十億中國人，前線後方打成一片，心連心、手聯手，形成一個克敵制勝的大團結。這才是真力量。我們貧，我們瘠，可是我們有必勝的信心，我們在貧瘠生活中直感到士氣如虹，壯志凌雲的一股豪氣，激發了中國一定強的自信。

說我們貧，這一時期的確窮到了不可想像的程度。我們原本是一個貧弱的國家，竟能抵抗頑強日閹六七年，全國上下，當兵的當兵，逃難的逃難，剩不到幾個人從事生產，真拚得民窮財盡。政府的收入必然因此而減少，可是仗還是要打下去，戰費的支出卻必因此而增加。這樣的入不敷出的財政狀況，怎樣還能維持下去呢？唯一的辦法只有不斷加印鈔票來飲鴆止渴。這個「鴆」，是明知故犯的通貨膨脹，物價日長夜大，永無止境。在這惡性循環的經濟狀況中受打擊最慘重的是拿薪餉過日子的前線士兵與後方公教人員。因為薪餉是固定的收入，物價卻是天天跳高的支出。以抗戰最後階段民三十三、四年比之七八年前抗戰開始時的物價，竟跳高了五百倍，戰前米價十塊錢一擔，抗戰結束前漲到五千元一擔。

這樣的全國經濟狀況當然影響到我們當時在國際宣傳處裏工作者的私生活了。我們國宣處同仁的生活與一般黨政機關有一個絕對不同的特點，那就是，公家照顧到職員私生活，例如無償供給職員個人與家庭宿舍，與單身職員的伙食，同時待遇無職級之分，副部長處長食宿與最低級員工沒有多少差別。

我們生活得幾像討飯叫化子那樣的窮，可是我們穿著打上「補釘」、「後顧無憂」的褲子，踏著露趾脫跟「空前絕後」的鞋子在大街上走，自己當然還是昂首挺胸高視闊步，一點不感到寒酸，就是一般人也不會因我們衣衫襤褸而輕視了我們。因為，這時候，特別在重慶，窮是普遍的，襤褸變成了社會上正常的現象，富反而成了

特殊，錦衣玉食因此竟是大家側目的反常現象，大家窮而你獨富，必然犯了囤積居奇之嫌，有錢人只能關上門在人背後享受，誰也不敢馳騁在人面前，炫耀他們的財富。那時候的大財翁，大家知道，是往來滇緬公路上開巴士或卡車的司機，因為他們每開一次由仰光回昆明的車，必能夾帶價值幾十倍甚至百倍以上的大批私貨，變賣發財。但，這些司機雖住著高樓大廈，儘量享他人背後的豔福，可在人面前還不敢抬起頭來。因此，窮比富高，是我們這些公務員在那時期足以自慰而自傲的心態。

「貧」雖打不倒我們，「瘠」的壓力卻使我們幾有難以抵擋之勢。這是生理上的困擾，給我們的體康以重大的威脅。最主要的因素是重慶這個山城而兼霧城的地理環境予我們生活以沉重打擊。

說它是一個山城，整個重慶的馬路都是忽高忽低，上坡下坡，波浪式的路面。因此，我們不坐公家汽車，惟一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是公共汽車。可恨我這昂藏六尺之軀，站在公共汽車裏，頭會觸到車頂，無法看到車窗外的站標，常常誤站走許多冤枉路，因此怕坐公共汽車。公共汽車不坐，重慶還有另一交通工具可利用。那就是人力車。可是，坐在人力車裏，你會抱著傾倒出來的戒懼心態看拉車的人往前沖。因為，路面是波浪式的，上坡時，車夫當然拖著車梗一步一步慢慢向上爬，可是到了下坡時，他竟會把車梗蹺得高高地，兩腳點地像是騰雲駕霧般讓車子自己滑下去。你坐的車身當然向後翻，使你感到隨時會像畚箕裏的垃圾向後倒出來。因此，人力車我也不敢坐。公共汽車跟人力車都不坐，我在重慶的行，就只能靠自己的兩條腿了。以營養不足之軀，公私往來全靠自己走，難怪我在英國大使的酒會中會昏倒在地了。山城的另一予我們生活的打擊是水的供應。重慶的自來水準時供應無缺，不幸遭日寇轟炸之後，水管多處受損，致令其供水時斷時續。當其斷時，我們不得不專雇大量工人向嘉陵江裏去挑水供大家應用。遇到這種時期，真變得滴水如金，除了煮飯澆菜之外，洗身考慮只能在極省儉的限度中進行，這又構成生理健康的一大威脅。

真正構成我們生活最重大的威脅，還是重慶的霧。說到霧，我們第一個反應是應該謝謝它。因為霧保護我們不受敵機轟炸之苦。一年十二個月，重慶在霧的籠罩下，自八月至明年三月一共八個月之長，因此，無霧季計只有四個月。可是，不談轟炸來估計這每年八個月裏在濃霧裏的重慶戰時生活，實在是不可想像的艱苦了。俗語說：「蜀犬吠日」，真是描寫重慶霧中生活最確當的四個字，因為，大家習慣過著不見太陽的日子，太陽偶然露一次面，狗都要叫了！濃霧把每個人裹在水蒸氣裏，空氣的污濁可以想像得之，因此，使我們的「貧」帶來了嚴重「瘠」的威脅，流行著各式各樣的病。最普遍的是瘧疾，在霧氣包圍中，蚊子孳生多，瘧疾傳染自然快。吃了雜物淘不盡的「八寶飯」，這些小東西經常沉湎到「此路不通」的盲腸裏而生盲腸炎。在這種環境裏跳蚤、臭蟲多得無孔不入，不獨在床上橫行，還會侵入辦公室，鑽進辦公的藤椅裏。我們要叫工友隔些日子用開水澆大家辦公的藤椅，因為不澆，坐上去雙手擱在扶手處不久就會發癢。重慶山城沒有魚，大家不養貓，變成了老鼠橫行的世界。它們多得不怕人，竟至白日過街也沒有人叫打。因此，傷寒也變成很流行的疾病。總結一句話，在這長期看不見太陽濃霧包圍的環境裏，就算僥倖沒有得什麼病，也都是東倒西歪的病夫樣了。我自然不會例外。說苦，這才是我無法擔擋的苦。

所幸的是，在這貧瘠交迫的環境中，我的生活竟得到少許溫馨的慰藉來支撐我的奮鬥。抗戰退到重慶，國宣處的同人，都從武漢時期的單身漢變成有家有室的夫妻檔了：有的是童男童女配成了對，有的是妻兒留在淪陷區接來團聚。促成大家歡享家庭之樂方面，我貢獻過很多的助力。現在，眼看珍珠港事變後的日寇凶勢香港就要淪陷，由上海轉飛重慶的唯一交通管道就快斷了，益以上海租界不再是可免敵脅的禁地，那麼，輪到我自己，到了非把馥貞和三個兒女接來不可的重要關頭了。於是，我轉托國宣處香港辦事處的董壽朋給馥和子女買四張由滬渡港的船票（那時候還沒有空航）寄給馥，俾到港後直飛重慶，並函囑馥作配合準備。同時，我在巴中也擴大我單人宿舍為家庭宿舍，以待全家歡聚。不料，左等右等，始終等不到馥貞動身的消息，

事後真相暴露，馥貞已斷了到重慶來的念頭。這打擊，只起因於董壽朋的一時疏忽，他買好了船票，擺在抽屜裏忘記就寄；韻貞久候無聊，忽發現自己有幾根白髮，到理髮店裏去染發。那時染發用一種燒熱的藥膠細心一點一點的塗，不幸那理髮師一邊染一邊與人口角，不慎藥膠滴在頭皮上，馥驚叫止染已來不及，頭皮中毒回家整個頭臉腫成一個大皮球；醫生來，囑把頭髮全部剃光才好上藥。因此，馥無法登程，船票寄到，只能叫長子坦（乳名大寶）一人渡港飛渝了。以上這些情形還都是大寶到重慶後告訴我的。

大寶來重慶之前，珍珠港事變後發動的大陸青年大批西湧的浪潮中先帶了一位女青年到我的身邊來。這位小姑娘，名叫梁瓊枝，是晰女（乳名妹妹）在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學的同學。它隻身走河南、山西那條艱險的「蜀道」到重慶，持妹妹函介來投奔找我的。我為了她，特別在我迎春新造的家庭宿舍四方的起坐間，劃出一角小四方，築了隔牆，另在外牆開一門，做它的臥室。大寶來就在我臥室里加一床，於是我這四五年獨身獨宿無家可歸的流浪漢，辦公回來總算有兩個男女青年作伴了。這兩個男女青年在這樣天造地設的環境中，當然會談起戀愛來，於是在抗戰結束之後回上海，梁瓊枝竟變成了我的兒媳婦！

跟著太平洋戰局發動的大陸同胞西湧浪潮到重慶來的親友，還不止大寶與瓊枝兩個人。他們之外，我的四個弟弟除耀仲因許多老病人的牽掛無法離滬，其他三個都先後到了重慶。三弟光叔是上海市政府的醫務人員，當然帶著弟婦（也是護理）跟市府西遷大隊來重慶。不幸中途翻車，弟婦喪了生。四弟叔懋是國立音專畢業的聲樂家，也帶著他的未婚妻沈康君，跟著國防部的康樂隊來重慶。我特別幫他籌備開了一次表演歌藝的獨唱會，並且後來借我的宿舍做他的新房主持他與康君的婚禮。五弟季暘是中央信託局的職員，隨局來重慶，後因與局方意見不洽，辭職住在我處。我另在我的宿舍旁築一小屋居之。三個弟弟之外，親戚之來渝者有母系表弟沈澤蒼任重慶衛

成司令錢大鈞部下的要職，表妹壻周時中為錢的秘書。兩人皆攜眷，我跟他們經常互訪盤桓。四弟婦康君即為澤蒼妹妹，故其借我宿舍作新房時，澤蒼夫人還在前一天到我宿舍來為妹妹鋪牀。

當然，大寶與瓊枝的朝夕盤桓給我枯燥生活以無限溫馨。我在每天公餘之暇有一個算似家的場所，解除我的寂寞。他們來時都在冬季，要考大學，還得等六七個月。在這六七個月中，我公餘回家他們陪我聊天，每個星期尾必陪著我走到都郵街，不是看一出那時盛行的話劇，就是看場電影，然後吃一次小館子打打牙祭，再說說笑笑回家。後來，學期開始，大寶考取了在重慶的交通大學，瓊枝考取了在成都的燕京大學。瓊枝讀新聞系，是她原選定的。大寶初選機械工程系，後我偶然聽到一位美國訪華專家的演講，批評中國專注意訓練工程師，不注意訓練管理與使用工程師的專家，是一大缺點。我受到他這一點啟發，大寶回家即以此意告之，他立刻感到如開茅塞，回校即轉企業管理系，走定了他終身職業成功的路線，我甚感快慰。

大寶瓊枝之來慰我寂寥，的確帶來了不少溫馨，可是馥貞帶著妹妹和小寶（次男壻的乳名）留在上海，已失租界過去掩護安全的保障，並傳聞馥因未成行已患了失眠症，使我憂心忡忡，坐臥難安。民三十三年秋，我聽到杜月笙先生有由上海接眷來重慶之意，因即趕赴南山，親訪杜月笙，懇求其接眷時連我的眷屬一起接來。初意這不情之請，不知要增加杜君沿途照料多少困難，難得杜君的首肯。不料杜月笙真是俠義之徒，一拍胸脯立刻答應，並且保證安全。這真使我喜出望外。那時候，重慶與上海音訊早就斷絕，無法通知馥，只能靠杜君地下電臺轉告準備。同時，我另一母系表兄沈次良適任西安中國銀行行長，我與他聯繫，他允許派一輛旅行車到敵我陣線分界點，界首，迎接馥貞母子三人送來重慶。我暗中估計，這一次借杜月笙這位聞人的努力，與馥貞團聚決不會再像上次那樣的落空。萬事具備，只需耐心坐著等好消息。誰知道，也竟像上次一樣，左等無消息，右等還是不見蹤影，無可奈何，最後不得不再

度走訪杜月笙問一個究竟。不料杜君告訴我他的夫人姚玉蘭由趙佩欽伴同，曾偕同馥貞帶著妹妹小寶從上海出發來重慶走到南京還由南京偽政府中杜月笙的門徒某要人招待留宿。不料此時蘇北豫東戰爭突發，界首這個敵我戰線交通點已失其交通的功能。此路不通，他們只能回上海再等機會了。真想不到，我跟馥貞得到了杜月笙這樣一個權勢通四海大力聞人之助，還是緣慳一面，遇到第二次同樣的挫折。我真著急，不知道馥貞怎樣能抵擋這樣沉重的失望打擊！就是我自己已在貧瘠環境中掙扎奮鬥了三年多，幸得最後階段少些溫馨的撫慰，受此最後失望的打擊，也有些支撐不住了！

後患無窮的抗戰勝利

我快要支撐不住，不料日本軍閥經我國八年苦戰的折磨和美國兩顆原子彈的威脅，竟比我更糟，先我支撐不住而垮了下來。他們的天皇在民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正午從廣播中宣佈他無條件投降的停戰詔書。全國同胞聽了，不約而同發狂似的歡聲雷動起來。我們國宣處是廣播科長彭樂善最先聽到的。他一聽到立刻走告顯光兄與我。我得此消息後，立刻拉了大寶向房門外沖，高聲大叫：「我們勝利了！」這一叫，引發了很多飯廳和家庭宿舍裏剛在吃飯同人和家屬的驚駭。大家沖出來問，一聽我不斷高叫這五個字，大家同聲跟著叫；不一會兒炮竹、鞭炮跟著爆開來；銅盆、皮鼓，可以敲得響的東西同時都出籠了。人越聚越多，巴中四五個機關，連同記者招待所裏的外國記者都跑出來，很多人拿著不知什麼地方來的酒瓶互遞著喝。邊喝，邊叫還彼此拉著抱著跳著舞。真可說，大家仍覺得不知應作怎樣動作才可以表達他們的高興！後來知道，這情形不獨重慶市，全中國大城小鎮都是跟我們一樣的作中國民意自發自動的一次大表現。主席 蔣公夫婦受此感應，也坐著敞篷汽車環重慶市行駛一周，接受民眾的歡呼致敬。

然而 蔣公睿智知道勝利帶來的不是享受而是警惕，所以他在八月十五日廣播告全國軍民時提出警告說：「正有艱鉅的工作要我們以戰時同樣的痛苦，和比戰時更

巨大的力量去改造去建設。或許在某一個時期，遇到某一種問題，會使我們覺得比戰時更加艱苦，更加困難，隨時隨地可以臨到我們的頭上。」

他說的「某一時期」實際指的是「當前現在」；他說的「某一問題」實際指的是「共匪的叛亂與俄帝的策應」，不便明言，可是這就是他立即要面對疏解的問題。

蔣公是確遵中華民族仁愛為本的傳統文化領導建國的。故他在日寇投降之際即抱「不念舊惡，與人為善」的胸襟來處理日本投降後的條件，堅持盟邦應：(一)不取消日本天皇制，在政治上保持日本民族心理團結的核心；(二)不要求賠償，在經濟上，予日本以國力復蘇的機會；(三)不效德國受降分別處理割裂國體的惡例，力主由美國統一負責。日本能有今日之富強，實皆受蔣公當年仁愛為懷之賜。對敵如此，蔣公再回顧國內同胞，受頑敵八年蹂躪的痛苦，社會紊亂，經濟凋零，人民生活部陷在水深火熱之中，故力主召開國民會議，訂定憲法，建立民主政制，以完成孫總理建造民國，中國國民黨還政與民公天下的宏願。因此，戰後施政，蔣公本其貫徹總理遺訓，遵行傳統仁愛，雙重心理感召影響之下，必然要邁向和平路線，決不應作再燃戰火的考慮。不幸事實環境的發展，逼著他不能不受這考慮的挑逗。

這種環境的發展，應從兩方面追蹤檢討。一方面主動的一條線——是共匪的乘機跋扈囂張；另方面配合的一條線——是俄共的狡獪進軍助惡。

先從主動線共匪囂張來檢討。蔣公早就料到共匪乘抗戰坐大，對日作戰結束後必有異動，故於日皇投降第二日，八月十一日即通令全國各部隊，淪陷區各地下部隊以及各地偽軍就現駐地負責維持治安，不得擅自行動，聽候政府命令，根據盟邦協定來執行受降的一切規定。同時並專電令中共的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說：「政府對於敵軍投降一切有關事項均已統籌決定，分令實施。第十八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不料朱德不僅抗命，並在同一天發佈七次命令，指示各地共軍全面行

動，目的在擴張控制地區，佔據交通重鎮，朱德同時逕自對中央國民政府提出六項要求：(一)對日偽投降締結受降協定須得中共同意；(二)中共部隊有接受敵方投降權利，收繳其武器與資材；(三)中共有權派代表參加接收敵人投降及處理敵人投降後工作；(四)中共有權選出代表參加和平會議及聯合國會議；(五)請蔣委員長制止內戰，中共與國民黨分別各自接受其所包圍之敵軍投降；(六)立即成立聯合政府。朱德以一個集團軍司令地位竟不遵政府命令擅自調兵遣將並向政府提出這樣荒謬要求，顯已犯了觸犯國法的叛亂罪。蔣公身為國家主席，按法論理皆應把他撤職查辦，處以極刑。然，假定這樣做，抗戰前只剩三萬人的匪軍，今乘抗戰坐大，已養成了三十萬人武力的部隊，正在借朱德之手要挑動他們奪權的內戰。這是放在蔣公面前的一個選擇。蔣公一本傳統仁愛與總理遺教，不忍十億同胞八年抗戰後，重遭內戰的災禍，希望共匪也是中國人，能受其忍讓的感化，革心改過，參加共同建國的行列，因此，不理朱德的挑釁，於八月二十日逕電毛澤東，盼他速來重慶共商國是。這是蔣公面對重燃戰火的挑逗，竟能抑制自己執行國法的權威，把叛徒提升為談判的對手，慎謀能斷，忍讓為懷，來促成團結建國的宏願。這也是毛澤東想不到的一個意外收穫，因此，他竟加勁刁難，說，政府不改成與共黨合作的聯合政府，他不會到重慶來的。於是，那時候還受太平洋學會迷醉的羅斯福駐華代表赫爾利竟不惜紆尊屈駕飛到延安去勸駕，毛澤東才故示賣美國的面子於八月二十七日飛來重慶。他在重慶住了四十一天，跟蔣公會談了五次，並在歡迎他的酒會中舉杯高呼：「蔣主席萬歲。」適逢雙十節他更與蔣公共同發表了一篇「會談紀要」，聲明「必須共同努力，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同時也表示共軍「願由現有數目，縮編為二十四個至二十個師，並將應整編的部隊移至隴海以北，及蘇北、皖北集中」。可是蔣公在其所著「蘇俄在中國」一書中告訴我們道：

「這四十一天的商談，吸引了全國的視線，掩蔽了匪軍的實際行動。匪軍的實際行動是怎樣呢？據重慶新華日報十月十七日發表，從九月十一日至十月十一日，

各地匪軍佔據城市二百座；在膠濟、津浦、隴海、平綏、北甯、德石、平漢、道清，各路上都控制若干據點，妨害華北和華中的若干交通要道，並威脅了山海關到杭州的海岸線，自垣曲到武陟的黃河沿岸，及蘇皖兩省的長江沿岸和運河線。」

毛澤東這樣目中無人的篡政奪權，論者都以為他膽大妄為冒著自己顛覆危險幹的，實際，奸詐如毛，決不幹冒險的事，他奪權有八九不離十的把握，因為，他知道，他背後有史達林撐著他的腰。這就把我們的檢討發展到挑逗 蔣公重燃戰火第二條配合線，俄共的進軍助惡了。

史達林進軍助惡陰謀的根，種在三十四年他跟羅斯福簽訂的雅爾達協定時，他強迫羅斯福出賣中國利益來換取蘇俄的對日宣戰。實際，史達林在出席雅爾達前，早知道日本要投降的了；因為，駐莫斯科日本大使正在他赴會前，懇求他轉勸英美，緩和日本投降條件。史達林赴會時明知，蘇俄對日不宣戰日本也要投降，其宣戰已失去致勝的效力。可是，羅斯福赴會時，卻滿腦子灌滿了國務院左傾分子的蠱惑，以為，蘇俄不參戰，日本還會堅強抵抗下去，美國最少再要犧牲一百萬青年壯士的生命才能贏得這場戰爭。因此，史達林乃得利用羅斯福的顛預，甘心出賣友邦中國的利益，滿載他敲詐的收穫而歸。

史達林的奸詐手腕技術之高，我們今日回溯，可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歷史上的千古絕唱。他第一手要強奪我東北戰後的控制權，不自己出面而藉美國的手做他代罪的兇手，同時更獲得了英美協助他成功的保證，這已是了不起的手法了，可是，他還能得了美國在三十四年二月十一日在雅爾達秘密協定上簽字的承諾後，幫他保守機密，再拖四個月，到了同年六月十五日才由美總統杜魯門通告我們的蔣主席，並提要求，迫我把美方承諾一一寫在與蘇俄專訂的和平盟約中。因為，這樣拖是配合他對日宣戰的機詐策略的。史達林既早知日本要投降，他對日宣戰能配合日本投降的日子越近，他所負作戰的擔子越輕。我們追溯史達林運用其宣戰而不作戰，實收作戰

勝利豐碩果實的手腕之機詐，真可說絲絲入扣，配合得天衣無縫。當然，天真的美國幫了他最大的忙，在三十四年八月六日對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第二天七日又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史達林抓到機會就緊跟在美國投原子彈之後，八月九日由其外長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召日本駐蘇大使佐藤面遞蘇俄對日絕交宣戰書。更緊跟著第三天八月十二日蘇俄駐在我東三省邊上的部隊，由綏芬河、滿洲里、外蒙，以每日行軍一百公里的速度向東三省的日軍三路進攻。日軍不勝原子彈威脅無意作戰，故多不加抵抗，俄軍不費一彈不傷一人，長驅而入我東三省，成與敵對峙的形勢。日本天皇又緊跟著在八月十四日宣佈無條件投降，於是抗日盟軍就不得不承認既成事實，不規定東三省的宗主國中華民國為東三省的受降國而以蘇俄代之。最令人難以想像的，史達林竟能把中國承認蘇俄在東北特殊權益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拖到日本投降之日同日在莫斯科簽字，使蘇俄在東三省除得受降特權之外，並得運用旅順、大連兩軍港以及中東鐵路運輸中國政府允諾的特權。更令人不可思議的，他竟得以受降身分，沒收全部在東三省敵偽軍的武器與物資之外，並把聽有工廠與生產建設不問產主誰何全部拆卸裝車運至蘇俄。按國際公法規定，受降時沒收標準以敵方武器與可攜動的物資為限，不動產絕對不在沒收範圍之內，更何況有許多並非敵產而是中國政府公產，中國人民私產，史達林這種措施簡直是盜匪劫奪行為。可是他把所奪武器都送給共匪外，並故意阻止國軍登陸，延宕移交其受降地區的控制權，並收容偽軍以培植匪軍的壯大，影響此後大陸變色，實為罪魁禍首。近代史學者黎東方先生在他所著的「蔣介石序傳」一書裏公然主張，在這時期，中國對蘇俄應採取斷然宣戰政策。他說道：

「上策是對蘇聯宣戰。因為以我個人的淺薄知識，敢說蘇聯在戰後的實力不比我國的強，而它對我國是外線作戰，我國是內線作戰。我們能切斷它的西伯利亞交通，斜穿俄屬中亞細亞，直搗烏拉山之南，轉向黑海之北的烏克蘭；它沒有力量奈何我的四川、湖南、與江浙、兩廣。」

我非常同意黎先生的這樣軍略研判；同時，我還要加一點國際有利因素，那就是，我如正式跟俄帝作了戰，美國必加強支援我。因為，中蘇戰，無論怎樣解釋，必然確證了俄帝的侵略真面貌，破碎了美政府以蘇俄為建設戰後和平夥伴的幻夢，提高了美國政府俄帝如控制中國對太平洋甚至美國本土安全威脅的警惕。故我們可正確預斷，中蘇真開了戰，美援之來必改我之爭取為美之爭授，成為我勝利之一大助力。

我相信，黎東方先生和我都看得到我國對蘇宣戰的有利後果，睿智如 蔣公，怎會看不到。可是，既能有這樣克敵制勝的把握，為什麼蔣公對史達林的壓迫又這樣的忍讓呢？這就回到我要說的本題，蔣公還是要貫徹他遵行傳統仁愛與總理遺訓，不忍在十億同胞遭八年抗戰蹂躪之後，作重燃戰火的考慮。他寧願竭他的心智，在不燃起戰火儘量保持和平的限制原則之下，對內應付共匪的叛亂對外抵抗俄帝的侵略。坐令八年抗戰換得的勝利，帶來不易解決的無窮後患，要他含著苦水一口口往肚子裏吞！

這時候，國際宣傳處在一度狂歡之後，就要配合黨政中央的行動，作還都作業的準備了。不料在這緊要開頭，顯光兄忽作功成身退，辭去他連任八年宣傳部副部長之舉！實際，他這樣做是受了他夫人董嫂連年嘮叨的壓迫，適在此時作了最後的爆發。「功成身退」只是他冠冕堂皇對外解釋的口實，實際原因是吳國楨做了抗戰以來第十個宣傳部長。八年抗戰中，顯光兄得領袖的倚重，事事參加密勿，可是宣傳部長去去來來換了九個，最後來了吳國楨，竟是他女婿陳植在美留學的同班同學。董嫂看著部長輪不到顯光兄，歷年以來她滿肚子不平之氣已成了顯光兄聽慣了的耳邊嘮叨，可是，這一次女婿的同學做了頂頭上司，顯光兄真到了無言可撫慰妻子不平的最後階段了。適逢此時，日皇的投降解決了他的困難。於是他才痛下決心，辭去副部長一職，帶著妻子逕飛美國，過他的退休生活去了。

他一去，把整個國際宣傳的重擔扔到我的肩頭，做一個有實無名的負責長官。因為，國宣處名義上雖屬於宣傳部，實際上是由顯光兄以宣傳部副部長名義受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直接督導執行任務的，因此宣傳部部長向例不管國宣處的事。現在，顯光兄一走，黨政中央並未派任何人繼任他這特權的副部長，無形之中，他所遺的全部職務不得不由我一肩挑起來了。

我在這時第一件負責要做的是把八年來經之營之促成的國際宣傳處整個組織從重慶搬到南京去。搬家重心要總務科負責，這時候，原任總務科長陳耀柱因貪污撤職，由資料室主任唐魯濱繼任主持總務。唐是一位有幹才的標準中國讀書人，並喜聽音樂，常攜若干管弦樂隊的唱片到我宿舍來，一壁伴我聽音樂，一壁與我上下古今無所不談，因此我深切認識他而倚為辦總務的助手。現在，遇到這大搬家的重要任務，他的確不負我的拔擢，辦妥了這份艱鉅工作。現在，頑敵投降，四川的大門，長江三峽已暢通無阻，故我們設計原則，把還都同人分兩批成行。第一批是差不多全部總務人員與各科處大部分中下級人員，帶同全處物資檔案，雇了一隻大船沿長江衝破三峽而下，直駛南京接洽安頓辦公與住宿場所。這是我派給唐魯濱的任務，要他做此行帶頭實踐的領導人。第二批，酌留各科處高級有能力者每科一或二人，隨同我本人配合政府施政，繼續國宣業務，準備陸續分批最後乘飛機還都。魯濱遵囑帶了全處大部分人員與全部物資先行，我囑大寶在學校請假跟著同人坐船由寧轉滬回老家。瓊枝已從成都來渝，在美國駐渝軍部中找到了工作。因此，她得利用美軍飛機的便利也飛回了上海。直至三十五年五月五日，我才跟著政府正式還都，乘飛機離開重慶到南京，結束了我茹苦含辛八年的抗戰生活。可是，我仍然心茫茫，眼看國是前途鋪滿了荊棘，真不知有多少問題在等著我去面對解決！

左傾幕僚操縱華府

顯光兄以為抗戰勝利，他忠貞報國的心願業已達成，可以功成身退，無愧於心。實際，勝利後政府墮入比抗戰更艱苦、更坎坷的陷阱，需要國際宣傳的配合作業，至殷且切，他的功尚未全成，他的身當然不應引退了。可是，他竟拂袖而去，扔下這件鄭重的濕布衫，讓我這小小處長，從民三十四年八月十日起，到民三十六年五月三日成立新聞局止，整整一年零九個月做著有實無名、獨挑艱鉅宣傳作業的領導人。這一年零九個月時間雖不算長，可是我政府的處境卻是，國際友人諸多不諒，外敵內奸串連篡奪，使我個人肩此宣傳疏導的重任，實可說是我一生中面對的最艱苦奮鬥的時期。這一年零九個月，我們如以匪在和談中態度轉變作標準，很巧合地可分成兩個階段來敘述；第一階段我政府尚在重慶，從日本投降日起到還都日止，九個月，為「匪態偽善階段」。第二階段，從還都日起到國宣事業由處改局，顯光兄再起主持日止，整整一年，為「匪態惡化階段」，茲擬分段詳述我在這兩階段中獨挑艱鉅的困鬥經過。

先述第一時期，我們在重慶時「匪態偽善階段」。我擬從國際友人諸多不諒著手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區打敗日本軍閥是我八年苦戰糾纏的效果，勝利論功，應居首席。同時這八年苦戰把我全國打得民窮財盡，瘡痍滿目，亟需外援來助我重建家邦。戰後世界局勢，只有美國是唯一因戰爭而充實了國力，可以資助盟邦甚至敵人恢復它們的元氣。美國的的確確這樣做了，在世界史上寫下了拯救人類浩劫輝煌的一頁。可惜；它慷慨助人，單獨輪不到我中華民國；不，它資助我國仍也有的，並且還盡了最大的力量，可惜，幫了一個倒忙，招致了我赤化大陸的慘劫。

怎樣幫倒忙，說來話長，歸總簡敘，史達林滲透華府，使左傾幕僚操縱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擬訂與運作，坐令我政府權威日見削弱，共匪坐大，逞其篡奪陰謀。中國不幸，適在此時遇到美國總統杜魯門是歷任總統最無能的一位。總統無能，一切政策的擬訂與運作要靠幕僚長。美國政制總統的幕僚長，文的要靠國務卿，武的要靠參謀總長。因此，美國對華政策的形成就靠這兩人。勝利時的國務卿是貝爾納斯（James

F. Byrnes)，對中國事務一竅不通；參謀總長是歐戰盟軍統帥馬歇爾，雖然名震世界、美國政界的第一紅人，可是，對中國事務也一樣是一張白紙。這不是給美共為背境的太平洋學會同人一個滲透美國政府操縱全盤美國對華政策的擬訂與運用的好機會嗎？於是，太平洋學會會員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佔據了美國國務院中國科科長的要職，連同居裏、謝偉志、大衛斯等變成了決定美國政策的智囊團，有關中國的一切事件，都要請教他們。在中國，太平洋學會的要員費正清（John Fairbank）擔任了美國新聞處中國處處長的要職，配合華府左傾同志表裏呼應。

華府對華政策受左傾幕僚操縱的事實，赫爾利對華態度的轉變與其最後斷然辭去美國駐華大使的經過，是最足令人置信的事例。赫爾利原本是奉了羅斯福總統之命到中國來調解史迪威事件的專員，史迪威事件解決後，他本應回美終止他的任務的。可是，蔣委員長認他是繼續解決國共糾紛最理想的美國人，去函羅斯福懇切挽留他，因此，羅斯福就派他再度來華做美國駐華大使。

實際，赫爾利來華初期並不符合蔣公對他的期望。他在華府早受到國務院中左傾同寅的洗腦，來華途中繞道莫斯科，蘇俄外長莫洛托夫又告訴他：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不滿中國政府獨裁的窮苦老百姓的結合，不是真正共產黨，跟莫斯科沒有任何聯繫。因此，赫爾利一到重慶，就給毛澤東利用，親往延安去跟毛澤東談國共合作問題，提高了毛澤東的身分。他不獨提高毛澤東身分，並且在毛澤東要脅政府的五條件建議書上簽了字；使得美國國務院裏的同寅事後發現了，不得不承認他做得太過火，發表聲明，說他簽的字是以個人身分簽的，並不代表美國。這五條件是：（一）組織聯合政府，（二）中共參加最高國防委員會，（三）承認中共為合法政黨，（四）給予人民各種自由，（五）統一全國軍隊於聯合政府之下。

此後，赫爾利調解階段可分三期。第一期，民三十三年十一月從延安談判，繼續帶毛澤東、周恩來到重慶根據匪提五條件談。第二期，政府提三原則與周談，周

不滿回延安。第三期，談判僵持，共匪節外生枝，擴大糾紛。第四期，到了民三十四年一月以後周恩來再回重慶重開談判。

在這四個階段中，赫爾利發現中共的態度，雖然基本上在拖延時間，可是他們時而妥協，時而強硬，這樣拖延，必定另有企圖要達成什麼目標？是赫爾利盡思竭慮、亟圖發現的一個基本問題。

這問題到了民三十三年底他才找到了答案：共匪態度的忽軟忽硬，竟是他自己同僚，美國官吏在幕後播弄促成的。他在這時候意外地發現了美駐華軍官，在他與魏德邁背後，與共匪訂下了兩批美匪合作的作戰計畫。第一批是民三十三年十二月魏德邁的參謀長乘魏德邁到緬甸視察軍情的空檔，秘密與共匪擬訂一批美軍與匪軍在華北軍事合作計畫。其內容大致為：美空降攜帶充分武器之官兵七千五百人，供應使用裝備、飛機，通訊器材，炸藥等投入共區，摧毀敵後交通，領導與指揮共黨遊擊隊，進攻與殲滅日軍。就在同時，美國戰略服務處駐重慶的負責人，也在延安商討更大規模的美匪軍事合作計畫。其內容為，美國提供步槍十萬枝，運輸工具及其他器材與武器，訓練共匪遊擊隊兩萬五千人。共匪方面，提供六十萬匪軍，二百五十萬民兵，歸魏德邁統率。美軍官已與匪方取得協議，那時正在延安訪問的美軍觀察團密電魏德邁的參謀長，要他安排毛澤東與周恩來密赴華府，與羅斯福面談，並囑此事絕對不能讓中國政府與赫爾利知道。

事有湊巧得出人意外的，這兩件絕對瞞著赫爾利進行的機密大事件，因他們最後要求匪酋赴美非經魏德邁親允不能執行而報告給魏德邁。魏德邁聞他部下竟瞞著他做這違背國策的荒唐行為，除立即下令處罰這些受左傾人影響的部屬外，並即召開記者會，當場宣佈：美國軍人不援助任何個人，任何活動，任何組織，這是他根據國策所下的命令。要求每一個部屬簽字謹遵。他受命支持美國政府承認的中國中央政府，他必竭力完成這個任務。同時，他即以此點詳告赫爾利，赫爾利就立刻報告杜魯

門，除敘述發現經過外，他指出，這些計畫配合中共得美援以摧毀中國政府的陰謀，使他奉命執行的努力盡屬徒勞。同時，他在大使館召集美國所有駐華官員，包括魏德邁在內，懇切表示，他奉命執行的是一方面支持中國政府，不令崩潰，另方面說服中國政府作政治讓步，促成統一，願與全體同僚協力達成這個任務。

這是赫爾利發現美國駐華同僚中有勾結共匪破壞國策的一套嚴重警告。他找到了共匪態度之所以時軟時硬是這些同僚助匪成功與失敗的反應，因此而使他的對華態度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果然，美政府左傾人員助匪陰謀的失敗，立刻使赫爾利支持的國共談判由第三期的僵持局勢轉變而入第四期周恩來再來重慶重開談判的樂觀局勢。可惜這個樂觀局勢的轉變，只是很短的曇花一現，因為，緊接著三十四年二月羅斯福竟在雅爾達受史達林脅迫作了出賣友邦斷送我東北的行為，這可以說是華府左傾幕僚反擊赫爾利的勝利。赫爾利得訊，立刻飛到華府，向病已垂危的羅斯福坦白檢討其此舉之不當。羅斯福竟為其說服，深悔自己措施之誤國，逕令赫爾利飛告蘇俄元首，美國決撤銷雅爾達之承諾。赫爾利先飛倫敦，邱吉爾不接受羅斯福態度之轉變，赫爾利在飛莫斯科途中，羅斯福已抱憾終身而逝世了。赫爾利不能達成羅斯福臨終前的使命，悵然返回中國任所。他經此折騰，才頓然醒悟美國對華政策之徹底錯誤。華府堅持要中國成立一個聯合政府，不知這樣堅持是在削弱蔣委員長統治中國的權威。可是蔣委員長卻是美國在遠東唯一可靠而有能力的忠友。他一再考慮，決飛返華府，逕以此意面訴當時國務卿貝爾納斯。貝爾納斯經他說服，兩人詳商，即應本此考慮，妥擬美國對華新計畫，交由赫爾利返任所切實執行。貝爾納斯允囑部屬擬就書面指示，約赫爾利次日再來國務院收取。赫爾利欣然如約次日往取，不料所得指示新計畫之內容仍是要求組織聯合政府那一套，一字不提昨日與貝爾納斯面談的新設計。赫爾利看了，難忍心頭的怒火，他一方面辭去駐華大使職位以示抗議，一方面向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報告經過，要求公

道。參院外委會開會討論此案，經貝爾納斯解釋後，主席決議中國問題無繼續研究之必要，輕輕帶過，不了了之。

赫爾利就這樣的被左傾同僚打入谷底，永遠抬不起頭來，可是他卻做了美國政府受左傾幕僚操縱最有力的見證人。他在他的回憶錄裏寫道：

我那時（民三十四年春）澈悟華府美國政府中無疑有許多共黨陰謀分子。我現在還保留著那時候寫的書面聲明，說明我政府中的各州、各部和駐外各國使館中查到很多左傾工作者陰謀的證據。他們經常利用報紙宣傳，製造輿論作反對美國政府的活動，並且攻擊美國傳統支持中國的人。有關中國資訊的正確部分，他們存檔不用，只把他們歪曲部份對外發表。

憑著這一番頓悟的透視，他向美國參議院控告國務卿的那一篇文章，雖經左傾分子巧妙運用，不了了之，確也必定擲地有聲，發生了一股震撼美國政治環境的力量。於是，杜魯門為了要減少這震撼的影響，竟決心邀請那時候美國政府中聲威卓著的第一紅人，剛從參謀總長座位上退休下來的馬歇爾來做調解中國問題的主持人了。

我們事後檢討，馬歇爾雖是偉人，他來華之前，心理上已具備了一套塑型偏見。他這偏見是受三種影響形成的。一種影響是客觀外來的，兩種影響是主觀內在的。先講客觀外來的。這是決定他來華調解國共糾紛所取態度最主要的影響力。這就是操縱華府對華政策那些左傾幕僚供給他有關中國問題的資訊。馬歇爾雖偉大，對中國問題一無所知，國務院的中國問題智囊團，無形之中就變成了他此行赴華必須請教的老師。他以諮詢方式接受這智囊團的教誨，重蹈赫爾利到華受騙悔之莫及的覆轍，呈交無能的杜魯門批准，變成了他到中國來必須遵行的美國政府對華國策。

再說影響馬歇爾來華前所受主觀影響，計分兩層次。第一層次最重要的是史迪威硬給中國蔣委員長拒絕，在他心頭無形中形成打擊美國政府權威的飲恨。史迪威

在緬甸率其一手訓練的新軍打回密芝那，在美國政府一般估計，包括總統羅斯福在內，是美軍在太平洋區第一個也是第一次奏捷的大功臣，故立即升級上將，希望他能統率中國軍隊，再立奇功。我說，羅斯福也是這樣想，因為，史跡昭彰，羅斯福之接受蔣公撤史要求是受赫爾利的規勸；赫勸羅，蔣公以割席的態度提撤史的要求，美國只剩在蔣、史之間擇一的機會。今天抗日，美必賴蔣，則不能不去史，無法兩全。羅接受赫勸，才決定同意撤史，實際必感美國權威受挫的飲恨，我有不能證實之測感，跟著羅斯福到雅爾達出賣了中國，未嘗不是心理上受此飲恨的影響。馬歇爾是一手提拔史迪威的人，其飲恨的偏見定必甚於羅斯福。因此，史迪威雖撤職回國，竟還受到壯士殺敵凱旋般的歡迎，美國政府授以勝利勳章；因此，馬歇爾此次奉命到中國來調解國共糾紛，難免對蔣公預存一種此次必確保美國政府權威的偏見，此其一。第二層次是馬歇爾本人受全世界推崇所形成的自尊自負心理，使他感到任何使命經他承諾負責，只可成功，不容失敗，減弱了他自我檢討、諒解對方調解必需的心態。

杜魯門受左傾幕僚影響，規定馬歇爾來華以美國元首代表身分要完成的使命只有三項：第一，他必促成國共停戰；第二，中共軍隊依實力比例收入中國國軍；第三，促使中國政府召開全國各黨各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當然要包括共匪在內。

杜魯門給馬歇爾規定的這三項使命的主要大錯誤是假定了共匪有促成全國統一的誠意。實際，共匪看到美國的原子彈幫助俄共不費一粒子彈竟能以受降國身分控制了我全部東北三省，他們乘水漲船高的優勢，已得到篡奪政權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安肯以附屬身分來參加國民黨領導的中央政府。但，共匪也看到，讓美國保持中國問題可得滿意解決的希望，是他們應該把握的有利戰略。因為使美國人永遠迷戀在可以結束中國內戰好夢之中，巧妙地削弱了國民黨得以消滅共匪的美援。共匪就憑此戰略來玩弄馬歇爾，一忽兒花言巧語來哄騙他，一忽兒背牙裂嘴來威脅他，經常從和平解

決在望的關頭突然變得劍拔弩張，反之亦然。坐令 蔣公實力漸見衰微，而馬歇爾的三任命實際援助了共匪的囂張。

然而，馬歇爾怎會知道自己已經深陷在共匪所設的陷阱之中呢。他正趾高氣昂地以歐戰勝利統帥的態度來解決小小中國問題，焉有不成功的道理。他一到重慶，周恩來就竭盡共產黨徒灌迷湯的本領和他盤桓外，更發動羅隆基等聽謂民主人士的共黨週邊人包圍他。馬歇爾本擬推薦深明大義為 蔣公倚重的魏德邁繼赫爾利的駐華使節，不料他竟受周恩來的反對而改推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司徒雖是一位不問政治的學者，可是當時燕京的學生大半受共黨的洗腦。把魏德邁硬從駐華大使座位上拉下來，是共匪利用馬歇爾所得的第一次大勝利。馬歇爾茫然！

發展入真正工作時？馬歇爾擬定第一步應先促成國共停戰。他竟順利地得到我政府建議，共匪同意，組織停戰的三人小組，由張群代表政府，周恩來代表共匪，與馬歇爾共商停戰辦法。接著就在三十五年一月十日政府與共匪簽訂停戰協定，雙方同時下令從一月十三日起全面停止戰鬥。但，協定聲明，此項停戰令，並不影響國民政府軍隊為恢復中國主權而開入東北或在東北境內調動。

跟著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由政府派二人，匪方派二人，美國派一人參加，實行督率全國分八小組執行停戰。這時候，政府一本原定戰後建立民主政府之大政方針，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召集國民代表會議，制定憲法。共匪乘機表示熱心民主，積極派代表參加此項協商會議。馬歇爾受愚，益信其停戰之出於摯誠，而其奉命完成之促我政府召開協商會議的第三使命世就不費吹灰之力，順利達成了。

最後只剩了把中共部隊納入國軍這個問題要解決了。政治協商會議組成了一個軍事協商小組，由張治中代表政府，周恩來代表共匪，會同馬歇爾，研究這個問題。到了同年二月十五日得到協定：此後全國軍隊全行改組，最後重組政府軍九十師，中

共軍十八師。跟著六個月內，將政府軍由九十師縮編為五十師，中共軍由十八師縮編為十師。政府最初建議邀美國參加我國軍之改編，因共匪反對而作罷。

馬歇爾以為在美國堅強國勢與他個人彪炳威望之下，美國政府要他完成的三大使命都已一一完成了。於是，他在三十五年三月十三日邁返華府告捷，並擬結束他中國之行。誰也想不到，他到華府剛巧一個月，周恩來在同年四月十五日宣佈東北全區已入戰時狀態，根本否認了停戰協定的約束。他不知道，當周恩來在重慶以和談方式纏住他的時候，共匪軍隊沒有一天停止過他們遊擊方式的戰鬥與擴展地盤。在東北，中共軍配合著俄共軍，一退一進，已先後接收了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進而控制國軍開進東北必爭的四平街要衝。周恩來到這階段才揭開他裝笑臉的面具，暴露猙獰真面目。馬歇爾不得不趕返中國，檢點他破碎的三使命，再從頭做起！這是我在獨挑國宣艱鉅任務短時期內，美國善意援華，反而害我造成的惡劣形勢，要我面對應付的。

俄控東北培養傀儡

史達林在雅爾達會議之前就知道日本無力作戰，準備投降，因此，他比任何人有充分時間作爭取勝利果實的策劃。什麼是他在太平洋戰區最豐盈的勝利果實呢？把人口眾多的東亞第一大國，中華民國蛻變而成他控制下的附庸國，是他夢想追求，要吞噬的豐盈果實。按照他製造附庸的慣例，培養傀儡作他吞噬的虎俵是他最拿手的傑作。於是，正如前章所述，史達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以受降國的身分，進而控制我全部東北地區，儘量一再拖延其撤兵時間，一方面用種種方法阻撓國軍之入境接防，一方面，引導匪軍入境，盡速大量擴充匪軍之人員武器，予以訓練，使成堅強作戰部隊，配合其政治運作，俾能奪取政權，成其控制附庸國之傀儡！

我們不妨把史達林進佔東北的速度，以其受降日期與盟軍受降日與我國受降日的先後作一比較。俄軍在東北受降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九日，距日本八月十四日投降只有五天，可是盟軍在米蘇裏軍艦上受降是在同年九月二日，遲了十三天，我國在南京受降是在同年九月九日，遲了二十天。這一比較顯示了史達林能怎樣把握機先。

我們再把俄軍撤離東北的日期來做一次總檢討。按照「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第五條規定：「一俟收復區域任何地方停止直接軍事行動之地帶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即擔負管理公務之全權。」換言之，日軍投降就是「停止直接軍事行動」，什麼時候我政府要接收，俄軍就應交出「管理公務」之權，沒有再作任何協定的理由。可是，我不步步進逼，俄軍毫無撤走的跡象。因是，在三十四年十月廿九日，才在長春訂下了俄軍撤走的協定，規定從三十四年十一月二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二日俄軍分三期撤離東北。可是到了十一月，俄軍又有種種說辭在卅日提出要求，撤兵期限延展到三十五年一月十三日。不料三十四年十二月廿八日英、美、蘇在莫斯科開會，竟不與我方協商，只由英、美同意，把俄軍撤離東北的期限，延長到三十五年二月一日，實際，俄軍公開撤離瀋陽，拖延到三十五年三月七日。俄軍一走，匪軍即跟著進佔瀋陽。瀋陽如此，哈爾濱、齊齊哈爾也照樣一撤一接，安排得天衣無縫，絲絲入扣。到了三十五年二月廿五日，俄軍卻公開宣佈俄軍已全部撤離東北境內。這與其在莫斯科三國會議承諾的限期已超過廿四日，他們並無解釋理由不計外，實際俄軍在匪軍掩護下仍留東北，助其叛變，何嘗撤走。

抗戰突來的勝利，中美兩國都是意外，因此都沒有像史達林那樣從從容容作種種事前的設計安排。中國政府就在這樣對比落後情況下，在匪蘇合作，爭取東北局勢中，棋輸一著。因為，在日本投降以前，政府接受美軍在廣州灣登陸，兩國聯軍向日軍發動新攻勢的新戰略，把精銳部隊都集中到華南去；同時，緬戰訓練的新國軍調回國內，也都駐屯在昆明附近。擔任東北接防，需要精幹部隊去擔任，從華南與華西

南調大批這些部隊去，怎樣也趕不上俄軍受降之後，立即去接防的速度。不得已而求其次，只有要求美國出動其海空軍助我把這些部隊盡速儘量轉運到東北去。可是，美國政府受左傾幕僚作業的影響，還打官腔說，美國援華只援其抗日，受降超出抗日範圍，不合援助條件。幸經魏德邁衷心助我，力斥此種主張之不當，努力爭取美國海空軍及時出動必需之艦機，助我將西南部隊分批運往東北。魏德邁此種對我臨危援手之義舉，實應志諸青史，銘感不忘。

我政府接收東北，在三十四年十月十日由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行營經濟委員會主任張家璈【“張家璈”，原文如此。】，外交部東北外交特派員蔣經國飛抵長春，與蘇俄佔領軍最高統帥馬林諾夫斯基談判接收。馬林諾夫斯基就表示中國軍隊不能在大連登陸，理由很牽強，只說鐵路缺乏車輛，可轉由葫蘆島與營口登陸。我們勉強接受這種無理阻止，調來部隊乘美運輸艦駛葫蘆島，不料登陸時匪軍竟開槍射擊。美艦回航待命。後奉命改駛營口，美艦長登陸訪蘇俄將領，見數千匪軍在掘壕溝，又再度回航待命。最後，奉命改駛秦皇島，始讓國軍在關內安全登陸，出山海關開入東北。

這時候，錦州以南地區已被從熱河南下的共黨部隊佔據了去，蘇俄勢力公開掩護匪軍擴大組織其地方武力，長春形勢險惡，東北問題未能全盤解決以前，孤守長春實無多大意義。蔣主席根據這樣的考慮，在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命令外交部通知蘇俄，莫斯科無履行條約實踐移交之誠意，我東北行營人員全部由長春撤至山海關，惟留董彥平以軍事代表團團長身分留長春與俄方連系。

實際這時候，匪軍在俄軍掩護下，已大批開進了東北。據事後讀匪方記載，在這時期開進東北的匪軍，陸上經河北、熱河、遼北一帶溜進的有由山西調來的四萬六千餘人，由山東調來的四萬餘人，由河北調來的一萬餘人；另由山東乘船先後陸續運至大連登陸的八萬餘人，統計約有十八萬餘人。這些匪軍，除海運部份外，都是接

受俄方通知，在日軍未投降前早已集合在東北附近待命出發的，故其進度有驚人之神速。俄方除集合匪軍外，又控制在東北原屬「滿洲國」的偽軍十餘萬人，交匪編入其部隊，故新華社發表匪在東北擁有三十萬人的雄師實非誇大之辭。偽軍受俄控，編入匪軍，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應負失職誤國之重大罪責。好友文學家陳紀滢兄可作現場目睹的見證人。紀滢兄當年隨其友，接收哈爾濱市長職入哈爾濱，親自接洽某偽軍軍長向其友哈爾濱市長投誠，願率其所部三、四萬人受政府編入國軍，並稱彼受編後，可保證其他偽軍三、四萬人亦將回應受編。據稱，其投誠政府實出至誠，因不甘出賣祖國，受俄軍支配編入匪軍！哈爾濱市長感其至誠，即電請行營熊主任核可接編。不料，電發後永無覆電，一再催詢，迄無反映。紀滢兄因另有高就返京，路過錦州，特下車專訪熊主任，面詢究竟。熊逕復稱，偽軍忠貞有問題，向不收編。實際，吸收地方武力，蔣主席早有公開訓示，熊式輝之「少做少錯，不做不錯」官僚作風，坐令十餘萬摯誠投誠政府之偽軍，為匪吸收，倍增其實力，熊氏誤國之罪，殺身難贖！

俄方培養傀儡，除積聚匪軍人力於東北外，復將受降日本關東軍接收之全部武器交給匪軍。據日方記載，關東軍為日本裝備最豐盈、最精良的部隊，敗後全部裝備讓俄軍以受降戰勝國身分接收了去。據稱，根據正確估計，這些武器可供一百萬人的部隊作戰十年之用，其中包括軍用飛機一百五十一架，裝甲車一百八十六輛，坦克車一百五十五輛，各種口徑的重炮七百八十七具。俄方即以此全部裝備撥給匪軍。匪軍多是土包子，那裏會用這些新式武器？俄軍即派大批軍官到匪軍去予以緊急訓練。

此時我東北行營由長春撤至山海關，顯作對俄抗議、不惜決裂的強硬態度。俄在此時培養傀儡，尚未臻成熟階段，於是前倨後恭，一改其猙獰姿態，馬林諾夫斯基親訪董彥平，表示願交出長春市政權，並負保護行營之責。這是退而不退的雙關語，我方不置信，仍按預定計畫進行。馬林諾夫斯基同時提出中俄經濟合作計畫，竟說所有東北工礦事業都是蘇俄對日作戰獲得的戰利品，現在蘇俄願把其所得分一半給中

國，作中、俄兩國開發東北工礦事業的中國股權，與俄方合作重建東北。我們說，不動產不能作戰利品，經濟問題應在政治問題解決後再談；蘇俄堅持，東北工礦都是它的，經濟問題解決後，政治問題不談也會解決。俄方姿態的轉向，跟著史達林邀請經國先生代表蔣主席訪俄的突變，益見其陰險。

史達林面告經國先生，美國助華，別有野心，蘇俄卻真有誠意幫助中國的經濟建設，惟一要求不能讓一個美國兵到中國來。只要中國政府保證美國不在東北得利益，蘇俄可能作必要讓步。蘇俄不反對中、美建立關係，但希望中國不要信賴美國。同時，史達林又表示，他極盼望能與蔣主席作兩國元首的高峰會談，詳商兩國之合作。就在同時，蘇俄駐東北軍的經濟顧問也向我東北行營經委會主任張嘉璈提出兩國經濟合作方案，一再表示此方案談不攏，蘇俄不會撤兵。

蔣公研判俄態度突變，不外兩個主因：以一手蘿蔔，一手鞭子，威脅利誘的手法，爭取蔣公作比毛澤東有更高利用價值的傀儡，此其一；藉此延緩俄軍撤出東北的限期，俾得充分時間培養匪軍竄奪東北的實力，此其二。因此，蔣公對策，一方面將史達林陰謀向美方透露並加解釋，一方面加緊政府部隊運送東北之步驟。

美方這才豁然貫通了！馬歇爾不得不再度來華，與政府及匪方代表協議，在北平設立軍事調處執行部。同時發佈停止衝突的命令，規定所有中國境內軍事調動，一律停止，惟政府軍開入東北以及在東北調動，並不影響。這是美方覺悟後，決定插手解決東北問題的行動表現。予蘇俄陰謀以公開的還擊。蘇俄反應，立刻翻了臉，促使匪軍在鞍山、錦州、營口、盤山等地襲擊國軍。俄軍亦作扣留軍調處飛機，繳政府組成保安隊的械等暴行。中國政府工礦特派員張莘夫就在此時被俄軍慘殺。新華社發表公報，匪在東北已組成三十萬人的「東北民主聯軍」，並建立黨在東北的最高領導機關，代表匪黨提出，根據他們竭力主張中央改組聯合政府的原則下，先組織東北聯合政府的要求。

匪方作這宣告，不啻表示他們被培養成熟，準備公開叛亂行動了。於是俄方配合，開始作詭詐式的撤退。政府方面董彥平即通知蘇俄軍部，俄軍從各地撤退時，應儘先通知中國政府，以便佈置接防。俄方製造種種藉口，阻止政府軍接近其撤軍的城市，致令政府軍跟著俄軍撤退即進駐東北各城市接防之計畫，無法實現。

周恩來在這重要關頭，公開表示，政府必先承認「東北民主聯軍」與「民選聯合政府」，政治問題必與軍事問題一併解決。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決派執行小組去東北，調處軍事衝突，相對表示政治問題待軍事問題解決後再商談。這是美方直接插手解決東北問題的積極表示。蘇俄還手，即由其駐華大使將中、俄經濟合作建議草案送交中國外交部。中國政府拒絕考慮。

蘇俄佔領軍三十五年四月十四日全部撤離長春，匪軍圍攻長春，並在四平街、公主嶺等地集結兵力，阻政府軍從瀋陽北上。中共中央宣佈在東北對政府取敵對行動。跟著俄軍從哈爾濱撤退，匪軍立刻進佔哈爾濱。東北局勢轉入這樣緊張階段時，政府在三十五年五月五日，正式由重慶遷還南京。國際宣傳處也跟著政府還都，結束了我在重慶「匪態偽善階段」的九個月作業，進而展開到南京繼續我面對「匪態惡化階段」獨挑艱鉅整整另一年的奮鬥。

爭美誤識爭取難友

面對上述勝利後國勢的顛危，我們國宣處工作的艱鉅，自可想像得之。我們那時宣傳重責集中在爭取美國的友情，不幸美國政府蒙蔽在左傾幕僚放射的煙霧中，對華之認知犯了雙重的錯誤，致令其決策，善意的援助反變成惡意的摧殘，使我們傾倒肺腑的爭言，無法挽救他們誤入歧途的失腳！

我說美政府對華認知犯了雙重錯誤，是指他們對俄共與共匪對中國政府態度之估計言的。

先就當時美國政府對俄共對華態度的估計言。美國政府從羅斯福到杜魯門一貫以為，俄共既參加盟邦打擊德、日獨裁侵略，決不會自己也作獨裁侵略，因此確定俄共必然是一個和平共存的好夥伴。由此推斷，英、美在雅爾達雖然出賣了中國，仍以為俄共只要求收回其既得利益而予以諒解。這是俄共支使埋伏在華府裏左傾幕僚滲透手腕運用成功的絕招。赫爾利初度來華經過莫斯科，蘇俄外長莫洛托夫跟他的一席談，撇清共匪跟俄共沒有一點關係，就為他們事後培養共匪褪卸責任伏下一筆。俄軍經史達林巧妙運用幾天內不死一卒不費一彈控制了我整個東北，我政府因蘇俄阻撓接收，斷然決定把接收機構退駐山海關，以示抵抗。史達林竟會立轉笑臉，歡迎蔣經國先生到莫斯科，告以蘇俄願以至誠與中國經濟合作，更聲明並不反對美國之援華。更在最後迭次表示，希望與蔣主席進行高峰會談，進一步商定兩國合作辦法。這是史達林親自表示俄共怎樣熱誠要打開和平共存的路線。蔣公當時，即以史達林的這種表示面告馬歇爾，徵求美國對俄共這種態度的反應。馬歇爾的答復，竟說只要史達林有誠意，不妨答應他。這不是馬歇爾不經意的信口輕談，而是反映了華府對俄共對華態度的估計；相信它願與美國在和平共存的原則下共同協助中國的重建與複健，是真心誠意合作的表示。美國政府不獨這樣估計，並且憑這估計形成期待，希望史達林真肯插身與美合作來做國共衝突中間的調解者。不是蔣公的堅決拒絕，美國真會化這期待而成行動的。因為美國政府在這時期始終認定，史達林對中國問題沒有多大興趣；相信史達林的話，中國共產黨只是一群不滿獨裁貪污中央政府的中國窮苦老百姓，不是共產黨，跟莫斯科沒有一點關係。因此美國人確信，中國的國共衝突，引不起莫斯科任何興趣，現在它竟肯插身進來做調人，真是歡迎之不暇的一項意外收穫。美國人想，中共雖非真共，莫斯科對它的影響力總比華府強得多，有俄共參加，國共和談一定能有長足的進展！這是我們在那時期面對的美國政府最嚴重的錯誤認知，需要我們國際宣傳負責者予以疏解的第一課題。

第二個美國政府犯的嚴重錯誤，是對共匪的認知。美國朝野受了史迪威免職的震撼，由左傾幕僚的播弄，造成一種普遍執持的塑型偏見，一致認定，蔣公逞其掌握政權的虎威，欺壓中共，以致中共無法翻身，中國不能實現民主政體，和談之不能有結果，美國調解之枉費心力，中國國民黨要負完全責任。羅斯福在雅爾達出賣中國之不當，連羅斯福自己經赫爾利解釋之後，也痛悔前非，要赫爾利飛告英、蘇元首，取消他的承諾。可是，毛澤東竟在同時中共開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演講中表示，中共對雅爾達的決策熱烈贊同。理由有如下五點：(一)徹底消滅日本法西斯主義；(二)消滅中國法西斯主義，不許保留絲毫；(三)中國必須建立國內和平，不許再打內戰；(四)國民黨獨裁統治必須廢止，代之以代表全民之臨時聯合政府；(五)國土收復之後，經過自由選舉建立正式聯合政府。毛澤東結論說，按照雅爾達路線，按照中國國情，必須這樣做。毛澤東是把握住羅斯福千載難逢的失箸，在這演講中，把俄共的猙獰侵略凶面貌帶上協助鄰邦的親善假面具，誘導美國鑽進圈套做他們鯨吞中國的幫兇。共匪這套把戲雖在雅爾達事件本身上沒有發生怎樣的作用，可是毛澤東的這一番論據卻變成共匪誘導美國決定他們對華政策萬變不離其宗的指導方針。在美國政府的估計中，中國政府永遠是獨裁法西斯主義者，共匪永遠是代表中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革命先鋒隊；共匪爭民主的手段是儘量要求組織聯合政府，中國政府保持其獨裁政權的手段是竭力破壞聯合政府。美國調解國共衝突的唯一辦法是拉攏雙方組成聯合政府，因此，在美國政府的估計中，共匪的合作早沒有問題，調解不成之障礙只因執政國民黨的僵持，這就暴露了國民黨獨裁法西斯的性格阻塞了中國政治趨向自由民主的發展。這是美國政府在這時期所犯的又一個錯誤認知，需要我們負國際宣傳責任者予以疏解的第二個課題。

勝利後的中國是所有盟邦中摧殘最慘的一國，決不能再遭內戰的屠毒。因此，美國調解的成敗，實為決定我國運興亡的樞紐。不幸美國政府以及部分人民受左傾幕

僚以及記者的蠱惑，犯了以上兩大認知的錯誤，我們負國際宣傳重責的中國惟一機構，自應劍及履及，傾我全力作竭誠的忠告。

我們曾大聲疾呼忠告美國政府與人民的第一課題是對蘇俄應有的正確認知：它雖是盟邦，決不是可以攜手合作的和平夥伴。我們警告美國朝野，蘇俄之為共產黨，獨裁專政進展而獨霸世界，蹂躪全人類，其狠毒強暴，超過德國納粹與日本軍閥千百倍。它雖在這時期取消第三國際，表示其悔退改善，不再施展其滲透顛覆伎倆。實際在這和平掩護之下，它的陰謀更發展其乘虛而入、無孔不鑽的侵略攻勢。我們不提別國，就以中國為例。史達林如何在雅爾達威脅利誘玩弄羅斯福於股掌之中，接著他如何運用機巧不死一卒、不費一彈，控制我東北，培養中共做他鯨吞中國的傀儡，我在前章已有詳盡的分析，都是我們當年勸告美國朝野的有力資訊。我們綜合這些資訊作結論，勸告美國朝野，俄共要控制全世界，最適合其侵略下手的地區是亞洲，在亞洲中最適合的國家是我們中華民國；警告美國要提高警惕，俄共培養共匪做鯨吞中國的傀儡，目標在全世界，決不會佔領了中國就罷手。那末，他們佔領了中國再要進行的次一步侵略物件，必然是自由世界中最強盛的國家——美國。因此，就俄共全盤侵略戰局作估計，全世界第三次大戰實在已經開始，中華民國現在是給保衛自由世界實力最強的美國打著前哨戰，我們的勝敗就決定了美國最後面對的敵人力量之強弱。因為，我們與美國打的是一個戰爭。有了這樣敵友判別的正確認識，我們再進一步，要美國對我們 蔣主席領導的國民政府有正確的認知。 蔣主席是以中華民族仁愛為本的傳統觀念來領導政府施政的。勝利後對蹂躪了我們八年之久的殘暴敵人， 蔣公竟能維其國本，保持其天皇制，念其民困，不求分文賠償；最使敵人感激涕零的，留在中國的幾十萬解除武裝的日本部隊官兵，正是重整受他們摧殘的我們國土的人力資源， 蔣公竟豁然大公不予扣留，反撥用交通便利及其他資助，送他們重返祖國，享受意外的骨肉團圓。 蔣主席對敵人如此，反觀自己，受戰爭破壞之慘，真是滿目瘡痍，遍地瓦礫，亟需全民攜手連心團結一致來重建這破碎河山。更何況，實踐三民主義，由

訓政步入憲政階段之政治發展步驟，在抗戰時期國民參政會中即作決定，抗戰勝利之日即為憲政實施之年，表示了建國方針只有在和平局勢中才可實現。因此，以仁愛為本的 蔣公，面對朱毛叛變，競肯忍氣吞聲，不予撻伐，以免重陷國家於內戰漩渦之中。今幸荷美國政府，仗義挺身作國共衝突的調解人，協助中國免遭戰禍， 蔣公自必歡迎之不暇，和談有所成就，也必確切遵守實踐，決不會食言毀約。美國朝野竟不以這種看法來衡量 蔣公在和談中的態度，反以大吃小、強凌弱的姿態加 蔣公以破壞和談的罪責。我們要美國人仔細審核毛澤東、周恩來在和談進行中的欺詐手段。他們可以發現，美國調解總是談談打打、打打談談，前浪推後浪，忽高忽低，永無結束可言。但，我們若再進一步作深入研討，他們會發現，發動打的總是共方先動手，而接受談的總是政府先同意，就遠角度作公平判斷，求和態度的真假就可了然。

蔣公求和之誠，已如上述，而共匪方面之參加美國調解的和談，另有他們的兩個動機。第一個動機是借和談爭取時間來掩護他們培養實力的努力；第二個動機是借和談來接近美國，乘機離間美國與我政府的關係，同時騙取美國的援助。美國人若能明瞭了共匪這兩個動機，自會確信和談之無結果，必然是共匪的要求，似可不需我們再加說明的了。不幸美國朝野竟被蒙蔽，不這樣看。他們永遠固執著 蔣公是獨裁暴君，共匪是民主鬥士的成見，把和談無成就的責任推在 蔣公身上。美方的這樣執迷不悟，除受共匪之直接玩弄外，更遭共匪製造的週邊群眾，當時如羅隆基、沈鈞儒、章伯鈞、章乃器、王造時等發動的所謂「民主同盟」所煽惑，以為共匪真在代表中國醒覺的人民，推動劃時代的民主革命。實際這些所謂「民主同盟」，只是乘國難危急時機，藉個人作秀製造知名度，躋身政治舞臺爭取政權的投機分子，無代表任何民主背景可言。這時期被共匪利用，做它偽裝民主的外衣，到後來利用失效，兔死狗烹，都變了刀頭之鬼。美方特別是馬歇爾，深受這些民主人士的包圍，加強了他對共匪認識的錯誤。和談不成，責在 蔣公，馬歇爾既固執著這份成見，他竟不客氣，使出兩套挾持 蔣公的威脅來強制 蔣公。他最拿手的第一套是美援。美國國務院提出經國會

通過的五億美金新美援，是一根其味迷人的肥蘿蔔，掛在那裏要等和談成就實現聯合政府時才吃得到的。當然，這根吃不到的蘿蔔之外，還有些正在授受中的美援，給與不給，多給少給，都操縱在馬歇爾的手裏，成他威脅 蔣公就範的工具。他掌握著的第二套挾持 蔣公的威脅，是在這時期我運送大批部隊從廣東九龍海口到東北所需的美海空軍艦機的協助。我們雖經魏德邁的努力，獲得美空軍派出飛機把整個一師空運到長春，又獲得美海軍把我五個軍的十五師用十四條運輸艦陸續送到東北，然而，在運送期間中，馬歇爾仍隨時以停運為藉口，威脅 蔣公就範。馬歇爾之不可原諒到這樣程度，而 蔣公為國為民打落牙齒和血吞自我犧牲的偉大精神，真表現得令人感激涕零！

我們國際宣傳處在這時期，根據上述的瞭解與解釋，廣搜資訊，詳加剖析，透過印刷、今日回頭檢討，當時我們這樣努力，面對莫斯科魔力指揮棒下的傀儡，在中美兩國裏應外合陰謀運用的壓力下，實難求揭露真相、伸張正義的效果。在美國政府中盤踞國務院的範宣德配合著在中國把持新聞發佈樞紐的費正清，他們要把中國政府描繪成怎樣醜，無知美國老百姓就會相信怎樣醜。再加上，國際宣傳處的外國記者招待所，在這時期變成了美國左傾記者獨霸的世界。過去流浪的記者像史特朗、史曼特萊、白修德、福曼、史戴恩、艾浦司登等都成了響叮噹的名記者，尤其是紐約時報的艾金森因捧史迪威而把這分美國數一數二的大報變成了吹捧中共的啦啦隊。所幸，足以影響英、美輿論的三個大通訊社還掌握在不受左傾污染可以作正確報導者的手裏。這三社是：(一)美國聯合通訊社，由美國人摩沙主持，(二)英國路透社，由中國記者趙敏恒主持，(三)美國合眾社，由中國記者王公達主持。透過他們的合作，我們揭露奸謀與伸張正義的資訊與辯解仍可在美國傳播界作奮勇的搏鬥。然而，我們知道，這搏鬥，與壓頂而來的左傾勢力爭，決非取勝之道。在這不利形勢下，我們要為國家作有效的貢獻，一定要出奇才能致勝。所謂奇，是舍眾目昭彰的正道而趨無人注意的僻徑。這僻徑，是我的意外發明。我澈悟，我們應設法爭取美國政府派駐中國的關鍵人

物，使他們瞭解我國處境之委屈，予我國以同情的援手。換言之，我對付盤踞在美國政府中的左傾幕僚，決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方法，以美制美，直搗美國腹心之患。

要瞭解我那時期怎樣爭取美國駐華關鍵人物，我得先說明，當時國際宣傳處與辦情報的調查局在作業上有怎樣密切的關係。我在本記第十章第一節「三策選一」裏已把顯光兄和我怎樣是中國情報事業的創始者，調查局局長戴雨農怎樣受 蔣公命稱顯光兄為太老師的經過作了簡短的敘述，因此，國際宣傳處跟調查局經常在作業時有密切配合的聯繫。有了他們的配合，我們經常可以對外在敵情方面，對內在共匪陰謀方面，得到正確的寶貴資訊，以提高我們宣傳之可信性而增加其效果。但這聯繫是最高度的機密，不能當作普通作業處理，顯光兄經常只把這配合工作，由我協助策劃，由魏景蒙奔走活動，只限我們三個人緊密合作來處理這些資訊的吞吐。現在面對左傾攻勢壓頂而來的不利局勢中，顯光兄之引退，就只剩我與景蒙兄來趨這僻徑了。所幸景蒙兄待人接物那一套交際的圓滑長才，能在杯酒聯歡之際，以其笑謔談諧的魅力，經常發生出人意外的奇效。好在我們的設計，已把無所不包的情報作戰，集中作爭取關鍵人物的焦點作業。只需正確掌握到這個人影響其作業之錯誤認知，予以正確真實的資訊，就可達成我們在國難嚴重期間，爭取到為中、美兩國前途共同合作的忠實難友。怎樣由瞭解對方認知的錯誤，進而聯絡情報局搜集糾正其錯誤的資訊，這分任務由我承擔，景蒙則任奔走聯絡之責，我們兩人就這樣分工合作把我們策劃的走僻徑工作推動起來。

我們這份工作是從民三十三年冬史迪威事件高潮時開始到民三十六年春馬歇爾調解失敗後結束，兩年期間中不斷進行著。國際宣傳業務由處改局，顯光兄去職又再起，先後參加指導，實際工作還是由我和景蒙兄兩人一貫承擔。我們要爭取的美國駐華關鍵人物，前期為赫爾利，後期為魏德邁。

先說赫爾利，他在順利結束史迪威事件後，民三十三年蒙 蔣公特別推薦來華任駐華大使時，受謝偉志的愚弄，還天真地以為 蔣公應負國共和談失敗之責。但，在再度接觸期間，加強了他受 蔣公偉大人格的感應，同時在和談的談談打打延宕過程中逐漸認知了中共之從中播弄，不免懷疑國務院把和談阻力推在 蔣公身上的不當。我注意到他這種態度的轉變，確信他是我們應該爭取的難友。爭取方法，我決定應直接揭破，破壞和談的阻力是毛不是蔣，而毛之膽大妄為是受他同僚謝偉志的鼓勵。謝在延安的活動早受調查局的注意，但尚未重視到提升為專案調查的程度。我把我們決定的新目標通知了他們，要求緊密合作。果然，不久他們就送來謝偉志在延安針對赫爾利調解和談活動的綱要：他想說服毛澤東不要相信赫爾利真能代表美國政府，美國政府要支援的中國政府並沒有一定的人選，只要受人民擁戴有抗日能力和決心的人，美國政府都願支援，因此赫爾利堅持保證國民黨執政的態度並不能反映美國政府對華的真國策。因此，我們作結論說，毛澤東受謝偉志的這樣鼓勵，必然要借和談來拖垮國民黨，絕不願和談成功保證了國民黨的執政。我把這些資訊和推斷，透過景蒙兄的交際運用送給赫爾利，提醒他對謝偉志的警惕，雖未必能主刻見效，卻已伏了他有此可能發展的心理準備。實際，謝偉志勾結中共抽國民政府的後腿是真實行動，並且，這不是他一個人的行動，而是史迪威事件後，很多駐華文武官僚共同的行動。赫爾利是一位瞭解環境很敏感的政客，經我們確實資訊不斷供應的結果，自會肯定我們的警惕而澈悟和談受阻誰應負責的真相。最後，我們經調查局努力找到了謝偉志在史迪威未失勢時密送給史迪威的一份聽謂「第四十號報告書」送給赫爾利。這是謝代史所擬請華府改變對華政策的密件。文中建議美國政府放棄國民黨，扶植中共軍，才能使中國成為抗日的有力盟邦。最令赫爾利意外震怒的，這分密呈華府的重要文件，我們得自共匪檔案中，他竟不知道。赫爾利這才徹底覺悟共匪得此撐腰，還會接受和談嗎？當然，使赫爾利堅定要跟美國駐華左傾僚屬唱對臺戲的決心，還在民三十三年底發現兩起美國駐華軍官跟中共密訂的大規模合作計畫，我前文已詳述經過，

不再贅述。我在這裏只想補充一點，他所以能詳細把握到這兩大計畫內容的資訊，仍還靠我們的供應。這一次才真正確定了赫爾利支持我政府的反共姿態，返國控訴謝偉志叛國置之於法，最後形成他在羅斯福雅爾達新政策不就，憤而辭職後還在國會中作斥責國務院以示抗議的壯舉。他在他的自傳裏揭發左傾幕僚充塞在美國中央地方政府以及駐外使領館外，複作同情中國的不平之鳴。他說道：

「蔣主席領導他的國家抵抗日本侵略有八年之久，其中四年他是單獨作戰的。那時美國以廢鐵和汽油輸往日本，英國和日本照常貿易，蘇俄和日本和平相處。現在盟軍勝利，中國的堅強士兵們和他們勇敢的領袖應該享受他們勝利果實的時候，中國卻被盟軍圍困、出賣，而終至於毀滅！」

這位難友雖竭忠盡慮幫我們的忙，仍無補於我們的挫折，然其義憤之激昂已足令人心折。我們應該自慰這一番努力爭取他，的確得到了豐盈的收穫！

第二位我們要努力爭取的難友是魏德邁。魏德邁的處境與赫爾利絕對不同。因為他在日本投降前是蔣公自己挑薦的參謀長，繼桀驁的史迪威之後來彌補中、美兩國元首誤會的。因此，他是認認真真、切切實實執行參謀長應盡的職責並採取應取的態度，深受蔣公的倚重，同時，他自己也培養出瞭解中國的智慧與關愛中國的感情。識者或將說，像他這樣一位美國僚屬，還有什麼要爭取的呢？我們的答覆是「還是有！」因為，他究竟是外來的，身處當時蔣公面對的複雜環境中，他要盡職必先瞭解這環境；幫助他瞭解這環境是我們爭取他成一個推心置腹的難友來做蔣公得力助手應取的執業目標。因此，我們決定在赫爾利之後他是我們要爭取的第二個難友。

魏德邁在他的回憶錄裏追憶蔣公所處的惡劣環境時竟能揭露蔣公當時面對敵人，來自四個方面：第一方面的敵人不用解釋是日本軍閥；第二方面，他說是中國共產黨，也可以說是應有的常識；第三方面，他竟指出是中國軍閥餘孽，李宗仁、李

濟琛，馮玉祥等，已經足證他透視 蔣公處境已達不易多得的深度了；最後他能看出第四方面 蔣公面對的敵人竟是號稱盟友的大英帝國，真是 蔣公入骨三分的知己之言。實際，他還瞭解 蔣公更有第五方面的敵人，他只能藏諸心底，不便明言，那就是他的同僚，伏在美國政府裏海內外互為呼應的左傾幕僚。他之所以能這樣深入地瞭解中國政府的處境，是國宣處配合作業實施有效的明證。最使他特別提高警惕的，是民國三十三年底發現的兩項美軍與中共擬訂的軍事合作計畫竟沒有讓他知道內容就要請他推介毛澤東與美國總統見面。他雖發現是他參謀長在從中作祟，可是仍不知作祟的內容。提供給他這兩案內容的人，就是我與景蒙盡了一臂之力，這才打定了他為 蔣公抱不平，努力支持中國政府的決心。日本投降之後，他改任為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團長，可惜那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實施完全把握在受左傾幕僚操縱的馬歇爾手裏，他這團長雖欲熱心助我，亦無從著手。但，當蘇俄軍隊霸佔我東北，國軍部隊遠駐在西南之際，他眼看美國政府無意在後勤及武器方面援助中國政府接收東北，他竟跳出他代表美國政府的身分，熱忱出主意幫助我國。他向 蔣公建議組織一個中、美、英、法、蘇五國共管東北的臨時委員會，以共管的方式來代替蘇俄的獨佔。他同時建議，中國政府派遣第一流政治軍事長官坐鎮華北，確保長城以南的政權。他這建議，實際有五國「託管」的意義，只怕引起中國人民之反感，故意含糊其辭。既是「託管」即有長期性之含意，可使東北在五國共負責任治理的彈性安排下，使 蔣公得從容處理切實接收東北的有效佈置。他越位助我的誠摯實足感人。可惜 蔣公處境實難採用他這好意的建議，理由很簡單：我因日侵我東北才發動八年苦戰，今苦戰勝利仍使東北受國際共管，實難以得全國同胞的共識與諒解。可是，我們今日作事後檢討，魏德邁這項建議倘荷 蔣公接受而正式提請美國政府的同意，當時蘇俄之蓄意插足太平洋的野心已暴露無遺，此建議是及時阻止其東侵之好藉口，美國政府必能默許其有利美國而表示同意。英、法必步美後塵而跟進，則四國合作之壓力，很可能使蘇俄知難而就範，把東北暫時穩定下來再圖挽救良策。這建議的確是魏德邁忠心事 蔣公深思熟慮

的貢獻。可惜為正義考慮所阻，未蒙採用。然，魏德邁助我之忠誠並未因此而縮手，他仍盡其可能儘量達成 蔣公由國軍直接接收東北之願望，衝破其左傾幕僚種種方面的阻力，動員美國海空軍的艇機盡速儘量把我五個軍的精銳部隊由大陸東南運到東北去爭取接收。這種力排國內阻力來助我的忠誠，實足令人敬佩。實際，他為中國謀，也為美國自己謀。他在返國後向國會報告，檢討美國對華政策之不當，曾經說：美國既采遠東均勢政策，就不應該讓中國衰弱；美國既決心把日本勢力驅出東北，就不應該讓蘇俄去佔據東北。羅斯福只知口說遠東必須均勢，可始終沒有正視這問題，助蔣委員長實力之增長：他只知全力與德國戰，沒有顧到中國受日本侵略的苦戰。戰勝之後，美國又袖手旁觀，坐視東北富源受蘇俄之搜刮利用，予中國共產黨以篡奪政權之機。他這套坦白批判，為中國打抱不平實際也是糾正美國政府的失策，予美國政府中左傾幕僚以迎頭的打擊。怪不得，四十五年後的今天，魏德邁把他當年辦事的檔案，編纂成一本書，命名「論戰爭與和平」，請 蔣公夫人宋美齡女士寫讀後感，蔣夫人盛讚魏德邁是史迪威事件所造成中、美兩國軍人摩擦不和後遺症的調解者，使兩國軍事合作重溫和諧協調的舊夢，魏德邁之功實堪感念。蔣夫人又稱魏德邁之深切瞭解共產黨遠超他的任何長官。言外之音，實堪玩味！

綜合上述赫爾利與魏德邁這兩位在美國駐華文武官員左傾一面倒，我政府深處國際壓迫劣勢之中，都能獨持正義助我困鬥，成我患難中難得的益友，在他們旁邊不斷供給資訊，提示正確研判的國宣處，多多少少發生促成與維持他們態度的功效。

將處政局最後奮鬥

馬帥受愚援華援匪

還都之後匪態惡化已達公開為俄酋傀儡仗勢猖獗的最高程度，而馬歇爾受華府左傾幕僚的蠱惑，仍以強制 蔣公委屈讓步，提升中共政治定位，組成聯合政府，

為他代表美國總統來華調處不能動搖的原則。他到中國第一次晉見 蔣公時，蔣公即坦率提醒他說：「這一次美國參加國共和談，調處軍事衝突，務須中、美兩國政策互相協調，更要美國政府與中國政府互相瞭解，免為共黨離間中傷的奸計所乘才好。」可惜 蔣公這一套由衷的傾訴，馬歇爾中了共匪蠱惑之毒已經太深，只當是耳邊風，一點聽不進去。

在這期間，俄共與共匪配合的篡奪東北雙簧戲，一退一進，正如上章所述演得絲絲入扣，把哈爾濱和長春一帶都讓匪軍接管了去。可是就在同時，國軍配合著魏德邁協助的美國海空艦機運輸與自己由鐵路陸運，雙方並進，開進東北瀋陽以南的部隊也已有六個軍之眾。這六個軍可說是集中了全國最精銳的部隊，其中包括由杜聿明率領的第五軍，在緬戰初期，戰績輝煌，備受史迪威之嫉視；由孫立人率領的新一軍，在緬戰後期打下密芝那；由廖耀湘率領的新六軍，在緬戰後期，連下緬北大柏家與胡康河谷；由劉玉章率領的第五十二軍，在長城之戰揚威於古北口；由向鳳武率領的第七十一軍，在淞滬之戰揚威於江灣閘北；以及由石覺率領之第十三軍；軍容之盛，可說是一時無兩。但，共匪此時有了俄共撐腰，悍然無懼，擺開抗拒陣線阻止國軍北上。政府當然根據雙方同意的停戰協定促令國軍北上接收蘇俄按約交出的所有城市，於是戰火就此爆發起來。國軍由第五軍軍長杜聿明任總指揮與林彪所率號稱三十萬大軍的匪部，交戰於四平街一帶。經一個星期的激戰，匪軍傷亡過半徹底崩潰，影響其他殘部兵敗如山倒，分向中東鐵路、哈爾濱、綏芬河一帶奔逃。杜總指揮即於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由四平街進駐長春，並令其所部以哈爾濱為目標，沿長春鐵路線向北進擊，勢如破竹，匪軍毫無抵抗行動。

就在匪勢這樣生死存亡的重要關頭，馬歇爾由美國飛返南京，以調人身份找到了 蔣公，說國共這樣打下去，怎樣再能進行和談，要求 蔣公速下停戰令。美國取這樣態度，的確使 蔣公十分為難了。為了緩衝緊張，保留考慮時間起見， 蔣公飛赴

瀋陽，視察戰局，擬綜合前方報告做他決策的參考。前方報告都認為匪軍受此打擊，如不受國際特殊支援，一時無再起的希望。蔣公念匪總是中國人，也應有放下屠刀，攜手連心，和平建國的共識，就在瀋陽先令前方就地停止進擊以待後命。同時由瀋陽函告馬歇爾，表示國軍可接受停戰調處，惟應先由匪方實踐停戰協定以及實行統戰方案為條件。後由瀋陽返京，即接受馬歇爾建議，於三十五年六月六日頒發所謂「第二次停戰令」，並且還把已經渡過小松花江停止在雙城附近之國軍追擊部隊，撤回到陶賴昭與德惠縣一帶防守，以待後命。同時發表聲明，表示國軍停止攻擊，限期十五日，希望匪方得有機會能確實履行其簽訂之停戰協定。就在這十五天內，馬歇爾提出方案與國共代表協商東北停戰與整軍問題，反覆商談，毫無結果。蔣公又接受馬歇爾的要求把停止攻擊的命令再延長八天，到三十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午為止。不料在這八天內，匪方提出更無理的條件，致令商談無成就可言。可是這兩次停戰令使國軍高昂的士氣直線低落，坐令士無鬥志，從此國軍在東北局勢中永遠陷入被動地位，匪軍占盡了上風，變成了政府在東北最後失敗的惟一關鍵。蔣公在其遺著《蘇俄在中國》中沉痛地自我檢討說：

「當時已進到雙城附近之進擊部隊（距離哈爾濱不足一百公里），若不停止攻擊，直占中東鐵路戰略中心之哈爾濱，則北滿之散匪，自不難次第肅清，而東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滿立足，而蘇俄亦無法對共匪補充，則東北問題自可根本解決，共匪在東北亦無死灰復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國軍最後在東北之失敗，其種因全在於這第二次停戰令所招致的後果。這不僅是重蹈過去以為中共亦是中國人，總是愛中國的，終有和平解決可能的這一幻想所帶來無窮災害的覆轍；而亦就是我在『檢討反共鬥爭成敗得失』一章中所述的『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夠徹底』以及『我們自信太過，忽視了共黨獸性與暴行』的弱點，所造成的禍根。」

蔣公這一段檢討第二次停戰令所造成東北失敗牽動大陸赤化全局的後果，把一切責任由他自己一肩挑了起來，這顯示他打落牙齒和血吞，偉大領袖的負責精神，固足令人欽敬，但，我們以歷史家的客觀衡量作公平研判，蔣公當時下此明知不利的命令，有他保持中、美合作以避免同胞再度塗炭，並達成和平建國宏願的苦衷，在馬歇爾的堅持建議之下，萬分不得已才下這停戰令的。因此，馬歇爾執行美國援助友邦中華民國成立民主政府政策，沒有援助美國承認的國民政府，反而對摧毀這政府的叛逆，幫了一個起死回生擴大實力的大忙。更令人百思不解的，馬歇爾犯這援華援匪的錯誤，一之為甚，怎能繼續為之；不料他竟會再犯，而增加其毒害我國之份量，種下了大陸赤化的禍根！

停戰令的影響，政府軍遵令停戰，匪軍則乘機進犯，絕對無視此令之應雙方共遵。故兩次停戰令之結果，迨三十五年五月五日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國民大會之時，匪軍在熱河、察哈爾方面已進佔承德；山東方面已包圍青島與濟南，斷絕津浦鐵路交通；蘇北方面占泰興進攻口岸鎮，威脅首都南京；晉綏方面，攻佔二十二縣，完成對太原與大同的包圍。美方作調人之軍事調處執行部為了保持北平、天津安全，要求匪軍退出承德；為了保持華南與華北的交通要求匪軍撤離津浦鐵路；為了保持首都的安全要求匪軍退出蘇北。這些要求，可說是委曲求全到無可再低頭的程度，可是匪方蠻橫，一概置之不理。政府方面為了要達成和平建國的目標，努力邀集全國各方面的民間代表，當然包括匪方，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協定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完成中國國民黨還政於民的建國程式。共匪拒絕，主張先要改組政府讓共黨參加，再開國民大會。政府主張先要解決軍事問題，再談共匪參政的政治問題。共匪又主張軍事與政治問題同時解決。為此爭議，政府讓步把原定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的日期改延到十一月十二日。從這時候起馬歇爾的調解工作發展到最緊張的階段。時匪方代表周恩來作態不入首都，常駐上海。蔣公經常在暑期移駐江西廬山牯嶺辦公，馬歇爾要攝取雙方意見以求協調，不得不在這三、四月間竟上廬山勸請蔣公讓步達八

次之多。在他奔走期間，八月十日以調處困難曾與司徒雷登大使發表共同聲明，述其協助中國以和平方式建立民主政府努力之誠意外，並表示談判政治與軍事糾結難解的問題迄無解決之道。蔣公即於八月十四日公告提出政治軍事上六項讓步的新建議。繼續在九月三日，接受馬歇爾的建議，於三人小組繼續調處軍事衝突之外，另再成立五人小組，商談政府改組及國民大會問題。這是政府的一大讓步，使軍事問題與政治問題得同時商談合併解決。

不料匪方在蔣公委曲求全作這重大讓步的時候，突然進佔張家口，趕走駐在張家口的軍事調處小組。匪方此舉不獨破壞停戰協定，並且割裂政府熱河、察哈爾之完整，威脅到北平、天津的安全。蔣公受此暴亂之脅迫，不得不飭令國軍予以撻伐。匪方代表周恩來竟肆行要脅，向馬歇爾表示：「政府如不停止對張家口及其周圍的軍事行動，中共即認為政府已公開表示，和談全面破裂！」他隨即離京赴滬，回避交涉。馬歇爾急了，要求蔣公立即下令停止進攻。蔣公仍忍氣吞聲接受馬歇爾的要求，下令停戰十天，在此十天之內，由三人小組會談軍事問題，由五人小組會談政治問題，以求徹底解決。不料，在此重要關頭，匪方不但不作協調的反應，反增加其軍事三條、政治五條之無理要求。馬歇爾不得不親自到上海求見周恩來，邀他回京繼續商談。周除加強其無理要求外，並在語意中直接譴責馬歇爾身為調人實際處處偏袒國民政府之不公。馬歇爾遭此侮辱，懊喪回京。蔣公在十日停戰限期過後自然就下令進攻，一下子逐走了匪軍，收復了張家口。

不料蔣公這樣委曲求全忍氣吞聲的措施，仍遭馬歇爾之不諒，他竟因此勃然大怒，下令停止一切美援，使此後中華民國得不到美國政府任何軍備的補充。馬歇爾的這樣突然翻臉，實際也反映了華府對華政策的轉變。因為，早在三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美副國務卿艾奇遜已經發表宣言，聲言美國調處國共衝突取一視同仁不分軒輊的態度。他又在同時向眾院外交委員會報告稱：「中共曾要求他們部隊併入國軍之先，

應得美國少量軍備之供應並予其部隊以短期之訓練。馬歇爾已同意此項要求。」在美國政府考慮匪方這項要求之際，竟同時予我政府以停止軍援的打擊。

美國在三十四年與我政府訂約，承認為我國裝備及訓練三十九個師，後來又允諾為我政府裝備及保養八個半空軍大隊。到了三十五年春；美國又與我政府訂約承諾，把戰後留在中國境內之軍用車輛全部供應保養器材撥送中國政府使用。美國政府這一切承諾都給馬歇爾這一道命令化為烏有。跟上來杜魯門總統竟以美國不助中國打內戰為理由，在同年八月十八日發佈行政命令，禁止任何美國商人售予剩餘軍用器材給中國政府。美國這一套全面封鎖美援的辣手，是在緊要關頭沉重打擊中國政府壓平共匪叛亂的實力；這打擊的致命傷，更在政府軍事裝備多來自美國，此後不論槍、炮、車輛一切軍用器材稍有損壞，亟需零件補充，而這些零件都來自美國市場，今一經全面封鎖，斷絕補購來源，即一隻螺絲釘或一根杠杆的損壞可使一尊大炮一輛坦克車的報廢！政府軍就在軍備因零件來源之告竭而這樣日漸削弱的狀況下，與背後有俄共儘量擴充其軍備的共匪作戰，任何雄才大略的軍事家都無法挽救這基本動搖的頹勢。這種惡劣形勢的延續一直到三十七年三月三十日杜魯門不勝國會的壓力決定恢復四億美元援華案，其中有一億二幹五百萬規定專作軍援之用。這時候，匪軍已直逼平津，傅作義任保衛平津的總司令，軍械告竭，急待補充。美方決在此援華案中撥價值一千六百萬美元之軍火送給傅作義。傅氏得此美方起死回生的援手，非常高興感激。孰料他伸長脖子左等右等，等到的美援軍火，開箱一看，裏面裝的槍械都缺乏零件，沒有一槍一炮可以使用。這才使這位決心作最後一戰的忠貞大將不得不變節降敵了。這些無用軍火的運送，顯然是美國政府中左傾幕僚動了手腳，也是他們愚弄馬歇爾之後，跟上來扯 蔣公後腿的另一絕招。

可是馬歇爾仍執迷不悟，一心以為美國好意協助中國成立聯合政府以解國共糾紛的阻力，完全來自 蔣公，反同情共匪之被侮。故在三十六年一月七日借升任國

務卿之藉口，放棄其一無成就之調處任務回美之時，他還發表聲明，表示希望中國政府能保持以和平態度來解決共產問題，明示他的偏見，確認中共不是真正共產黨，一定可以接受民主合作的建議的。聲明原文中一節說道：

「我相信中共是自由而激進的，可是有很多人以為中共組織森嚴不能同意我的看法。但，我切實發現中共中間的確有主張自由份子，特別是年輕一代的人，都因厭惡其政府之貪污而加入共產黨，這種人重視中國人民的福祉超過運用高壓手段，在不久將來，會重訂其共產意識型態的。」

杜魯門總統在馬歇爾聲明之前，三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也發表他美國對華政策的第二次聲明。在這聲明中，他再度強調美國態度之不變。中間一節說：「一年前本國政府所發表的意見今日仍有效。本年二月同意的政治統一計畫是正確的。」可是，中國政府實際的處境卻跟美國這兩位政治領導人所說的絕對背道而馳。蔣公是儘量放棄自己的主張，抑制自己的尊嚴，竭力委曲求全，以期爭取美國的合作，來達成他真正和平統一建立民主政制的願望；可是最後所得的結果，只剩下美國的合作絕裾而去的幾句空言，留下他一個人單獨面對得到充份外援的叛逆之壓頂而來的進軍攻勢。馬歇爾之來華的確抱著協助蔣公達成其建國宏願的由衷善意，可是其善意的這樣惡化，他自己不承認，實際也簡直不知道。最令我們欽佩的，蔣公受此打擊，仍在三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發表元旦文告中表示：雖然中共拒絕參加國民大會，政府仍願以政治方法來解決政治問題，政府決不放棄任何政治解決的機會，和平商談之門是永遠暢開的。足見蔣公要求的目標與馬歇爾受命達成的目標是絕對一致。那麼馬歇爾之鎩羽而歸，究竟誰應該負責呢？徹底檢討，這不是片面負責的問題，而是雙方對峙成敗的問題。是史達林遙控製造侵略亞洲傀儡的進攻，美國無法阻止敗退的問題。美國的對華政策，一貫認定蔣公領導的國民政府是為獨裁、貪污、腐敗、無能的執政國民黨所把持，而中國共產黨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只是不滿國民黨把持政權，努力建

設民主政體人士集合的革命黨。因此，在馬歇爾調處過程中，中共永遠被看作誠意促成聯合政府而隨時隨地受國民黨的壓迫難償心願；當然 蔣公領導的國民黨，在美方估計中：永遠是惟恐聯合政府有所成就而以暴力壓制中共的獨裁執政黨。馬歇爾是抱著這種不平心理自認調處失敗回到美國的；跟著後來匪篡大陸，我政府遷台，美國國務院也根據這套心理，發表白皮書，徹底推乾淨美國應負的責任。但，事實還是事實，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欺世伎倆可蒙蔽視聽於一時，絕難面對歷史的評判於千古。四十年後的今日，復興基地上的執政者還是當年的中國國民黨，篡奪大陸的叛徒還是當年的中國共產黨，試把兩黨的政治運作的績效攤開來作一比較，究竟那方面是為國為民矢志民主的政黨，不辯自明。那麼，我們再回頭檢討當年美國總統杜魯門與主持調處中國問題的馬歇爾又怎麼會犯這樣大錯的呢？答案很簡單，史達林埋伏在美國政府中的左傾幕僚，工作發生了奇效。他們竟能使在歐洲協助戰後國家，不論敵友都能從瓦礫堆裏重振家邦，名震一時的耶誕老人，來到中國竟變成了受史達林牽著繩子，洗了澡，戴上帽子跳跟作樂的一隻猴子！堂堂戰後領導世界的美利堅合眾國在世界史中沾上的這一污點，就是寫一百本白皮書也洗不清的了！難怪當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退休後寫回憶錄，痛自譴責他代表美國政府處理中國國共和談的乖張失當，無以對自己良心的坦白檢討。

元首召詢董兄再起

還都後的國際宣傳業務之執行，應分兩個時段來進行敘述。前一時段，在三十五年五月二日新聞局成立以前一整年還是我獨撐艱鉅的局勢；此後到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一年半的階段，是國際宣傳處改組為新聞局，由顯光兄出任局長，我任副局長，是我仍回復協助處理宣傳業務的局勢。

先把前期未改局前，我仍獨撐艱鉅階段來講。勝利還都，要把在重慶八年創建的整個國際宣傳處積累的人員、檔案、器材，從長江快近尾梢的重慶搬到長江快要

入海的南京，真是一件十分困苦的工作。我真慶倖自己在這重要關頭找對了人；我找到了唐鄰柏，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一般人所謂的「讀書人」；他竟能把這樣一件困苦工作處理得有條不紊，確當周全，證明我「讀書人」也能辦好事務工作省悟的正確。這省悟是從前一任國宣處事務科長陳耀柱貪污瀆職事件中激發出來的。耀柱是我聖約翰大學畢業的同班同學。他專修的是經濟學，畢業後就在一家外國銀行中辦事。我就職國際宣傳處處長時，要找一位主持總務人員，就硬邀這位專攻經濟學的陳耀柱來擔任總務科長。當時心理以為辦總務必找經濟學專家才辦得好；不料，這設想完全錯了。這位經濟學專家竟乘機發展他發橫財的作業。當我當面質詢他時，他竟直截了當答復說：「你做處長，前途無量；我屈居一個科長，不乘機撈一筆，還有什麼希望可言！」這一句反常悖理的話，使我頓悟用人標準，不能專顧「能」不「能」，也要注意「守」不「守」，能力與修養要齊頭並重；甚至應偏重修養。因此我找上了資料室主任，純粹「讀書人」唐鄰柏來繼任總務科長。他果然能不背我的期待，順利完成國宣處這樣大搬家的任務，使我自慶這用人標準轉變的成功，不勝異常興奮。不料，到了南京，安頓粗定，鄰柏就要求我履行諾言，准他辭去總務科長之職，另轉其他他能勝任的職位。的確，在我邀他轉任總務科長時，他因職非專長，堅不肯就，我曾作試辦幾個月為條件之允諾，然試辦結果，十分滿意，自無另調他職的理由。然他辭意堅定，竟以去就爭。我不得意，允其以待我覓得適任者為條件，求其暫維現職。在我緊迫物色主持總務適任繼任人選階段，堂弟麟生推薦其光華大學畢業的同班同學陳新萌兄，謂其修養與能力為同班同學共同推許之傑出者，向我建議，不妨約談以作任用選擇的考慮。我同意約新萌來談，數度接觸之後，我深感新萌常識豐富，分析與判斷事理之敏銳與正確，其為「讀書人」之標準，有過於鄰柏。於是即以邀請其繼鄰柏出長國宣處總務科長職之議，提請同意。此建議真出新萌意外，他堅持辦理總務實非所長，婉拒我邀，並立即啟程返故鄉常熟以示決絕。我除去函再作正常邀請外，也專程返裏，登門作三顧茅廬之面邀。新萌受感，允隨來南京，接鄰柏待交的總務科長職務。新萌也

以一個毫無辦事務經驗的「讀書人」，有能有守，辦理總務任務，永遠為我終生發展事業的得力助手，徹底肯定了我當年省悟的用人標準之實踐有效。至鄰柏卸去總務科長職務後，即請假赴杭州，出人意外地投西湖自殺。使我頓悟其堅辭總務科長職，並非以不稱職而求去，實已具自殺決心，仍要把他應負的職務來去分明，有個交代，其有守有為的做人品格之高，令我至今欽佩。至其自殺導因，事後詳悉實是婚姻引發誤會的慘劇。抗戰突發時，他的未婚妻家因減少逃難負擔，要求立即給女兒完婚。鄰柏婚後帶了新娘子，隨其所屬機關到衡陽；按照當時一般機關慣例，在城裏辦公，在鄉下安頓宿舍，以免眷屬跟著逃警報之勞。不料，新娘子不諒，以為鄰柏一早離家，深夜才返，必有外遇，經常與夫爭吵。爭吵達高潮時，新娘子竟不告而別，來到了重慶。鄰柏愛妻情急，竟辭去職位趕到重慶來找新娘子。他之就職國際宣傳處是一方面求生活有寄託，一方面繼續找妻子。不料，最後找到了他出奔的妻子已經變了別人的妻子了！這才使他抱著決心自殺的念頭為國宣處服務的，其經過真是一出慘絕人寰的悲劇！

至還都初期，國宣處人事更動之最大一樁事，是跟著抗戰勝利日敵投降後必然要撤銷的對敵科的疏散。科長崔萬秋本是青年黨黨員，得以青年黨的代表資格，參加商震主持的中國受降代表團到東京去參加接受日本投降，跟著就留在我駐日本大使館做外交官了。該科專員林忠，則蒙接管臺灣的行政長官陳儀之邀，回他臺灣老家，擔任光復後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臺灣廣播電臺的台長。其餘該科人員，除選留三、五人，分在其他各科擔任對日經常宣傳工作外，概予遣散。第二件重要人事變動為調派編撰科科長沈劍虹擔任國宣處美國三藩市辦事處主任，其遺缺則由該科專員萬君和升任之。第三件人事變動則為外事科科長張彼德受新任上海市長吳國楨之邀為其秘書，遺缺由專員沈錡升任之。抗戰結束，本處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合辦之新聞人員訓練研究所辦了兩年就跟著結束。兩年訓練成材之學員皆留處工作，故還都初期工作人員相當充沛。例如，余夢燕、王洪鈞、周森鑄、凌崇熙、李惠苓、殷珊姑、沈昌瑞、歐陽

美生等十餘人，皆分配在各科擔任工作。勝利之後論功行賞，我當然要想到在美國西岸範都拉的那位美國牙科醫生而兼業餘無線電收發專家史底華博士，八年內給我們做對美宣傳重要溝通管道之功。因此，我特電請他帶著太太來華，住在國宣處外國顧問宿舍內，優於款待外，並呈請主席 蔣公特予接見，贈送勝利勳章及獎金十萬美元。這是遠出史底華意外的特殊收穫，使他對我的推薦請獎深具感謝之忱；那時他應邀來華，還以為國宣處要他繼續抗戰時期所任電訊溝通任務，故隨身攜帶了全套收發電傳器材；不料，我方電訊恢復正常，有政府電訊局統一執掌，其所攜器材無所應我宣傳之需要；因此，他為表示他對我的謝意起見，專函把這套全部收發報電傳器材送給我個人。我得此贈予，自己無所用，交國宣處電務科保管。不料，此後由處改局，我們交卸新聞局局務時，景蒙兄以此為史底華贈物不必交後任，竟給他輾轉遷運，把這套全部收發報電傳器材帶到臺灣，變成了他創建英文中國日報最初期發刊頁型通訊報之用。景蒙兄始終沒有知道這是史底華贈我的私人禮品，他因擅用新聞局存物自感不當，反在英文中國日報打定基礎之後，贈送當年為局長的顯光兄美金四千元以償歉意。我仍默然不加糾正，因為，目睹此對我不生應用價值之器材，能由景蒙兄善予運用，發生產一新報之作用，已感十分快慰，此物誰屬實無一爭價值。只在今日回憶寫自傳時作這紀錄，以示英文中國日報之產生跟我有這樣一段因緣。

至新聞局未成立前我繼續獨撐艱鉅的一整年，適當馬歇爾二次來華積極調處國共衝突最艱險的高峰時期。共匪得俄援後的態度突變，囂張跋扈到不可理喻的程度，馬歇爾之受愚使美國援華政策反成助匪奪權的奧援。這一些陷我政府於極不利的險境，我在本章第一節裏已作了詳盡剖析的敘述，無待贅述。國際宣傳處面對這種變局，自必一本我政府處境與既定國策，動員全處海內外同人，透過文字、語言各種方式的傳播媒介來宣揚真理，澄清是非，求自在人心的公道。當然，我們面對的問題看著千頭萬緒，實際檢討，綜合集結到一點：美國政府調處國共衝突政策的基本錯誤。因此，我們宣傳的目標，也只集結成一點：喚醒美國政府與人民糾正他們這項對華政

策的錯誤。共匪在這階段已經撕去和善假面具，暴露猙獰真面目：他們絕對無心促成和平談判，卻也不願見和談的破裂。為什麼？我們指出了共匪的兩大陰謀。第一，他們製造好幾次國共衝突的事變，把促成事變的責任硬推在國軍肩上，迫使馬歇爾迭次揚起停止美援的威脅，使國軍實力原有的絕對優勢江河日下，因此，他們是利用和談來削減國軍作戰實力的。第二，匪軍雖經俄援，吸收偽軍人員以增強其作戰人力，配備日軍武器以增強其作戰火力，然尚須時間加以訓練始可成真有作戰能力之部隊，因此他們是利用和談來爭取時間訓練自己軍隊的。他們就把傲慢無理與花言巧語交叉運用來玩弄馬歇爾；使馬歇爾雖感和談棘手，仍永遠保持著和談有望的信心，繼續他壓迫我政府的努力。

我們對美宣傳除就上述和談作業現狀揭發共匪這兩大陰謀之外，雖然更重要的還是透過各種傳播管道與人際關係苦口婆心懇勸美國切勿把協助作戰盟友中華民國政府的一番至誠好意，受國內外左傾勢力的播弄，反變成培養叛亂來顛覆這政府的違心決策。

不幸，我們盡知竭慮的努力，仍無法糾正莫斯科、華府與中國三方面左傾勢力合作形成的美國對華政策。我們這種艱苦奮鬥，到了民三十五年九月中旬，馬歇爾八次上廬山苦勸 蔣公讓步促成和談那階段，可算是達到了廢寢忘食的最高峰！我當時考慮廬山既已成了政治發展的熱門中心，外國記者必蜂擁而往，國宣處應妥加安排，因決親自前往，與專任招待外賓的勵志社主任黃仁霖接洽準備。在山洽辦三日後上午事畢乘轎下山，不料一位武官在山下員警崗位上招手囑停轎；說，蔣主席聽說我到廬山，要召我面談。我即乘其來接的汽車逕赴 蔣公行館。行館甚簡樸，武官即帶我入起居室，蔣公已坐候，起立握手囑就坐，待我如友好，深感不安。坐定，即詳詢國際宣傳處面對當前危局因應作業的經過，這真是給我在人背後埋頭苦幹了幾個月一個暢快宣洩苦悶的好機會，當然立即把我對現局的看法以及領導國宣處作業的經過，

作了一次長達半小時的報告。蔣公一邊聽一邊點首示默許。等我說完，連聲說好，好，好！他繼續思索了一會兒，就笑著說道：「我們面對這樣糊塗的朋友，你們還能做出怎樣更好的成績來呢！」接著他老人家就滔滔不絕地把他對時局的看法與檢討作了使我永志不忘極富前瞻性的指示。

他最先提綱挈領地指出，共匪作亂，實際是受俄共指揮，做史達林侵略世界戰的先鋒隊。可是，共匪強指這是中國的內戰，還把我們政府醜化為促成這內戰的罪魁禍首。美國政府竟以假作真，老老實實相信了他們這套花言巧語，完全忽略了躲在他們後面俄共侵略的嚴重威脅。因此，蔣公看，這問題影響的重大，不光是中國的存亡，簡直是世界的安危！美國竟不會仔細想一想，國民政府是全世界公認的中國政府，共產黨是要推翻這政府的叛逆，撻伐叛逆是政府應盡的責任。這是全世界公認的合法合理的措施，怎能強稱為內戰。美國相信這是內戰，於是，共匪就一躍而成反內戰，反法西斯，主張和平的人民代表而騙取了美國的同情。美國是抱著這種態度來調處國共衝突的。美國以為它調處的目的要促成中國的統一與和平，自認抱著公平公正的至誠來做和事佬的。在調處進行中，美國要使雙方接受調處，並遵守協議，不得不施其政治影響。我政府真誠期待和談之有結果並與美國理念與感情之協調，美國的影響必然發生重大效果。但其影響對俄共與共匪絕對發生不了任何作用。可是美國並不瞭解我們所處的這種劣勢，一味以和談不成的責任加到我們的肩上。當然，美國最大的錯誤還要推它對俄共認識的顛預。把製造傀儡蓄意鯨吞中國野心勃勃的侵略者，認作無意遠東政治的中立者。美國不知俄共的中立姿態有促成兩大目的的陰謀。第一個目的是利用和談來培養匪軍作戰的實力。第二個目的是利用和談來分化中美關係，瓦解反共陣線，使美國的調處全盤失敗。其最後企圖，待美國調處失敗之後，一面使中美關係由衝突而瀕臨破裂，一面促使中共指摘美國是要控制中國的帝國主義者，發動中國民間的反美運動，迫使美國不得已而放棄中國，俄共就乘隙取而代之。蔣公表示，他已看到這個危機的必然到來，然他對反共必勝的信心決不因此動搖。因為，蓄意奴

役人民的叛徒必為人民所共棄，至誠為人民造福的政府最後必得人民的擁護，憑這一點真理常青的信念，他要奮鬥到底。

蔣公這一套洞燭未來充滿前瞻性的理念，是在他下令驅匪離張家口，馬歇爾力勸停戰時就形成的。那時候馬歇爾正熱心奔走促成和談，蔣公竟就作了這樣消極性的結論，其預料美國受愚已到不可救藥的地步，他已準備面對國難嚴重轉變，一本忠貞報國的決心奮鬥到底。這種態度，真使我欽佩得五體投地。面談至此已到中午，我起立行禮告辭，蔣公竟留我同進午餐。菜肴簡樸，只有四菜一湯，在坐只我一人，竟類家人便飯，如此親切待遇，感念終身！下山後，兩天之內，馬歇爾就以停止美援來懲我政府克復張家口樹立政府威信合法合理的措施；致令中美關係，正符蔣公預斷，日增衝突，匪勢猖獗，危及國本。

我下山返京後，局勢益增惡劣。政府方面，盡力籌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誠邀共匪派代表參加。共匪無理拒絕，硬要先讓它參加政府，再開國民大會。馬歇爾奔走調處之間，共匪及其同路人發動反美運動，在北平製造女學生沈崇被美兵污辱事件，刺激輿情，反美呼聲遍及全國各大都市；聲言美軍駐華，侵略野心，昭然若揭，要求美軍立即撤走以平眾怒；馬歇爾無奈請華府調返美國駐華軍隊，自己也以升任國務卿為口實，卸去調處國共衝突這件濕布衫而返美了。馬歇爾離華，調解工作雖仍由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繼續進行，然匪態猖獗，已擺足敵對態度，乘機到處進攻，以不可能成交的條件維持和談的繼續。在這惡劣局勢之下，政府決改組行政院，推元老張岳軍（群）先生出任院長。岳軍先生的睿智認知我們面對的艱危局勢是美國政府之受蒙蔽所造成，要使美國政府頓開茅塞，宣傳業務之加強實為當務之急。於是他就想起了業已退休在美休養的宣傳能手董顯光。岳軍先生自己在就職之前，本準備先到美國去醫治牙病，因此，得了蔣公的首肯決到美後面邀顯光兄返國任此艱鉅任務。同時，因此任務之艱鉅，岳軍先生得蔣公同意，把原來在黨屬宣傳部顯光兄手創的國際宣

傳處全部原班人馬移到政府所屬行政院，擴大組織編制，改宣傳部國際宣傳處為行政院新聞局。為了重視顯光兄起見，他這局長還兼任與部長同級的行政院政務委員。岳軍先生赴美之前，已告我，將任我為副局長，故囑我先根據此原則代擬新聞局組織條例與預算以備他回國時考核實施。

顯光兄那時在美，受董嫂的影響，深感做了十年副部長，政府虧待了他，因此，萬念俱灰，不想再入仕途；決心要學一種自食其力的職業來擺脫政治而過其自由生活。他選擇的職業是修汽車的技工。在洛杉磯他找到了一家專教修汽車的學校，報名時改小了年齡，換了姓名，在附近小客棧裏投宿，認認真真過他隱姓埋名的學生生活了。這真是顯光兄可愛天真的怪脾氣使我至今忘不了他！不幸，他這樣做，仍被那時的駐美大使魏道明找到，並驅車勸駕，帶他見到了張岳軍先生。岳軍先生坦述 蔣公對他倚重之深，國事艱困需他努力之誠，秉性忠貞愛國的顯光兄安得不為之動容而再度踏上這磨斷他神經的崗位上來了。

行政院新聞局在民三十六年五月二日正式成立，最初辦公仍接用國際宣傳處辦公原房屋，新街口國貨大樓第四與第五兩層樓面；後因地處十分繁囂之市中心，辦公空間亦過分狹窄，改在玄武門旁另建新大廈。其組織，因代表政府統導宣傳業務，故另增一副局長主管國內宣傳，由岳軍先生推薦之鄧友德任之。我之為另一副局長則專管國外宣傳。全局分三處，第一處任國內宣傳，由宣傳部凋來之詹潔任處長。下分三科，由孫思努長第一科主管報刊連系，謝紹紘長第二科主管宣傳指導，袁俊長第三科主管新聞發佈。第二處任國外宣傳，將國際宣傳處洛杉磯辦事處主任沈劍虹調回任處長。第三處主持宣傳資訊之編儲與發刊，由國宣處原任科長之王家棧升任處長。亦分三科，科長人選已不能記憶矣。實際，新聞局既由國際宣傳處原班人馬來接任業務，其重心還在國際宣傳，國內宣傳的業務仍由黨中央宣傳部肩負全責，新聞局除招集本國記者參加第二處召集的每週一次的記者招待會外，實無任何重要業務可言。故業務

重心仍在第二處，除沈劍虹為處長外，萬君和仍任編撰科長，沈錡仍任外事科長，李華倫仍任攝影科長，彭樂善仍任廣播科長外，重慶國宣處工作幹部仍都擠在第二處各展身手。同時，我記憶可及者另增張平群、蘇明璿、彭斐（女性，後為沈錡夫人）等幾位幹員，益增活力。在上述基礎上，組織方面當然還有其他重要新增與調動的部署。國內新增單位計有專任行政管理之秘書室，任王家楫推薦之費毓洪為主任秘書，由專門委員殷大觀輔助之，除處理一般公文外，陳新萌主管之事務科與蔡爾康主管之會計室皆歸其主導。國內第二項新增單位為在上海與北平各分設辦事處以與兩市市政府配合辦理國際宣傳業務。設處理由很簡單，上海為外國政客聞人以及新聞記者集居之重鎮，北平為當時俄侵東北欲瞭解中國政局丕變外國人士之觀察站，因決定派具有因應國際觀察者敏銳能力的魏景蒙為新聞局上海辦事處主任，派文字語言能力超過普通俄國人之因應對俄事務專才朱新民為新聞局北平辦事處主任。原有國宣處駐國外單位也有重大的新部署。原任倫敦辦事處主任之葉公超，經那時外交部部長王世傑之特拔，轉任外交部美洲司司長，其遺缺由任玲遜繼任之。公超調赴倫敦之朱撫松回局任專門委員。原任紐約辦事處主任之夏晉麟轉任聯合國中國代表團要職，其遺缺派原任國宣處秘書之倪源卿任之。倫敦辦事處原兼任歐洲大陸之職權，今因宣傳重心集中美國，倫敦辦事處縮減其職權專限對英宣傳，歐洲大陸只新設一駐巴黎辦事處，由汪公紀主持之。其餘駐外單位仍維持國宣處原有單位，更改其隸屬名稱，繼續執業。我們就在這樣一個隻改外觀實未增內涵的新機構中，繼續我們在時局日增險惡的環境中作最後衝刺！

逆流衝刺隨潮引退

新聞局成立在民三十六年五月二日，到了民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我隨顯光兄辭去新聞局職位，前後差不多一年半。在這時間中，政府沒有一天不在驚濤險浪裏打滾，我們任宣傳當然只能竭盡全力作最後的衝刺。現象最嚴重的當然在軍事方面，

受美國援華援匪政策錯誤的影響，國軍以軍備殘缺不全的供應來與俄援大量擴增的匪軍戰，自必日陷頹勢。首當其衝的是在東北的精銳部隊。蔣公計畫，原定將全部開入東北的國軍撤回關內，匪方測知此戰略，立即調集重兵於遼寧走廊，圖爭取錦州以掌握國軍入關的咽喉。蔣公對策，急電東北司令衛立煌由瀋陽調大軍增援錦州守軍。不料蔣電發於三十七年九月中旬，衛至十月初才調動軍隊，並取迂回路線，到達錦州時錦州已陷匪手矣。跟著錦州的失守，長春在十月十九日，瀋陽在十一月二日先後淪陷，整個東北全盤赤化，國軍精銳部隊陷於絕境，就這樣全部犧牲掉了。衛立煌事後雖經軍法處決【HGC：曾說誤。】，然他萬死亦不足以贖他貽誤戎機，斷送東北，犧牲國軍精銳的罪責！東北告急，必然影響關內，四月四日匪據洛陽，六月二十三日開封失守，九月二十六日匪軍竟奪去了濟南，國軍不得不積聚可能動員的兵力阻其衝擊，於是自三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起，迄三十八年一月十一日止展開了國軍最後衛國四十一天的徐蚌大會戰。這次會戰共分三個階段，匪軍集合了八十萬人，國軍集合了四十五萬人，匪軍傷亡了四十六萬兩千余人，國軍傷亡三十萬四千餘人。匪軍因滲透陰謀而得了勝利，這勝利是犧牲了七、八十萬中國老百姓生命得來的，真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大悲劇。會戰三階段的第一、第二兩階段，國軍的調遣都遇上堅強匪軍，被圍受困而覆亡；到了第三次，徐州剿匪總司令杜聿明親自從徐州率領了邱清泉帶的第二兵團，李彌帶的第十三兵團與孫元良帶的第十六兵團，三個兵團趕赴雙堆集去救援被匪圍擊的黃維兵團。不料，開到半途青龍集就被匪軍包圍了。國軍奮勇殺敵，頗有斬獲。孫元良透過杜聿明向蔣公請示，擬准突圍以保存國軍僅余之主力。蔣公准如所請，被圍三兵團即遵令突圍。不料，三兵團突圍成功，杜聿明中途變卦，派人一一追回，回到青龍集裏大部份被匪軍消滅，邱清泉壯烈自殺，孫、李得全生命，而杜聿明被俘後竟俯首降匪，則其違背蔣公指令之荒謬行為難逃匪謀之嫌。事後發現，此次徐蚌會戰失敗之主因真是匪謀滲透之成功。因為此次在統帥部主管作戰計畫的副參謀長劉為章（斐），大陸赤化之後，暴露身分，他那時候已經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共產黨員。

因此，三階段國軍的調遣都是匪方做好陷阱趕著國軍向裏面跳，這真是一場慘絕人寰的慘劇。徐蚌會戰失敗後北平、天津跟著失守，我在三十七年底離開新聞局時，國勢已到十分危急的最後階段了。

共匪配合他們的軍事進攻，同時也大規模推進他們政治滲透的偽裝襲擊。軍事進攻，共匪變成了叛徒，當然不能再在政府的地盤裏鬼混；可是他們竟能自己公開出走後，還留下一批偽裝爭自由的傀儡在政府地盤內，做他們裏應外合的打手。這批傀儡就是當時最能迷醉美國人，認為正真代表中國人民爭自由，爭民主的所謂「民主同盟」。這個「同盟」，我在十六章第二節裏已經列指它的領導人名，此外追隨活動者，雖後來聲勢浩大，遍及瀋陽、西安，甚至出國到香港，實際人數決不會超出兩千人。可是共匪配合著美國新聞處長費正清，強調鼓吹這些「民盟」領袖，一個個都代表幾千幾萬中國老百姓發動正義的呼聲與行動。因此，跟著就在上海、北平等都市發動學生示威遊行活動，高呼反饑餓、反內戰口號，把戰禍之責全部推到政府肩頭上來。那時候法幣價值直線下跌，通貨膨脹危機已達無法控制的情勢。事實上，八年抗戰已攪得民窮財盡，勝利後竟還要過著兵荒馬亂的日子，任何有能力的政府已無法力挽這經濟的頹勢。可恨共匪竟乘機拆臺，製造下列兩種劣勢來加重政府的負擔：第一，他們到處截斷交通管道，拆鐵道，掘公路，並同時發動遊擊隊搶劫或毀滅鄉鎮僅留的物資。這是共匪配合炮火發動不惜屠殺人民的經濟攻勢。這種攻勢，政府是無法反攻的。因為，匪軍打遊擊，吃毀了一村鎮再找第二個村鎮吃，在飄蕩中過他們的搶劫生活；可是政府要對老百姓負責任，摧毀的村鎮要修復、斷掘的鐵公路要重建，挖開的水壩要填塞，拆散的工廠要還原，因此，在前方炮火戰爭進行中，後方經濟戰，匪軍到處毀，政府跟著到處補，毫無還手機會，無法挽救經濟的日趨崩潰。共匪製造的第二種加強政府負擔的劣勢是跟著他們遊擊戰必然的後果，製造勢如潮湧的難民沖進政府控制的地區裏來。這些難民多是受共匪摧殘，窮無立錫之地，不得不一家家扶老攜小投奔政府。渴盼著政府的庇護，無屋住的給他們屋住，無飯吃的給他們飯吃，他們這樣

盼，實際也是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可也是共匪的經濟攻擊製造出來壓垮政府的劣勢。綜合共匪製造的這些經濟壓力，同時配合著連年戰爭必然促成的物資匱乏、物價猛漲現象，於是產生大規模的金融大恐慌。到了三十六年夏秋之間，政府不得不大量印行法幣以救危急。這樣大量膨脹通貨必然影響匯率，把平時三比十的匯率，戰亂時已升至三千三百五十元法幣才可換到一元美金，到了三十六年二月十七日，竟一跳跳到一萬二千元法幣才可換得一元美金，到了十一月竟再跳到七萬三千元，這還是官價，黑市更要高。法幣的如此貶值，當然會影響原來愛國者戰後投資的意願，共匪以及他們同路的「民盟」，立刻抓到機會，擴大宣傳，把這些共匪叛亂所造成的經濟崩潰的責任，加以詭辯，都推到政府的肩上來，說這是政府貪污無能的劣跡害了老百姓。這種宣傳把原來在上海、天津從事工商事業素無政治興趣的企業家也一一成了批評與責難政府的人士，而這種人態度的惡化影響英、美以及其他與中國有貿易關係國家的企業人士，也跟著抱怨政府，鄙視政府，無形中擴大了「民盟」的陣型。同時，他們態度的轉變影響美國輿論，加強多數傳播媒介對我政府的責難。這種群眾心理的變態，經過了美共與中共的從中運作是會相互影響的。中國企業家影響了美國人，美國人透過輿論的激發，又反彈過來影響中國知識份子與青年學生。於是，在三十六年底到三十七年間到處發動了要求政府停止內戰的學生示威遊行。這種運動發展到三十七年五月，上海大規模的學生遊行與員警發生了直接衝突。跟上來南京金陵大學學生示威，被員警圍在校園內制止上街，中央大學學生聞訊集體奔往解救，結果兩校學生集合在正在開會的國民大會門前，高呼要衝入會場求得停止內戰的共識。這種學生運動震撼了全國社會的安定，結合了金融崩潰勢難遏止的經濟危機，加重了勢如山倒軍事失勢的負擔。這是我在新聞局一年半中面對的政局，要我們如何配合作業。

我們宣傳作業物件變得非常簡單，濃縮成了一個，這就是在華府的美國政府：宣傳目標，也跟著濃縮成一個，那就是喚醒美國政府不要再援華援匪，害了中國也害了它自己。可是美國對華政策是俄共主導，美共中共分別醞釀，三角勾結發展形成的。

因此我們的宣傳要照顧到三隻角敵人襲來的攻勢，而喚醒美國政府更應在喚醒美國老百姓著手。宣傳最要的功能，是能掌握勢能克敵的武器，這就是宣傳的正確指標。當此國勢垂危之際，我們要說服美國人糾正他們政府的措置乖張，惟一的宣傳指標是把握真理，揭發真相來克制那左傾三角的謊言詭報。我們要不斷糾正左傾詭報說中國在打內戰。我們決不打內戰，打的是俄共侵略世界戰的前哨戰。共匪為俄共傀儡，在中國戰場上做侵略者的鷹犬。我們前哨戰的勝敗，影響到美國保衛世界自由平等神聖任務的成敗，我們是跟美國站在一條陣線上的。這是分析世局入木三分的真理，有頭腦有眼光的美國人皆應予以首肯。同時，我們要不斷糾正左傾謊言，詆毀我政府是窮兵黷武侵略主義的法西斯。政府撻伐叛逆，是任何民主國家都認為合法合理應做的政治行為，然而勝利之後，共匪立叛，我政府不願人民再受兵災之劫，一貫堅持徹底實施憲政，對此叛逆，不獨不加撻伐，反一再委曲求全，歡迎其合作參政。戰爭局勢之擴大，責在共匪，事實真相，斑斑可考，法西斯雅號應由共匪受之。至戰爭延長，民窮財盡，社會動盪招致金融巨劫，左傾者又謊稱是政府腐化無能之結果，事實真相卻是匪叛造成的災禍，我在前面已有詳細分析，都是我們當年宣傳的資料。我們國內外同人根據上述宣傳指標，運用文字、語言、人際關係各種不同的傳播管道，希望喚醒美國老百姓轉而影響他們的政府，糾正它援華援匪的錯誤政策。不料我們發動這宣傳攻勢時，發現一個不容易突破的難關，也就是左傾三角勾結所形成的陣型，掩蔽了我們要打擊的真敵人，永遠只能面對敵方鷹犬打糾纏不清的肉搏戰。因為，實際指揮這場戰爭的是遠在克里姆林宮要赤化全世界的俄共，是我們宣傳戰最主要的敵人，可是它掩蔽在瀟灑中立的姿態中，我們抓不到它。退而求其次，我們應該抓中共，可是它已經變成了炮火戰場上的公開敵人，批評指責它不再會生效，它也不會再做這傻事。因此，我們的三角敵人，只剩了美共，在宣傳戰中可以活躍而把握勝算的敵人，不幸這個敵人卻又代表了我們亟需喚醒的美國政府。同時，這個敵人，更能利用我國知識份子的崇美心理，發動反政府的民盟活動來打擊政府的威信。再簡括一句話，我們發現

那時我們的宣傳戰只是跟美國駐華新聞處處長費正清面對面的一場肉搏戰。費正清是以美國政府作國共衝突調解人身分來中國做發言人的，當時他的新聞處有自己的廣播電臺，南京、上海、北平都有他的辦事處。他的工作，文字與廣播同時進行，所選撰的資料全都是誣蔑我政府的謠言。美新處這樣說，在那時動盪的局勢中必然會發生極大的震撼而加強加速了反政府的浪潮。我們新聞局在這劣勢中，仍鼓足勇氣，作我們最後的衝刺。我們相信，不論中外，作偽者可幸勝於一時，決不能永久保持其優勢。美國人民都有雪亮的眼睛，美國報人多數有他們執業的道德規範，不會受人利用，跟著潮流向左轉，我們就抱著這份信心展開我們的業務。

我們最重要而自問最有把握的工作是爭取執業公正的國際傳播工作者的同情與合作。論理，我們說真話，告真相，滿足了公正執業記者的要求無需再加爭取，可是在這左傾三角勾結運用造成的環境中，受騙一面向左倒誣蔑政府，高捧共匪已成了一時風尚，真能保持記者執業道德規範者，已成了鳳毛麟角。所幸那時候三個世界大通訊社都是這些僅存的鳳毛麟角。第一個是美國美聯社的摩沙，他雖是美國人，仍屹然不受左傾的影響；第二個是英國路透社的趙敏恒；第三個是美國合眾社的王公達都是中國人，在執持總社要求的範圍內仍能說真話，告真相。此外外國記者要他們說真話、告真相就需要我們努力爭取了。我們國內外配合努力，在這左傾浪潮洶湧的劣勢中，確也表現了好幾次成功的績效。此中最突出的一次是在三十六年六月廿四日，由蔣公以國府主席身分接見一群外國訪華的記者，此中最突出是紐約前鋒論壇報的發行人李德夫人（Mrs. Helen Reid），史格裏普斯·霍華德報案發行人霍華德（Roy Haward）與時報及生活雜誌記者莫爾（Mr. Moore）。蔣公談話扼要簡述如下：

「我東北戰局實際是第三國際奪取政權之戰。這國際侵略者奪得東北政權，將成全世界的嚴重威脅。我可保證中國政府必盡全力來維護東北主權，並願與友邦合

作以保持世界和平。假定國際條約不受人重視，聯合國憲章不受人遵守，沒有一個國家有單獨自衛的能力。我們東北的局勢的確十分嚴重。」

蔣公談話旁徵博引，差不多談了半小時，可是主要重點就集中在上述的撮要中，仔細玩味，十足喚醒頑愚，有鉅大震撼作用。此後史實展現，中國大陸赤化之後，跟上來的韓戰、越戰赤色侵略勢力染紅了整個太平洋，至今還不知會有何止境，都給蔣公在半世紀前高瞻遠矚看到了。外國記者，特別是我們上述的三個有國際傳播領導地位的通訊社，憑他們正直無私的執業精神，當然會把握蔣公這篇談話的新聞詳予報導，在包圍中國左傾濃霧中，發射出一片燦爛的光芒。然而這光芒只能一閃而過，左傾濃霧美共中共配合製造的政府失敗，共匪取代的空氣繼續日增其魅力，使我們任職宣傳者雖廢寢忘食，朝夕奮鬥，仍感力薄。適在此時發生南斯拉夫的狄托與俄共鬧翻的新聞，我們跟美國太平洋學會主要執筆者拉鐵摩爾一場宣傳戰中獲得意外的勝利，稍稍吐了一口氣。拉鐵摩爾是一貫主張共匪是中國反法西斯的革命團體，絕對不受莫斯科的控制。新聞局也一貫駁斥他這種主張是欺世譎言，只需莫斯科的鞭子一響，共匪一定會乖乖地跟著走。在我們跟他一來一往熱烈辯論發展尚無結論中，突然發生南斯拉夫與俄共翻臉的新聞，拉鐵摩爾乘機大捧狄托，說他是第三國際中真有民族觀念者，與中國的毛澤東是同樣類型的鬥士。想不到不等我們發動反攻駁斥他，共匪中央委員會已在三十六年七月十二日竟鄭重其事地發表宣言跟著俄共譴責南斯拉夫，不需我們動手，無意中給拉鐵摩爾一個巴掌，打得他啞口無言，幫助我們吐了一口氣。

我們在新聞局中鍥而不捨以真理真相爭取美國大眾傳播界的努力，經過一年半的時間磨練，最後到底得到了收穫。這可以把已受左傾影響的紐約時報突然轉變，在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的一篇社評，對美國政府作正義的斥責，為我受美國政府之

蔑視作不平的呼籲。這篇社評是對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訪美求援遭婉拒而作的。茲譯錄其全文如下。

「中華民國政府曾透過它的駐美大使及美國的駐華大使一再要求美國公開宣佈它的對華政策。中國人預料，假定美國此時發表對華政策一定會同情他們與支持他們。因為美國是支持中國政府的九國公約簽字國之一，又因為美國是讚美中國參加世界大戰的主要國家，中國人作這假定是理所當然的，我們既需要中國，中國也需要我們。

「但最近傳聞，美國政府的對華態度雖未公開宣佈，卻在準備轉變。蔣總統的夫人今在華盛頓所受的招待，怎樣解釋也不能算是誠摯。最近十八個月美國給中國的軍援不及美國給希臘與土耳其的軍援三分之一。美國經濟合作總署長在上海所作的聲明，中國人都看作是美國把中國合法政府『一筆勾銷』的表示。這聲明並作結論說，假定現在中國這個政府被迫撤銷，代之以另一『聯合政府』，而這新政府仍能保持自由政策，則美國仍可繼續其援助計畫。

「國務院現在雖發表聲明，表示何甫孟 Hoffam（即上述經合署署長——譯者注）的聲明發表前未經國務院的核可，然而中國人的印象卻都以為把中國政府『一筆勾銷』，美援將轉給『聯合政府』，最少美國政府機構中已有一個單位有這構想了。可是，看看捷克、羅馬尼亞等國家的榜樣，美國政府這樣的態度不獨使中國人困惑，連我們美國人也攪不清了。美國納稅人當然應該問：『究竟何時何地跟共產黨合作組成的聯合政府曾經尊重過自由？』

「中國人當然還會提另一個問題。他們要問，美國政府願意花大批金錢排斥共產黨到希臘國境外邊去，為什麼在中國竟改變政策，要求中國容納共產黨，美國才願把金錢花到中國呢？

「國務院的聲明並沒有充分答覆這些問題。他們只有消極方面說話，沒有作積極性的表示。有關這樣重要問題的資訊，不應由政府代表隔著重洋招待記者來供給美國人民。」

「每一個美國人都重視中國今日的遭遇。我們應該聽到從華盛頓直接傳來明晰而負責的美國對華政策的宣告。」

這一篇痛快淋漓的文章，真把我們中國人譴責美國政府的一肚子悶氣全部吐露了出來。實際，經過我們的努力，美國傳播界為中國政府抱不平，已成為這一個時期的風尚。因為輿論是民意的反映，我們努力的結果逐漸在美國民意方面發生了效果。當時美國的左傾人士，透過太平洋學會，在美國民間已經成立了一個專為共匪宣傳的組織，命名為「民主東方政策委員會」（Committee for Democratic Eastern Policy）由太平洋學會的健將費爾德（Frederick Vanderbilt Field）主持，動員了大批能講能寫的美國人，為共匪宣傳，在美國的對華政策重要決策關頭，控制了美國人心，造成美國對華政策的重大錯誤。我們在這個宣傳逆浪中間作我們的最後衝刺，團結我們在美國的好朋友，以團體對團體的戰略，來爭取美國人民對中國真相切實的瞭解。在這些好朋友中間，我們找到紐約的一位億萬富翁柯貝克（Alfred Kohlberg）作傾筐倒篋的經濟支援。從民三十六年春間起，發起一個「美國對華政策協會」（The American-China Association）跟上述左傾「民主東方政策委員會」作刀對刀、槍對槍，爭取美國人民正視中國問題的肉搏戰。我們幸得魯斯夫人作這委員會的會長，經它得力的號召，在鬥爭中，我們永遠佔先。到了民三十六年終時，魯斯夫人以協會名義致美國參議院撥款委員會招集人勃利基斯（Chairman Styles Bridges）一封公開信，建議：（一）、給予中國合理的援助；（二）、立將剩餘軍械彈藥支援中國，（三）、繼續予中國以其需要的軍械彈藥與訓練；（四）、肅清國務院中親共份子。此函送到參院之後，經美國國會中同情我政府的參、眾兩院議員周以德等的支持辯論，長期舌戰之後，卒於三十七年三月三十日

參院通過了以四億六千三百萬美元軍援中國案。不幸此項美國政府善意助我的緊急軍援，又經華府左傾幕僚從中動了手腳，當他頭一批援助堅守平津的傅作義將軍價值一千六百萬美援的軍火達到天津時，開箱發現，都是沒有零件配合的軍械，簡直是一箱箱的廢鐵，坐令華北赤化，局勢崩潰，遲來的美援已難挽救大陸之赤化。此時顯光兄隨 蔣公下野行政院改組而離職，我也跟著免去副局長的職位，雖幸得卸去快要磨斷我神經的重責，然憂憤情結仍填塞我胸臆，難求片刻安閒。

暫得溫馨離滬遷台

我在勝利還都，返鄉兩年半的生活，雖公務方面在逆流衝刺中，倍受鞠躬盡瘁的困擾，然在私生活中，卻能幸得重溫往日溫馨的舊夢。受抗戰折磨至骨瘦如柴的馥貞，經過久別勝新婚的撫慰，不獨失眠症不藥而愈，不數月間竟恢復了她豐腴的儀錶與亮麗的風範，談笑風生，再度創造她人見人愛的人際關係。我因為上海是推動國際宣傳業務的重鎮，更因為上海是我的老家，子女都在此就讀，故向上海市政府在前法租界馬斯南路（光復後已改名，恨已不憶），申請得一幢小洋房，為我宿舍。在南京則在天目路外國顧問招待所中，辟一室為我夫婦臥房；馥貞兼為此招待所之義務管理員，指導員工為外國顧問服務。因此我夫婦變成了京滬鐵路每週常客。我自作規定，每星期六下午偕馥搭車赴滬，在上海一日一夜，辦理公私業務後，偕馥乘星期日臥車回京；遵此定例，兩年半中過我私生活，深感愉快。還都初期三十五年秋，二子一女都在身邊，長子大寶（坦）在交通大學讀企管系，已屆畢業四年級的最後半學期。幼子小寶（堉），不久即考取北平燕京大學新聞系，只他暫得歡敘，又告別離。女兒妹妹，我返家時早因助母管理家務暫停聖約翰大學學業，而隨一女友深獲商業經驗。我返家後介紹她在中國電影公司服務，我在上海初期的家務皆由她負責。時她與表兄俞仲培已有婚約，仲培在香港上海銀行任職，他們就於同年十二月在香港結婚。我因公務羈身，不克親往，由大寶前往代表主婚。我在上海的家，因此缺少了她。可是，次

年一月大寶與梁瓊枝小姐也在上海結婚，又復恢復了我家裏的熱鬧。小寶三十五年在北平燕京就讀一年半後，因北平危急，於三十七年改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每週末仍得返家團聚。

我們老家五兄弟，在這時期也在上海會齊了。三弟耀仲已成上海德國留學醫生中之翹楚，不久他又兼任了上海市立醫院院長。那時上海名人杜月笙決心要戒除吸鴉片煙的惡習，我就介紹耀仲去替他診治，耀仲竟能在半年以內幫他一無痛苦解除了根深蒂固的毒癮，於是曾耀仲是戒煙好手名噪一時，使他得日進鬥金。我現在可以公佈他如何能使戒煙人，毫無痛苦的如願以償。他的方法很簡單：戒煙藥丸是自製的，由我弟婦一手包辦：它是用鴉片、維他命和染黑的麵粉調配而成的藥丸。病人每復診一次，它就減少藥丸中的鴉片分量一次，這樣逐次遞減，到最後病人在不知不覺中兩三星期以來所吃的戒煙藥丸早就只剩了維他命與麵粉，說穿了，哈哈大笑自慶煙竟戒掉了！這是我倆見面，經常說笑的話題。此外兩個弟弟，三弟光叔在市政府衛生局工作，五弟季陽就在市立醫院擔任事務員，都是在醫界就業；只有四弟叔懋是聲樂家，在國立藝術學院任教授。我們五兄弟雖各有事業忙，可是有空互訪，話說家常，再敘童年天倫之樂，已是中年人難得的快事了。

兄弟們見面話家常，酒酣飯飽之餘，自難免要提到常熟老家。說到常熟老家，我真感到慚愧，因為，我是老大哥，把家務一肩挑是我的責任。可是，我的生活卷在時局漩渦裏，那有時間挑這應挑的擔子呢，那末，叫二弟代勞吧？這一位天天身負許多人生命安危責任的忙人，又那有功夫管這他認為無關重要的事呢？於是，大家商量的結果，把這副擔子推落到三弟光叔的肩頭。光叔在衛生局服務，天天要上班，所謂管實際也是收租時期回老家去跟管帳先生結算租款而已。這是父親去世後，我們協商的結果。實際，我們老家城外四鄉有良田二千畝，城內有一個大花園，一座大住宅和許多房地產，父親去世之後，我們只聘一位管帳先生年終收租，派父親留下的管家（傭

人的尊稱)金明看守花園大宅。其他一切都聽其自然,沒有人關心,也沒有人著急。現在我離家八、九年後回上海,他們告訴我常熟老家的現況,真不勝今昔之歎!據說,我們的花園,淞滬戰時曾經做過後方軍事指揮的總司令部,大批阿兵哥住在裏面,不獨沒有損壞什麼東西,反而使這荒園呈現了曇花一現的繁華奇跡。因為,我們花園景觀最大的特色是曲折假山、橋樑、亭台、樓閣環繞著一個大湖,到了夏天,湖面開滿了荷花,成了一幅紅綠相映的彩色大油畫。可是,荷花要開得好,必須每年春季找人下水翻藕根,到了夏天它才會勃發旺開。我們兄弟都離家遠走,那有人顧到這些小問題,因此這個荷池好久變成有名無實,只剩幾根殘枝來點綴的池塘了。可是這一年園中住滿了阿兵哥,他們工作之餘要洗澡,都脫掉了衣服向池裏跳,無意中給這荒池做了義務翻藕根的工作。他們開走了的第二年夏天,全池荷花開得比過去任何一年都茂盛,擠滿了聞風賞花的人。不幸這盛況跟著引來這荒園的不幸,很多人看著這樣一個大花園竟沒有人管理,於是就有大膽的人,扶老攜小全家搬到我園中的樓閣裏來住。一家住了無問題,當然跟著就有學樣的人,不久園中可住的房屋都給外人占住了。實際,我們花園裏並不是沒有人住,只是住的人,不獨不拒絕這些占住的人,反而歡迎他們。這個人就是我們的二姑母,她因窮,帶著一個沒出息無賴兒子,我們的表弟吳琴一,無處投奔,住在我們的花園裏。因此,有人要占住我們的花園樓閣,她歡迎之不暇,因為,她和它那無賴兒子就可以我家姑太太的身分,向這些人多多少少收些租金來貼補她的生活了。光叔三弟好久不回家,偶然有一次回家看到花園變成這樣一個大雜院,深感有著手調整的責任。不料,要求這些佔用的人搬讓出去,經年累月使盡方法,自恨孤掌難鳴一無結果。最後,他取得我們曾姓族長的幫忙,找到一位要辦學校的教育家,言明願不收任何代價把整個花園租給他辦學校。雙方言定之後,正式簽約,即由這位教育家出面,按法要求那些占住者一家一家搬,都無言遷讓。不料,輪到我二姑母,它以無處可搬為理由,堅持不讓。光叔無奈,這問題就擱淺在這僵局中,迄今無法進展。這是要等我回來,兄弟們商量解決的老家問題之一。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的老宅子。我上面說過，這老宅是由父親的管家金明留守的。淞滬戰爭結束之後，光叔回常熟，發現整個老宅，從大廳起往後連同明瑟山莊老花園與老三房的全部房屋都燒成一片白地。問問鄰居親友都閃爍其辭，好像是給類似漢奸之輩攪的吧！光叔不信，仍到處打聽，最後他找到了也是父親老管家名程福的，他才老老實實告訴光叔，這把火竟是金明放的。金明在上海戰火旺盛時期，忽動乘火打劫的念頭。他雇了好幾條船，雇了很多腳夫，連夜把這老宅前後兩房幾十間的傢俱細軟全都搬上船之後，放一把火把房子全部燒光。當夜他就開船回安徽老家，準備下半世做他人見人羨的富家翁了。據程福說，他這富家翁的夢是沒有做成的，因為他浩浩蕩蕩的一批船載滿了財貨，必然引起那時候到處都是的共匪遊擊隊的注意，於是，有一天遭遊擊隊的攔襲，不獨丟掉全部贓物並且也送掉了他的一條老命！我們不談這被天譴的老管家，給他燒成平地的老宅也應有個善後處理。這又是要我回家共同商辦的第二個老家問題。

這都是些不容易解決的問題，再加上更難解決的田租落實整理的問題也不能再拖了，因此，大家決定在三十七年清明節前後，我向新聞局請了一星期的假，約同四個弟弟，該請假的也如法炮製，五兄弟一同回常熟老家，先掃爸爸媽媽的新墳，次拜列代祖先的舊墓，然後把剩餘時間完全化在解決這些久拖未決的問題。最可笑的，我們說是回家，可是家在那裏呢！五兄弟無法只好住旅館！先兩天掃墓之後，第三天就在上午看西山塘涇岸的老宅。五開間的堂皇大門依然如舊，可是，推門進去看，門房、橋廳樓上下，大廳，帳房，每單位住一家，已擠滿了人，可還保持原狀。可是，大廳轉屏門後望出去，卻真變成片瓦無存的一片白地，因為燒剩的燼餘磚瓦也給人檢拾淨盡了。下午，吃過中飯看花園；二姑母到蘇州去看女兒不巧不能當面說，琴一卻故意躲了起來。理由，我們一踏進園門就明白了，因為，凡是園中可搬得動的東西都給他出賣不計外，最可惜的平素以樹木茂盛著稱的「虛廊居」，競給他砍得光禿禿，天天抱著砍下來的樹幹樹枝當柴賣，此中最珍貴而受文人讚賞不絕的是四棵白皮松與

一棵紅豆樹。園裏雖已沒有閒人住，可是，一片荒涼頹廢的現象，真使我們看著忍不住要流淚了。回旅館，五兄弟開一次家庭會議，想解決這些問題，熱烈討論後，只找到了一個結論，那就是：這些問題再連帶著落實整理田租更重要的問題必須有專人專責住在老家認認真真的辦，住在上海遙控管理是不切實際的。所謂落實整理田租這件事，我家從老祖母管家那時就應該著手做的，可是敷衍迄今，我們空居地主之名，未享地主之實。因為，我家擁有二千畝田，農民租了我們的田，每年給我們租，再由我們向政府納糧，因此，政府就負了保護我們地主應得的田租的責任。同時，農民每年給地主田租的多少以每年稻米生產豐歉作決定標準的。因此，每年在收成之前，地主必親自下鄉，察看每一個戶（為地主種田農民之俗稱）收成的豐歉來決定他應納稻米的百分比，加以記錄。到了收成之後，佃戶即按此決定百分比向地主繳租。倘然他不能如決定百分比繳，地主應催繳，催繳無效，可送縣衙門拘押促繳。這是地主應享的權威。我家從老祖母起就放棄這權威。因為分散在四鄉的二千畝田，最少也有百來家佃戶，要她每戶去看豐歉決定百分比，老太太那有這能耐，只好委託帳房先生代勞，可是這一代勞，地主的權威就落在帳房先生的手裏了。他可以看了豐歉跟佃戶討價還價決定每一個戶的實納百分比與應納百分比而從中飽他的私囊。老祖母如此，父親繼管也懶得更動，所以我說我家空居地主之名，未享地主之實，做我們管家的帳房先生沒有一個不發財的。現在這個家要我們管，這個架空的地主架子不應該及時整理而不再使它落實了嗎？可是，真要整理，更需要專人專責去幹，決不是在上海遙控可以成功的。

這一大堆問題非得有一個專責的人，放棄一切，住在老家全心全力來解決。結論是找到了，可是人呢？五兄弟你看我，我看你，誰也不願告這奮勇！最後，還是我把我考慮好久的話，對四個弟弟詳細剖析了我們的處境。我說，我們是處在中國舊時代家庭變化成新時代家庭、社會轉型期間，隔在夾縫裏的尷尬份子。這社會新舊轉變，我們曾家可作它進展模式的一個示範表演。老祖母在世時，不獨有三位姑太太帶

著兒女盤桓膝下，還有住在一個大宅子裏老三房的兩房堂叔堂兄弟以及不時回娘家的兩位堂姑母帶著兒女來湊熱鬧，真把我家過得像紅樓夢描寫賈家的形態。可是，老祖母一死，姑太太不來，老三房也很少往來，立刻寂寞多了。但在這階段，爸爸還帶著姨太太住在常熟老家，我們五兄弟各自有職業各自分開住，仍因隨時返老家定省，還保留一些大家庭的型態。最後到當前，爸媽先後棄養，我們五兄弟各自分居，除了每年回老家掃墓一次以外，這個老家在我們生活中實已形存實亡，不論理性或感性，簡直沒有一點連系可尋。但我們的生活雖已轉入新時代，我們的環境仍保留著老一輩親戚故舊的監視督責。這個老家還是我們的家，我們有責任保持它的原樣與維護它過去的社會地位。為了盡這責任，老宅燒了應該重建，花園敗落應該管理，田賦明知有弊也應該整頓，可是這些舊觀念給我們規定的生活規範是我們不甘服從的壓力，使我們瞻顧旁徨，使我們無所適從。因此，我說，我們是夾在社會轉型夾縫裏的尷尬分子。我已仔細考慮過，應付這些夾縫裏發生的問題，現在由光叔代表我們在上海遙控的辦法是惟一可以採用的方案。這樣做，我們應感謝光叔偏勞可還不致使他挑過份重擔，對老家仍表示了負責的態度，以待此後再徐圖適當的最後安排。四位弟弟聽了我的剖析與結論，大家同意照辦，這個老家問題就把這樣不解決的方式暫時解決了，實際，我心裏早作了配合時代潮流斷然放棄的決定。

勝利後返鄉與家人團聚，妻兒小家庭之不時歡敘外，又得五兄弟的經常盤桓，約計兩年半的時間中重拾我溫馨生活的舊夢，可說是我終生難再的快活時光。可惜，好景難長，到了三十七年底我辭卸新聞局副局長職位時，政局動盪，不復再能安居逸處矣！最可歎者，蔣公忠貞衛國的堅定領導，變生肘腋，經李宗仁挾廣西派的武力後盾，更借副總統的政治號召，竟主張蔣公下野以為媚匪求和的資本。蔣公為顧全大局計，竟俯納其要求而宣佈下野，由李宗仁代理元首主持國政。局勢惡化到這樣地步，我不得不作再度流浪的設計，以免為匪俘虜。幸妹妹嫁仲培，任職香港上海銀行，我遷港有了根。大寶早在三十七年交大畢業，我窮搜所有的積蓄湊了美金一千元，送

他到美國去，冒著半工半讀的險以求學業的深造。留下瓊枝已生一子，並懷著孕，只能等我自己生活安定後再作安排。次子小寶，初因上海危急，轉學廣州嶺南大學新聞系。後廣州告急，仍返滬同遷香港。我默察局勢惡化的發展，李宗仁的賣主求和是引狼入室，大陸難逃全盤赤化的慘劫。但偉大的 蔣公決不甘因此放棄他革命建國的宏願。看他下野前的部署：派心腹大將陳誠為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並密令上海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運送行儲黃金一百二十萬兩至臺灣，我準確體念到臺灣將是 蔣公設計最後退守的堡壘。因此我決定我再度流浪的程式，把香港作歇腳站，定臺灣為目的地。香港囑妹妹給我在水街租了一個樓面，先由馥帶了小寶坐飛機到港安排暫住。我因此次離滬是全家撤走的大搬家，雖擇要帶走，仍不免大箱大捆一大堆，就不得不坐船轉運了。剛巧景蒙跟我有同樣處境，同樣設計，於是也由妹妹代他在香港找到了房子，我跟他不獨同船轉運了行李到香港，安頓好了家眷的生活，也同機飛到臺灣，找機會參加固守這最後堡壘的奮鬥行列。我們倆先在臺北寄居在國宣處舊同事，當時任臺灣廣播電臺台長林忠的家裏，個把月後，又變更寄居在當時為臺灣警備司令鈕先銘的家裏。這時候，代總統李宗仁已稱病逃到了美國，只剩了閻錫山以行政院長的身份在廣州維持一個政府的局面。臺灣的前途傳言紛起；有的說，臺灣不能受共匪控制，應該宣佈獨立；有的說，臺灣應該交由聯合國，讓國際來共管。可是，我有堅定信心，有 蔣公在，臺灣一定可以成一座反共復國的堅強堡壘！

後顧

大陸赤化，政府遷台，使任何跟著政府在驚濤險浪裏打過滾的人都會不甘敗退，檢討過去，瞻望未來，作一番鑒往知來的徹底省思。因此，我在三十七年底辭去新聞局副局長職位之後，雖然脫離政治接觸，在港臺之間，過著流浪生活，實際我沒有一日不在想我們的政局怎麼會攪得這樣糟，此後應該怎麼做才能恢復我們戰勝國應有的光榮與地位。

當然，省思的邏輯順字先得後顧過去，找出我們失敗的根。最容易找到的根是就戰役勝敗影響全局的大小觀點去找。就這個觀點著眼，蔣公在《蘇俄在中國》中作自我檢討時已曾有了鮮明的指責。他確認三十五年六月中，國軍在四平街大敗匪軍時，他接受了馬歇爾的堅決要求，下第二次停戰令，給匪軍一個機會，死裏逃生，此後猖獗到無法控制的地步。蔣公自責，假定不下此停戰令，「北滿敗匪不難肅清，東北全境可拱手而定。」「蘇俄無法對匪軍補充，東北問題自可根本解決。」蔣公這兩句話，是指著此令造成兩個失著說的。第一句指的是四平街勝利對內的影響，肅清東北匪軍實力，奠定了全面滅匪的優勢。第二句指的是四平街勝利保持東北戰局是我政府剿匪的內政問題，堵住了俄共助匪的嘴。今受美方壓迫，竟下令放棄這唾手可得的勝利，不能不說是招致大陸赤化的一大失著。

的確四平街戰役的停戰令種下了東北失敗的根，可是一次戰役的檢討，只能看到失著表演出來的果，還摸不到失著產生的因。因此，我們的檢討應進一步研究為什麼會犯這錯誤，這就觸及當時蔣公所決定的戰略問題了。提到戰略得失的檢討，蔣公在《蘇俄在中國》第二編，自責反共鬥爭政略錯誤四大項中有兩項涉及東北。他最先指出，俄共在東北顯然的侵略行為，他原本認定這是一個與國際安全有關的問題，決計停止接收，交由聯合國公斷；可是最後他受國際的影響，竟與俄共直接商談，進行接收，這是他自責處置東北問題在戰略上犯的第一項錯誤。他說道：

「東北土地是我中華民國的領土，人民是我中華民國的國民，資源是我們國家建設所不可缺乏的條件。我們收復東北的主權這一立場是不可動搖的。但是東北的安危，換句話說，就是東北是否落在俄共手中，是一個國際安全有關的問題。當時中國既不能單獨解決，也非直接對俄談判可能解決，則我仍應該採取停止接收的決策，一面將我們的部隊集中平津，堅守榆關而以錦州為前進據點；一面將東北問題提出聯合國公斷，同時公諸世界輿論，課蘇俄以應負之責任。如此則我政府在國內有充分的

實力，勘定中共的叛亂，控制華北的全局，而以東北問題提出國際交涉，暴露蘇俄獨佔東北的狂暴企圖，以阻止其東進太平洋之野心計畫。然而我們決策之後，卻受了國內和國際各種牽制，不能堅持到底，而又轉向蘇俄直接談判，同時更將我們國軍精銳的主力調赴東北，陷於一隅，而不能調度自如，爭取主動；最後東北一經淪陷，華北乃即相繼失守，而整個局勢也就不可收拾了。」

蔣公繼續提示東北反共鬥爭他在戰略上犯的第二次錯誤是：無法擊破共方強把俄共插手的東北戰局當作中國內戰的陰謀，坐令共匪得運用和談拖垮國民政府。我政府跟共匪簽訂的停戰協定，特別提出「國民政府軍隊為恢復中國主權而開入東北或在東北境內調動，不受停戰協定的影響。」理由很明顯，因為我政府派軍隊到東北的任務，是向俄共交涉接收東北主權，與共匪無關，故不受停戰協定的影響。更何況俄共曾公開承認東北並沒有共匪軍隊。因此我政府力主東北是對俄共接收的國際問題，共匪經俄共的強力支援，強認此為國共衝突的中國內戰問題，應納入「美蘇調停」的「政治協商」問題全局一併解決。共匪因此得利用擴大關內的武裝叛亂迫使政府對東北問題讓步，而政府也只能因阻止他們這套陰謀的實現而陷入被動不利地位。蔣公在檢討這錯誤時，沉痛地作了下列的自責：

「當時政府，如其對外關係不太顧慮，以致處處陷於被動，而能積極的集中力量，執行三十五年一月的停戰協定，對於共軍違背協定的軍事行動，加以嚴厲的制裁，雖發展為全面戰爭亦所不顧，那還是可以獲得全面勝利的。至於東北主權接收問題，我政府本已決心如前所述，提交聯合國解決，而不使其與關內的軍事問題互相牽制。不幸我們的決心不夠，而對於這一個最重大的東北問題，在當初的決策，又因受對外的國際關係而中途動搖，不能貫徹到底，遂使我們遭受這種軍事上無可挽救的失敗。」

我們細讀 蔣公檢討東北戰局戰略上兩項失著的考慮過程，發現有一個異常巧合的相同之點。他檢討第一項失著時，指出原定東北問題是俄共侵略問題，應交聯合國議處，決定不由我政府直接向俄共接收，是絕對正確的決策；不幸因受國際影響，卒犯了向俄共直接接收的錯誤。他檢討第二項失著時，指出政府原本堅持東北問題是國際問題不是國共關係問題，不應納入「美蘇調停」的「政治協商」範疇之內，變成中國內戰問題，這也是絕對正確的政策；可是後來也不幸「受對外的國際關係」，動搖了這決策而犯上了第二次錯誤。使我們特感驚異的這兩次失著都是政府原定決策絕對正確，可同樣都因受了外來國際影響，放棄原定有光明前途的正軌而改趨了自掘墳墓的歧途。兩次失著，同一導因。這外來影響，究竟何指，蔣公未便明言。值得我們作深入的發掘。但，讀者倘看過我前面曆述我抗戰以來國際關係的經過。這外來影響所指是誰，呼之欲出，不會有他國，顯明指的是美國。我們抗戰勝利，沒有沾美援多少光，我在前面第十五章第三節裏已有詳盡的檢討，姑不再贅。日炸珍珠港，戰爭國際化，我在太平洋戰區內的作戰貢獻應居首功，美援的分配理應占絕大比例。使我們今日檢討啼笑皆非的是當年美國「租借法案」分配給我們的，只有希臘、土耳其等小國的三分之一；比之第一英國得相當於二百七十億美元，第二竟是蘇俄得相當於九十億美元，而我們只在名義上得到了相當於十三億美元，距離之大，實足駭人！同時，這十三億美元我們還不能掙到手，因為經西伯利亞給蘇俄中途扣去若干，經印度緬甸又經英國半路打劫去了若干。實際算是運到中國的「租借法案」美援物資只剩了四、五億美元。這四、五億美元的美援，前期控制在史迪威的手裏，完全用在他一手訓練的「中國駐印軍」，與駐在昆明的「遠征軍」不參加我抗戰行列；後期控制在馬歇爾手裏，變成他脅迫我政府為達成他「援華援匪」的工具。因此我們可以說，美援對我們抗戰建國沒有幫上一點忙，可是共匪得赤化大陸美國卻奉上了極大的貢獻！蔣公雖沒有顯著地表示了他的憤慨，可是字裏行間仍不免透露他的鬱悶！我在本書第十三章

第二節結束時，曾作大膽的研判，說我參加太平洋國際抗日戰爭，雖不得美援也可占戰勝國的優越地位，願復述我的理由如下：

「日本軍閥偷襲珍珠港，冒險與強敵美國展開太平洋爭奪戰，勢必傾其海、陸、空全力作最後之一擲。那末，抽出中國戰場部隊，減弱他們在中國戰場的作戰實力是日軍閥必然要改變的對華戰略。因此，我們可以斷言，日、美戰的展現，已種下了我們無需美援，獨力可以制日進而勝日之根。假定我們當日能看到這一點，那末不會有雅爾達強把我中國權益換取俄共參戰的美國賣友行為；不會有俄共對日宣戰三日後日本投降，俄軍竟以戰勝國身分接收東北，籍機壯大共匪軍力；不會有強把叛逆作平等政黨，美國作調人的『聯合政府』談列：不會有四平街匪軍大敗潰逃，馬歇爾強迫 蔣公下令停戰的無理干涉；最後當然不會有美國停止援助促成匪勢猖獗篡踞大陸的意外事變。」

我們不得美援也可成打敗日本的一個居首功的戰勝國，我擁有這份信心；同時，黎東方先生以為即使當時蘇俄站出來幫助共匪與我政府戰；我政府也有勝利的把握，我也有同感。可是，我們看得到，睿智過人的 蔣公那裏會看不到的呢，看得到而不做，又有什麼原因呢？我們應承認，我們的看法是不負實職研究歷史者事後聰明的研判。蔣公負國家安危重任，面對當時錯綜複雜的環境，怎能拒絕可能挽救危機於萬一的援手，而作獨往獨來的決策的呢！勝利後領導全民實行憲政是 蔣公根據三民主義建國程式決定的大原則必須實踐，實踐需團結不能分裂；更何況，八年抗戰使全國人民受盡了困苦顛連的慘痛犧牲，怎樣也不能再燃戰火迫他們重遭塗炭。因此，共匪藉勝利關頭作叛變表示 蔣公明知乘勝撻伐可操勝算，仍予容忍，適在此時美國願作調人，自成及時之援手。可是 蔣公絕對沒有料到史達林的魔手已在此時插進了美國政府，操縱了美國的對華政策。此後美國「援華援匪，」倒行逆施的一再脅迫之來，他總是打落了牙齒和血吞，緘默地忍受著，直到大陸赤化。因為，他保持著中國列代

薪傳忠恕之道的道統觀念，「寬以責人，嚴以責己」，斷然把美國對華決策的錯失由他自己一肩挑了起來。這是我們這一群辦國際宣傳業務的幕僚在他身邊看得清清楚楚，深感不平，而無法有所貢獻，最感痛心的事。

但，把大陸赤化的導因，儘量向美國肩上推，把自己說成一個受害者不負任何責任，這是欺世的卑鄙行為，我們決不能這樣幹。我們應該學習 蔣公一肩挑起國家興亡責任的偉大心態，把大陸赤化的全部罪過自己認下來，責備自己，激發自己改過自新的自我檢討。我們這樣做，那末，美國「援華援匪」的嚴重錯誤，沒有我們的同意它也不會犯，這責任還是應該由我們自己負起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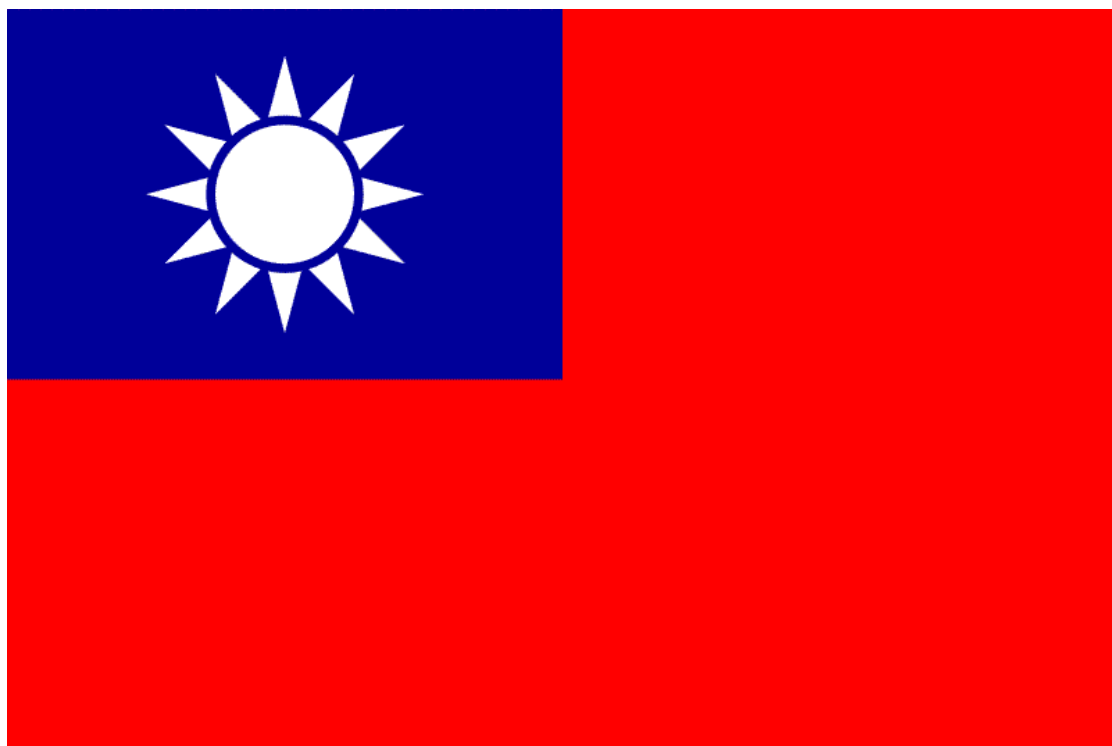
我在這政治轉型期間，靜下來事後追思，深感造成共匪猖獗顛覆我大陸政權的劣勢，只有十之二三導因於炮火戰爭。我們真正失敗的原因，十之七八是，共匪統戰攻勢之成功，瓦解了我國民黨領導全民的威信。抗戰勝利以前，我們略過不談，即就抗戰勝利日起來檢討共匪統戰運用的奸詐險毒。勝利後，他們立即抗命不受政府接收敵降的通令而取「自立為王」與政府平行姿態的叛變行為。在我們正確的立場指其姿態為叛變，而共匪統戰策略掩護其叛變，稱此行動為代表全民爭自由、爭民主正大光明的合理要求。這是他們勝利後樹立起號召統戰的一面大纛，由這號召，他們竟能把我領導政府為全民求福利的國民黨，醜化成作威作福的獨裁暴力集團；而把控制全民吸其骨髓的共產黨，美化成為全民爭自由、爭民主的革命集團！他們一方面提出組織聯合政府貌似民主的要求，運用邊打邊談以美國為調解人的和談，來擴大他們叛變的實力；一方面在中國全面社會中發動他們的統戰攻勢，鑽進政府政治脈絡中，癱瘓政府的統治能力。他們統戰的策略，最重要的，計有兩端：第一，製造全民的失敗心態；運用種種方法，從不同角度，使全民接受他們的謊言，堅信政府是無能的，貪污的，只知搜刮民脂民膏充實自己的錢袋，到緊要關頭向國外一溜，置全民於火坑而不顧。因此在全民的心態上，造成一個政府必敗的執持，為共匪建立最後暴力一擊打定

了第一道基礎。共匪重要統戰策略的第二端，是製造全民的中立心態。這是跟著失敗心態，再加努力輕易得到的效果；那就是這樣無能自私必然失敗的政府，現在跟爭自由、爭民主的共產黨鬥爭，潔身自好無辜的老百姓，最聰明的辦法是保持中立心態，決不跟著政府作必敗的犧牲。這又為共匪建立最後暴力一擊打定了第二道基礎。共匪只須在這兩項統戰策略上運用得手，最後暴力的一擊自可水到渠成不費吹灰之力了。因此我說，匪篡大陸，炮火戰爭只占十之二三的功效，他們統戰攻勢的成功，反估十分之七八的比距。他們的口號以「反內戰」為綱領，延而作「反饑餓」、「反徵兵」、「反徵糧」、「反動員」之呼籲；把他們叛亂所造成的國難，反噬而成政府禍國殃民的罪狀。他們製造的週邊，最初以知識尚未成熟廣大的在學青年為目標，繼而擴大至真正知識份子，形成所謂「民主同盟」的結合。於是其滲透工作精進而達無孔不鑽、無隙不乘的程度。受他們利用者都以中立姿態深入政府機構，民意代表，社會團體，甚至平素反共的後方集團或共匪正與當面作戰的前線部隊，施其簧鼓以達癱瘓民意、瓦解士氣的效果。此外，平素橫行不法的地痞流氓，暗伏社會底層的哥老會等黑社會結合，甚至落伍的軍閥政客，投機的奸商惡棍，愈是被人唾棄的廢物，在匪方統戰運用中愈加提高了他們的利用價值。共匪就以這種無所不包擴大利用群眾的統戰戰術，很迅速與很廣泛地在全國社會中塑造了失敗與中立的心態，藉以打擊政府的公信權威，後方人民以及前線士兵對政府產生了離心的作用，使我政府在後方需要動員時無法動員，在前線需要決戰時無法決戰，最後遭遇到大陸赤化的慘敗。

我們透徹瞭解了大陸赤化失敗的如上原因，再要進一步找這失敗應由誰來負責，那就易如反掌了。匪勝，勝在煽惑人民不信政府，離棄政府，倘然政府有能力決不使這煽惑會奏效，那末，失敗之責，應由政府自己擔當，無推卸給任何方面的理由。但在當年憲政尚未實施之前，政府由我中國國民黨組成，其一切措施皆遵從黨的領導，則政府的任何錯失，應由中國國民黨負擔全部責任。那末，大陸赤化，共匪的統

戰勝利就是中國國民黨領導政府作反共鬥爭的失敗，這是中國國民黨每一個忠實黨員都應該負起責任來沉痛省思的一個大問題。

我因此作切實的自我檢討，身為中國國民黨員，又在政府領導階層附驥作業，匪勢猖獗，大陸赤化；我也應負部份罪疚，則痛自貶責，力求挽救之道，是我贖罪的唯一途徑。三民主義的民主制是先知後知領導不知者群，使他們「竭力樂成」自願合作的民主制，遠勝西方以「少數服從多數」之強迫追隨民主制。所謂「竭力樂成」是先知透過後知的溝通以他的「知」，說服不知群，變成大家共有之「知」，進而以此全國一致之共識，發動治國平天下的革命行動。憑此理論來推斷事實，我們的黨是推動革命行動的先知與後知者的結合體；全國人民是我們要建立共識，推動革命行動不知的物件。我們推動的成敗，就表現在這「竭力樂成」四個字上。這表現大家接受我們先知後知傳達的「知」，變成大家共同的「知」，進而成大家共同的「行」，是絕對自發自動，沒有半點勉強的。這不是比諸西方「少數服從多數」勉強而行者更民主了嗎？可是，以這個角度來評判勝利後我們一任共匪滲透、顛覆，幾近束手無策，使廣大群眾變成賭了眼，聾了耳，跟著赤色指揮棒亂蹦亂叫的一堆瘋子，我們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國民黨黨員，反躬自問，對應儘先知覺後知之職責，能不汗流浹背了呢？因此，我一再研討的結果，決定此後救國只有一條路，那就是徹底革新我們的黨。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